東方雜誌

第四十一卷　第二十一號

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於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一卷第二十一號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

戰後歐洲的政治傾向

潘楚基

一　前言

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拉斯基氏在六月十七日的紐約時報星期雜誌發表一文，推論現時的政治傾向，其中有下列幾段：

「……普通人已在到處抬頭，要求取得每一個社會至今拒絕給予他的地位。

「每一個標識都暗示着在希特拉主義與日本軍閥推翻以後，整個歐洲及亞洲會放弛一種力量，其與傳統秩序的性質之不相容，有如資本家的需要與要求之不能與封建政權相容一樣。

「此外，我想任何在傳統秩序範圍內的讓步都很難滿足要求的水準。差不多在每一個地方，對羣衆所作的讓步之最大部份會來得太遲，失掉了在五十年以前也許能夠擋阻根本改革之需要的文雅的外表。無疑，運動發展不會是一律的。既得權利者在勝利而富有的國家如美國，能夠維持其權力，遠較在一個大受摧毀的國家如法國或意大利者為長久。

「因為那個失敗的結果，是褫奪那些一向慣於行使權力的人們對羣衆的心理控制，那些羣衆以往是尊敬它的。

「……就我看來，任何努力以保存一九三九年我們的文明所基的假定是很難成功的。第一，為了重建這些為德意所蹂躪的國家，在計劃重建及決定其實行之優先程序兩方面，都須要國家權力的直接干預。

「當然，以上所說，在失敗國家及其衛星國家最為真實，但是即在勝利的國家，也會有一個長時間不能回復英美工商業所熱烈主張的「自由企業」。

「因為任何一國想要廢除戰時所必要的經濟控制而不冒引起工業混亂的危險，那是不可能的，而工業混亂會很快地進入一個社會混亂。與這個相聯繫的是大批羣衆的失業，而現在大家都知道在大批羣衆失業的地方，想要保存政治的民主，除非使用國家權力之強烈的干預沒有可能。

「……全世界正在左傾，以不可抵抗之勢左傾。我並不否認在革命的進程中，有這裏暫時停止或那裏發生反革命的可能性，但是我們所當對的問題，不能以傳統秩序的辦法解決，這個信念到處在增長中……」

惟年來高瞻遠矚之士莫不認歐洲的政治，甚至全世界的政治，是趨於左傾，拉氏特為其中之一人而已。此種左傾的主要原因，概括起來，在客觀方面，為戰爭的物質毀滅，使往日財產權關係與觀念發生動搖；戰後百廢待興，工作艱鉅，事實上非使用國家權力不易有效辦理；在主觀方面，為人民羣衆對舊日統治階級喪失信任，加上民主國家所行若干「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錯誤政策，以及左派政黨的努力活動，於是左傾的洪流彌漫全歐，大有逢者滅頂之勢。現在把歐洲國家最近幾個月的左傾情勢，摘要報告如次。

二　英國

英國雖然不是歐洲大陸的國家，但是我們通常稱之為「歐洲國家」，所以戰後英國左傾的情勢，不能不稍加論述。

關於本年七月[illegible]日英國大選的結果及其意義，記者曾經撰述一次

通訊，寄回祖國發表。這裏只略述幾個要點：

英國這次的選舉，論爭焦點不是外交政策而是內國經濟政策；再明白一點，是私人企業的自由經營及政府統制與國有國營兩大主張之衝突。工黨主張國有國營英國的煤礦，動力，鋼鐵工業，內國的陸上與水上交通系統，英倫銀行，以及若干土地。此外，他們還要求政府統制住宅建築，繼續管理物價，監視獨佔事業，襄助輸出貿易，以及保證人民就業，增進社會安全。保守黨方面，一方痛罵這類主張為過激，並以工黨如果執政，將使全歐洲共產，且剝奪英國人的一切自由（連呼吸自由在內！）恫嚇選民，一面自己發表一些改良主張，作為「釜底抽薪」之計；再加以他們利用英國人的傳統民族性——穩健，以及邱吉爾的巨大聲望，自以為選舉獲勝，有如探囊取物。可是結果，保守黨卻遭到空前的慘敗，議席由三五八而降至一九五。

這次選舉結果，有兩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是工黨的勝利不是相對的而是絕對的。我們知道在一九二三年選舉後，工黨第一次得有機會組織內閣。但是他們在下院僅佔有一九一議席，所以組閣時不能不聯合自由黨，自由黨一動搖，工黨內閣隨即拼倒。在一九二九年的選舉中，工黨得有二八八議席，較之保守黨多得二十八議席，但是還沒有在全體中過半數，所以麥克唐納的第二屆內閣，仍是「不幸短命」。這次選舉，在六百四十席次中，工黨由原來的一六三議席而增至三百九十餘議席，顯然超過半數而有餘，今後即令其中有若干分子動搖，工黨的繼續執政五年是毫無問題的。在這五年當中，除非美國以最大的經濟力量，對英國勢迫利誘，使其右傾（如紐約時報可羅克氏之所主張），而工黨願意俯首就範，則工黨雖不見得能如阿特里所言「建立社會主義的不列顛」，但競選政綱一部份之實現是必然的。

第二，自由黨的主張，一向介於保守黨與工黨之間。在這次選舉時，自由黨人相信該黨可能增加席次，成為一個有力的第三黨，甚至可與勢均力敵的其他二黨之一組織聯合內閣，自居舉足輕重的地位。可是自由黨也遭受了慘敗，原來的十八個議席僅能維持十一，而最重要的領袖如辛克萊與皮外芮治自身都免不了被淘汰。這可以看出太含混太不徹底的左右騎牆主義已為英國選民所屏棄。在另外一方面，英國選民的左傾，今日雖僅傾到工黨的「社會主義」，但英國共產黨所得的議席卻由一名而增至兩名。雖則英國共產黨所誇稱「我們的議席增加了一倍」似乎只是一句幽默話，但是如果我們想到美國國會中至今根本還沒有一個共產黨議員，則英國的這個政治趨勢，也值得我們相當注意。

紐約時報駐倫敦記者丹利耳氏說：「工黨的得勝代表政治傾向之一個深宏的與根本的改變。因為選舉所趕出的不僅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個階級。」這個看法是對的。

三　法國

法國的左傾運動，主要由社會黨及共產黨所構成，其中尤以共產黨為活躍。共產黨得勢的原因，據一年以前美國基督教科學警世報一篇長文的分析，為下列三者：

(一)俄國勝利所給予法國人民的強烈印象；

(二)法國最多數的政黨都渙散無組織，而共產黨的組織則極其健全；

(三)法國抵抗運動中共產黨分子參加之踴躍。

因為法國的抵抗運動，係以左傾分子為主體。所以借重抵抗運動而得勢的戴高樂將軍，不能不跟着也表現一些左傾的姿態。譬如一九四四年九月三日他在巴黎宣布，在法國戰後的政權之下，「共通財產的巨大資源之開發與指揮，不會是為着少數人的利益而會是為着全體的利益……法國會使她所有的國民都在安全中養育子女。」

但是自從法國解放以來，戴高樂政府僅僅把法國北部若干煤礦及巴黎附近的「雲老迪」汽車工廠收歸國有。因為後者是一個親德分子的財產，所以嚴格說來只能算是沒收賣國賊的產業而不是普通所積的

「國有」。除此以外，戴高樂並沒有宣布還有甚麼工業或財產應當收歸國有。

戴高樂在這一方面行動這樣遲緩有兩個原因：

第一，在法律上，法國的臨時政府是一種革命政權，並不是經由人民投票產生的。戴高樂覺得大規模的社會經濟改革必須得有人民的明白授權，那就是說，必須在選舉以後，纔能實現。

第二，在思想方面，戴高樂本人本來是一個保守分子。他的目光和精力所集中的是在國際上爭取法國的光榮，至少是恢復戰前一等國的地位。他不願意國內有激烈的社會經濟改革，引起重大紛爭。但是戴高樂的這種法律見解和保守思想是不為抵抗運動的分子所贊同的。他們覺得戴高樂應當倣效當日芮舍留對付封建貴族的辦法，把銀行和關鍵工業卽刻收歸國有。他們反對拖延，因為法國的反動資本家為了會和德國合作的原故，現在內疚神明，外慚淸議，惡譏畏議，銷聲匿跡，在此時舉辦重大改革，阻力甚少，易於有效實現。如果日子久了，他們又會抬頭，又會增加改革的困難。

因為如此，在法國解放一年多當中，戴高樂和抵抗運動的分子業已發生兩次重要衝突。第一次是去秋戴高樂下令解除自抵抗運動長成的「法國內衞軍」——尤其是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團」之武裝。因為反響很大，戴高樂不得已，暫緩執行。他認為等到正式陸軍有充分的設備與軍裝以吸收以前的非正式軍隊之一大部份，以及工業生活重新建立，足夠給予其餘的兵士以工作時，這個問題自然較易解決。

第二個重要衝突是起因由於恢復憲法問題。上面說過，戴高樂以法國現政府非經人民投票產生為由，反對施行重大改革。所以恢復或成立新憲法及依憲法辦理國會選舉，是一個當務之急。關於這個問題，法國左派分子認為第三共和失敗的主因，是大工業，銀行業，以及一般上等階級支配了法國的政治，而上議院則尤其是他們的大本營。所以他們主張不要恢復一八七五年的舊憲法，而另行召集制憲會議，制定國會只有一院的新憲法；而新立法機關須有控制政府的完全權力，以便利實行經濟改革。戴高樂的主張恰恰相反。他主張在本年十月間舉行人民投票，決定是否選舉一個暫時的國會以修改憲法，修憲的時間定為七個月。在此期間，那個國會對於政府只有有限的權力，期滿必將新憲法交與人民投票決定取捨。如人民不贊成此辦法，則舊憲法自動恢復。照他這個計劃，或者在好幾個月的時間以內，他可以一身兼掌立法行政大權，為所欲為，不守控制；或者恢復舊憲法的兩院制，利用上院的守舊以對抗下院的激進。

但是他這個如意算盤，雖經他的內閣通過，卻被法國的「諮議會」——暫時的立法機關——否決了。諮議會的議決，是由人民選舉一個有卓越立法權的國會以制定新憲法，並且規定法國殖民地合法選出的代表應有權參加。

這是法國最近的一場重大鬬爭。在這場鬬爭中，戴高樂曾以辭職相要挾，但是諮議會沒有理會他。他於是又別出心裁，擬定減少工業區域的代表人數。譬如說，巴黎所在的塞拉區，在一九三六年選舉時，本來可以產生六十名代表。他現在擬定減為四十七名。這樣，又引起了左派政黨及勞工團體的激烈反對。據後來的消息，戴高樂擬讓步，把那一區的代表名額增到五十三，其他工業區域也酌量增加。

據紐約時報駐巴黎記者克能德氏的報告，戴高樂希望借重天主教政黨及社會黨以對抗共產黨。但是近數月來共產黨正在力謀與社會黨接近，新組「人民陣線」，聯合競選，以取得十月間國會選舉的大勝利。雖則最近社會黨全國大會中拒絕與共產黨作「機體的統一」，而且其所提統一的三個條件——：(一)坦白宣佈政策，不戴機會主義面具；(二)尊重眞正民主與個人自由；堅持大小國家權利平等；(三)專為勞工利益奮鬬，不與任何外國政府發生聯繫，並保持批評與判斷之充分自由——大槪也不會為共產黨所採納，但是在選舉時以及對於特殊問題雙方合作仍是可能的。

除了在上述幾個衝突中充分表現左派勢力之不可侮以外，如不久以前，法國全國各市議會選舉，共產黨與社會黨之佔有一半以上的議

席，只當的受審與被判死刑（紐約時報的克能德氏曾稱爲係整個法國資產階級的受審），都在表示法國民衆之左傾。

四 比國

比國在戰後的政潮，主要也基於左右兩派的衝突。第一個衝突，是比國的流亡政府回到比國以後，因爲拒絕把共產黨人加入內閣以及履行改良機構的諾言，引起煤礦工人及運輸工人的一串罷工。接着，因爲前首相庇爾勞借重英國武力解散抵抗運動的軍隊，尤其引起很大的衝突。但是本年二月十一日比國內閣改組，以抵抗運動分子八名充任聯合內閣閣員，以著名的抵抗運動領袖兼社會黨首領王埃克充任首相，並且停止執行強迫解除抵抗運動武力的命令。抵抗運動方面，也相信無須再保持武力，作爲強迫政府接納其要求的工具，那些半獨立的組織方纔逐漸消失其個性。

但是不久以前，比國的左右勢力又發生一場巨大的衝突，其導火線爲比王回國問題。比王黎阿朗德三世在一九四零年下令比軍對德投降，拒絕把政府遷往英國，在德國控制的幾年中，又和納粹發生了一些來往，本來已經引起人民的不滿。但人民最不滿的還並不是他個人，而是他所代表的比國守舊勢力。當去年比國獲解放的時候，比王已被納粹擄去，由其胞弟攝政，所以暫時沒有問題。本年五月德國投降，比王也恢復自由，比國的左派勢力堅決反對他回國，派了許多人勸他自動禪位。他最初也有些動搖，但是後來因爲受着比國守舊勢力的慫恿，他的態度忽然強硬起來。這時，比國的勞工羣衆至爲憤慨，決定他如果堅持回國，則以全國總罷工對抗。首相乃根據比國憲法第八十二條國王如果不能行使職權時建立攝政以代行其職權的規定，向國會上下兩院提案，規定比王在回國以先，須得國會通過，認爲其「不能行使職權」業已終止。這個法案於七月十七日在下院以九十八票對六票通過（有保王派議員三十二人缺席），翌日在上院以七十七票對五十八票通過。一場軒然大波，始告平息。

這幾場大風潮鬧過以後，比國政治已爲抵抗運動分子所支配。照現狀觀察，如果比國辦理選舉，國會中左派的勢力恐怕會更有增加；因爲現國會係戰前選出，當時人民還沒有遭受納粹統治的痛苦，也沒有對比王存甚麼惡感——總之，還沒有左傾到今日的程度。

五 意大利

在意大利與在比利時一樣，左派與右派衝突的核心是王位問題。我們知道意王貳曼洛耳二世比較比王還要反動，墨索利尼的上台完全是他同意的。因爲如此，意大利民衆的反對王室，比較比國民衆尤爲激烈。他們不僅反對意王，根本主張取消君主制度，成立共和政府。意王被迫禪位以後，他們還是繼續原來的主張。但是英國則去年底拒絕民主領袖斯阜滋伯爵充任外交部長，本年春間又拒絕社會黨首領龍里組閣。英國所希望的是意大利政權永遠操在巴多格利阿一類的右派人物手中。然而自從四月間意國的民族解放軍克服意大利北部，並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處決墨索利尼等以後，意國勞工羣衆的勢力，突然成爲意國政治上的一個最重要因素。甚至紐約時報也說「意大利的勞工革命，就其爲羣衆示威而言，規模之大，歐洲他處無有其比。」結果，主張與王室妥協的波羅米內閣不得不辭職，而由解放軍的副總司令柏里繼任首相，並以社會黨及共產黨首領分任副首相。

如果意大利民衆運動不受外力束縛，政治上第一樁事情大概是召集人民代表會議，決定是否繼續維持君主制度，抑或成立共和政體。照現狀觀察，後者大概很有可能。因爲在意大利的七個政黨中，社會黨，行動黨，共產黨，和共和黨都公開反對君主制度；基督教民主黨分成兩派，只有勞動民主黨及自由黨贊成與王室妥協。

因爲意大利的政制還沒有確定，新政府也成立不久，所以只有在勞工勢力最大的意國北部，許多設施改革，顯然表現左傾，在意中與意南還沒有很大的變動。但是左派勢力在政府中既已抬頭，目前社會黨與共產黨又在進行合作，以期於選舉時，獲得巨大勝利。如果他們

勝利，則社會黨首領龍里所言「制憲會議會給予意大利以一個眞正的共和政府與一個基於把大部份社會化的新社會與經濟組織」，眞會有實現的可能。

六　挪威丹麥與荷蘭

挪威是第二次大戰中大受納粹蹂躪的一個國家，所以挪威的抵抗運動，在北歐各國中也特別激烈。現時挪威內閣中只有兩位閣員是以前挪威流亡政府的舊人，首相以及大部份閣員均爲工黨（社會民主黨）黨員，共產黨黨員也第一次在挪威歷史上佔有兩個閣席。

因爲在抵抗運動中，工共兩黨有共患難的袍澤之誼，所以挪威光復後，他們對挪威的政治，也採取合作的態度。他們曾經聯合發表宣言，要求成立眞正的人民政府，依和平途徑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在宣言中，他們列舉一串的基本人權，其中包括工作權在內。他們又要求與一切愛好和平之國家合作，特別是與蘇聯合作。

本年五月間挪威工團聯合會建議上述兩黨合併爲一個勞工政黨以參加十月八日的全國大選，經兩黨同意。隨即組織一個臨時委員會，由兩黨各推代表三人，工團聯合會推代表二人，磋商合併及競選事宜。

丹麥在一九四零年時，毫無抵抗，被德軍佔領。但是丹麥民衆不久就嘗得納粹統治的滋味，所以也發起一個祕密的抵抗運動。這個運動，在過去一年間，頗爲活動，其分子現時成爲丹麥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最近丹麥共產黨與社會黨磋商合併，據八月十一日的路透社電訊，已有高度的進展。

荷蘭政府逃往倫敦的時候，跟去的兩千荷蘭人中，一大半是荷蘭大工商業的董事，經理，與其他高級職員。荷蘭克服之初，政府各部重要職務，還是那些人充當。但是本年六月二十三日荷蘭內閣改組，以抵抗運動的領袖之一斯激沫航教授充任首相。新內閣十四閣員之中，只有三人是舊政府人物。其餘十一位都是抵抗運動的著名領袖。

七　波蘭

以上把西歐曾直接受戰禍的國家在戰後之政治傾向敍述了一個輪廓。但是今日談起歐洲的左傾，最引人注意的還是東歐國家。那不僅因爲在大規模社會及改革方面，西歐國家一般還在「坐而談」的時期，而東歐則已在雷厲風行地實幹，而且是因爲東歐鄰近蘇聯，有許多國家至今仍爲紅軍佔領，因此直接受着蘇聯的支配或影響。現在先述波蘭的概況。

波蘭是一個大地主與窮苦農工——特別是農民——構成的國家。波蘭的中等階級，在俄國革命，奧國崩潰及第一次大戰的通貨膨脹中淪落。當時的地主階級也喪失了許多資產。他們蜂擁而加入陸軍，充當軍官，在畢爾蘇司基領導之下，攫得了政權。後來他們又修改波蘭憲法，規定總統可以自己選定繼任人，這樣，鞏固了他們的獨裁統治權力。在戰前兩三年中，波蘭的社會黨與農民黨逐漸抬頭，在地方選舉中獲得了許多勝利，但是國家大權，還是操在總統及陸軍總司令的掌中。一九三九年波蘭戰敗，政府遷往倫敦，爲時勢所迫，組織了一個聯合內閣，以西考斯基將軍爲內閣總理。將軍是主張對蘇妥協的，但是他的屬下軍官以及羣集倫敦的富有階級繼續堅持反蘇政策，所以幾次的對蘇談判都不能成功。

同時，波蘭的左傾分子則在莫斯科成立「波蘭愛國者聯合會」。這個團體到了一九四四年之初，改爲「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後來蘇軍攻入波蘭，隨着遷到魯布林。本年一月十八日又遷到波京華沙，正式改稱「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成立之初，包括有波蘭社會黨及農民黨黨員五人，工黨黨員四人，民主黨黨員二人，及無黨派者一人。但是入閣的各民主黨派人員都不是戰前的最著名領袖，而總統畢耳羅特則是以前共產黨祕密組織的一個首領，曾於一九三九年襄助蘇聯管治波蘭東部，所以英美認爲完全是一個聽憑蘇聯支配的政權，不肯承認。

本年三月雅爾太會議時，三强會經議決「波蘭現時臨時政府應基於一較廣之民主基礎重行改組，加入波蘭國內及國外之民主領袖。」後來蘇聯因爲發現這些領袖中有些有反蘇的行爲或嫌疑，拘捕了十六人，引起英美的大嘩。反覆磋商幾個月之久，直到那個案子審判完結，三强方纔商妥波蘭新政府的人選。計加入了倫敦流亡政府的前任內閣總理米考拉齊克爲副總理，斯丹齊克爲部長，格拉斯基及波蘭內部的農民黨首領威託斯爲總統院的三位院員之二。這個新政府於六月二十八日成立，於七月五日得到英美兩國的承認。

波蘭的社會改革，在過去一年中有了長足的進展。民族解放委員會在波蘭境內行使職權之初，卽開始把大過一百二十四畝的地產沒收，分配與耕地不及十二畝半的農民，以維持其一家的最低限度之需要。此外，波蘭政府應允在搬遷東普魯士及奧德河以西區域的德國人以後，給與土地與貧農。據一九三一年統計，小農擁有地產不及十二畝半者共達一百九十萬戶之多，新土地法令施行之結果，估計受惠的農民會有三分之二。

波蘭現政府雖然增加了好幾位民主政黨領袖，但政權的左傾性皆並沒有根本改變，因此，業在實行中的社會經濟改革不會因而停頓，何況這些改革，有許多本來一向也是倫敦流亡政府一派人的「口惠」呢！

八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的左右兩派鬪爭，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德軍佔領該國以後。當時南斯拉夫的統治階級重要分子逃往倫敦，跟隨彼得幼王，留下舊日南國正規軍的一個將軍米海洛維芝在南國收容戰敗的軍隊，其目的是在等候聯軍大舉進攻時，出而響應。左派民衆則在共產黨人狄多將軍領導之下卽刻發動游擊戰爭。這左右兩派的武裝時常發生衝突。米海洛維芝一派惡於左派勢力的日益擴張，免不了和敵人有些勾搭，至少有按兵縱敵的嫌疑。結果，英美乃一變原來贊助米海洛維芝的政策，以全部軍需品物援助狄多。這樣，狄多將軍就成爲南國的正式實力派。

左派旣擁有廣大的民衆，又有軍事實力，在政治上右派當然只有讓步。所以南國流亡政府的內閣總理梭巴昔智於本年初和狄多將軍成立一個協定，實行一個代表南國三大民族的三人攝政制度。在攝政制下，一面正式罷免米海洛維芝，一面把流亡政府的若干人物加入游擊隊所組織的政權，卽作爲南國的正式政府。

彼得幼王最初反對上述合併辦法。但是梭巴昔智堅持實行那個協定，他也沒有法子制止。本年三月九日，南國新政府成立，以狄多將軍爲內閣總理，梭巴昔智爲外交部長，另外加入了一些穩健派人物。至於英美在雅爾太會議中所主張的把未曾與敵合作的舊國會議員一百名加入新國會，則因爲「合作」二字解釋的困難，以及舊國會議員選舉法係以保證政府派候選人當選爲目的，缺乏民主精神，至今並未能實現。

九　羅馬尼亞

在這場戰爭中，羅馬尼亞原是軸心的附庸之一。雖則在去年夏間，羅馬尼亞的德軍業被紅軍趕走，親德的首相也被國王下令拘捕；但是在紅軍的秋季攻勢中，羅馬尼亞仍是紅軍的一個主要軍事根據地。本年二月，羅馬尼亞的社會黨與共產黨指摘拉德斯果將軍內閣肅清法西斯餘孽不力，要求改組。蘇聯也以該政府不穩定，影響軍事進行爲由，出面干涉。結果，乃由左派分子合組的「民族民主陣線」的領袖之一葛羅扎氏出組新內閣。新內閣是聯合性質，其中有戰前的一位首相充任副首相及內政部長，有共產黨人充任司法及宣傳部長。

新內閣成立的第一樁工作便是請求蘇聯把匈牙利在一九四零年特德軍勢力佔得的頃西文尼亞北部交還羅馬尼亞，這個請求，卽得到蘇聯的應允。這樣新政府的聲望徒然增高，地位因而穩固不少。

新政府對於上述地方的治理，採取培植民主勢力，不分種族界限的政策。那裏的匈牙利種農民與羅馬尼亞農民同樣分得土地，匈牙利人也可以充當公務員，政府又創辦匈牙利語文學校，並且准許匈牙利人成立民主團體。

新政府的第二個重大工作是土地改革。因爲羅馬尼亞在第一次大戰後曾舉行土地改革，所以這次改革，就在社會變動而言，不及隣邦匈牙利之厲害。新政府於三月二十二日發佈土地改革法令，其重要內容，第一爲沒收：(一)曾與納粹合作的德國人或德種人，(二)戰事罪犯，(三)對國家大禍的負責者，(四)向敵國逃避，或自去年八月二十三日起逃往國外之不在地主，(五)擁有一百二十五英畝以上者之土地，實行分配，作爲農民的私產。第二是政府知道農業經濟繁榮，不能單純靠分配土地，所以規定凡從上述被沒收之土地得來的一切曳引機及其他農業機器，完全歸於國家，由國家設立農業區域中心，把機器租與農民使用，並指導其改良農業技術。因此羅馬尼亞的土地改革，一面是維持私有財產制度，一面採取蘇聯集體農場的若干辦法。

羅馬尼亞土地的分配，係由貧農及全縣土地之農民組織特種委員會辦理。新地主獲得土地也須少許償付代價，視其經濟情形，分十年至二十年的期間歸還。

第三個重大工作是懲治戰事罪犯及法西斯分子。這一項引起的糾紛最多。因爲有些人，例如農民黨首領曼理阿之類，在新政府視爲係法西斯分子，但英美則一般稱其爲民主政黨領袖。本來英美對本年二月間羅馬尼亞的政變，批評蘇聯獨斷獨行，未與他國磋商，蘇聯則反唇相譏，說英美不應干涉羅國內政。九月間，羅國內閣總理葛羅扎氏從莫斯科會商回來後，宣佈羅國將舉行「最自由的選舉以證明民心的傾向」，同時宣稱反對派的運動未足以動搖政府。

一〇　匈牙利與保加利亞

這兩個國家在戰前一向受着反動政權的統治，希特拉勢力突興，它們更輸入了納粹主義。蘇軍勝利以後，這兩個國家的社會變動也最爲厲害。但是在目前二者對政治及經濟改革之着重點卻又有些不同。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匈牙利成立了一個聯合政府，以一個著名的舊日陸軍軍官米克洛斯爲內閣總理，內閣閣員包括軍人，名流，及以前的民主政黨領袖。在政治色彩上這個政府是保守的，因此，也比較得到英美的認可。

但是這個政府的經濟改革，在歐洲卻又最爲重大。匈牙利的土地集中，爲任何歐洲國家所未有。據估計，三千地產共擁有土地九百萬英畝，約及全國土地三分之一。聯合政府的土地法令規定凡是超過一千畝的地產，一律無償沒收，教會地產也限定不得超過一百英畝。這些土地將分配與三百萬農業工人。這個改革，將予匈牙利的貴族與大地主以極大打擊。

保加利亞的臨時政府是去年九月八日由政變而產生的。政變的主持者是一個親俄的秘密組織，名爲「祖國陣線」，其中有共產黨人，社會黨人，軍官及農民領袖。但是一向主張議會制度及民權的農民黨不在其內。新政府仍然維持攝政制度，但是攝政的二人之一是一位著名的共產黨首領。新政府甫經成立，卽刻組織「人民法庭」，大行拘殺親法西斯的分子，而且就是農民黨的領袖，也被政府防範干涉，不遺餘力。譬如農民黨首領第米田夫逃往美國寓所，新政府甚至派兵駐在寓所前面，實行監視，直至美國和蘇聯交涉，方始撤退。最近消息，新政府下有些過激分子，行動越軌，甚至被蘇聯駐軍槍斃示儆。

保加利亞的自耕農很多，土地並不怎樣集中，所以關於經濟改革，「祖國陣線」的政綱中只籠統說「注重勞動者利益，……提高一般人民生活水準，」並不怎樣驚人。但是在政治方面的左傾，則遠較匈牙利爲厲害。甚至就是美國自由主義派的刊物，如「民族週刊」

「新共和週刊」也批評保加利亞現政府在排斥異己方面手段過份。新政府本來擬定在八月二十六日舉辦全國選舉，但是選票上只有政府黨的候選人姓名，引起英美的嚴厲批評，認爲違反民主精神，「祖國陣線」中的若干社會黨與農民領袖，也嚴重抗議，新政府不得已乃宣佈選舉延期。如果英美也實行干涉希臘的白色恐怖運動，則保加利亞的紅色運動，也許有少許冲淡的可能。

一一　奧國與德國

本年四月二十九日，蘇聯宣佈奧京維也納成立新政府，以第一次大戰後奧大利共和國首任內閣總理社會民主黨領袖雲萊博士爲內閣總理。閣員有六名社會民主黨人，三名共產黨人，及四名基督教社會黨人。就新政府的組織成分看來，本不是一個極端左傾的政權。但是英美因爲新政府的成立，由蘇聯一手主持，沒有和英美商量，認爲有違雅爾達協定，拒絕承認。不過承認奧國獨立，以前曾經見於三強的鄭重宣言，佔領期間勢不能不較德國爲短，而且新政府在本質上本來是各方都可以接納的，所以八月初的波茨坦會議中答應「在英美軍隊進入維爾納以後，由三強商定增加臨時政府之權力。」

德國的情形與奧國不同。因爲聯軍佔領德國的時間必然較長（有人主張十五年，有人主張六十年）。所以德國的中央政府現時很少有產生的可能性。不過紅軍所到的地方，一切反法西斯的政黨都能公開活動，其中以共產黨與社會黨的工作最爲緊張，這會是將來德國新政府中的最重要勢力。八月十一日法國社會黨開會時，德國社會民主黨致電道賀，並且聲稱將努力「重建國際社會主義」，足見他們的抱負不凡。

英、美、法在德國的佔領軍防區以內，最初完全禁止政黨及工會活動。但是卜斯丹會議中決定在不妨害軍事的場合，准許他們有活動自由。

奧國及德國之經濟改革，暫時還只有沒收納粹分子及戰事罪犯等之產業，取締大規模託辣斯等數項。但本月九日紐約時報載奧國臨時政府的商務部長擬議國有動力、礦產、石油、鋼鐵、及國營重電汽設備，火車頭及車箱之製造。

一二　捷克與芬蘭

上述東歐戰後成立的一些政府一般都被視爲蘇聯的製造品。但那裏至少也有兩個例外，那就是捷克與芬蘭。

捷克政府一向是一個民主的比較進步的政府。在以前，它一面聯英法，一面聯蘇聯；但是因爲在慕尼黑會議時，捷克被英法出賣，而當時對捷克表同情，甚至願以實力協助的，只有蘇聯一國，本年捷克之解放，又得有蘇聯很大的助力，因此，捷克朝野上下無形中特別傾向蘇聯。關於軍事，經濟，及文化事業等，自動願與蘇聯合作。本年四月七日捷克新政府成立，以左派社會黨員前駐蘇大使菲耳令格爲內閣總理。閣員中有七人是共產黨員，佔有內政部長，教育部長，宣傳部長，及副閣揆等重要官職。

就經濟政策說，捷克因爲一向是比較進步的民主國家，社會矛盾不及東歐其他鄰國的尖銳。但是在本年四月三日貝納斯總統遄回捷克以先，捷克政府業經宣佈如得國會通過，全國的關鍵工業有國有國營之可能。事實上，這些工業在戰時幾全被德國人沒收，所以今後交由集體經營，也比較方便。據九日紐約時報消息，捷克業已國有了五一三商業機關，二四七五工業組織。貝納斯總統對該報記者說：「每一個現代戰爭同時也是革命之一部份。當革命走向極端時，引起了反革命。捷克的革命業已停止在一點，其性質是永久的，不會有反動。捷克永遠會是一個若干基本工業國有國營，而同時具有合作事業及自由企業的國家。農業及動產會永遠是完全自由的。」

芬蘭是這次的一個戰敗國家，但是因爲其民性強毅，社會內部也較少衝突，所以戰後還能維持其基本社會與政治機構，少受外力干涉。不過在整個歐洲的左傾狂潮中，芬蘭也不能居於例外。本年三月

十七七八兩日芬蘭舉辦國會選舉，在兩百議席之中，左派政黨得到了一百零三二席，其中明白親俄的「民主同盟」——係以共產黨爲核心組織——得到了四十九席。右派政黨只得了九十七席。左派的社會民主黨中本來分成親蘇反蘇兩支派，目前似乎是親蘇派得勢。假使他們與共產黨合作，那就可以在國會中佔多數。新內閣是一個廣泛的聯合內閣，十八個閣員中有十一個是左派人物。

芬蘭目前內政上的核心問題，與其說是經濟改革，不如說是懲治戰禍負責人問題。在對蘇戰爭中，不僅右派大費氣力，就是社會黨中也有許多是支持政府的。如果一一追究負責人，當然牽連很廣。但是內閣總理派西起維氏在八月底曾經警告國人，謂與其讓蘇聯來要求懲治，不如自動懲治，所以這一舉大概最後還是免不了的。

一三　亞爾巴尼亞與希臘

亞爾巴尼亞在這場戰爭中很早就被墨索利尼佔領了，但是亞國雖小，民性卻很強悍。在過去幾年中，他們組織了抵抗運動，不斷與佔領的意軍鬬爭，以至於完全恢復獨立，現時的亞爾巴尼亞完全在左派掌中，其經濟政策，一面側重於沒收意大利在農業礦業方面的一切投資，一面側重土地改革。在以前，亞國的土地有百分之八十屬於地主，地主每年向佃農取得三分之二之收穫。現政府正在把土地分與農民，同時減低租稅。此外，又在設法發展工業，尤其是煤油採煉工業。

戰後歐洲政治上的一個最普遍傾向，是戰爭期間從事抵抗運動的分子之抬頭，這裏唯一的例外是希臘。

戰前的希臘是一個獨裁國家，一九四一年希臘被德軍佔領以後，希王出亡海外，希臘左派民衆則組織「民族解放陣線」，發動一個極堅強的抵抗運動，與德軍作幾年的殊死鬬爭。這個運動的主要目標，對外是抵抗德國，對內是建立一個民主政府。當去年十月德軍撤退時，他們幾已佔有全國三分之二的土地。

希王出亡海外時，也帶領了一些殘餘海陸軍，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不穩固，所以當回到雅典檢閱軍隊時，須請求英國軍隊先將希軍繳械以防不測。這樣，引起了本年初六個星期的猛烈內戰。「民族解放陣線」的軍隊因爲敵不住英國大軍的坦克與飛機，在二月十二日停戰議和。其條件是停止戒嚴，釋放人質，赦免抵抗運動分子，肅清親德分子，保證民主自由，成立國家軍隊，舉辦選舉及人民總投票以決定王室的前途。

希臘現時是以大主教攝政，以保王派的海軍部長爲首相。到了最近，保王派認爲右派勢力業已根深蒂固，主張從速辦理人民投票以決定王位問題，英美兩國也已經答應派員參觀選舉，但是蘇聯認爲在右派這樣的恐怖政治之下，希臘沒有選舉的自由可言，謝絕參加。同時希臘的中和派政治領袖若干人也發表宣言，說大部份選民不敢投票，註册人數在許多地方僅及百分之五，主張把選舉延期。

八月十一日英國工黨執委會主席拉斯基教授對法國新聞界發表談話，說英國政府業已完全改變其對希臘的政策，在希臘希冀『選舉一個眞正的民主政府，卽令因此而招致「民族解放陣線」抬頭，也在所不顧。』假如英國工黨政府眞的這樣做，希臘的政治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所以，左派最近在希臘又開始活動，街道的許多牆壁上都寫着阿特里和拉斯基的名字。不過事實上工黨政府對英國的外交政策改變得很慢。最近希臘的大主教到倫敦去，大概主要是談商希臘的內政問題。

關於經濟政策，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主張是規定工資及工作時間，組織農民合作社，國有鐵路，銀行，公用事業，舉辦大規模公共建築，包括公路，學校，及醫院在內。

一四　西班牙與葡萄牙

這兩個國家都在獨裁政權的統治下，人民的意志是很難表現於行動的。但是過去幾年中，西班牙的共和黨人仍在山嶺區域不斷作小規

模游擊戰爭，法國光復以後，他們更形活動。最近共和黨人在墨西哥正式成立政府，而英美對西班牙的政策也在改變中，所以西班牙政局的轉變，只是時日問題。在目前英國大概希望西班牙復辟，蘇聯大概比較同情於西班牙最後的勒格永左派內閣，美國大概有可能傾向於贊助新近在墨西哥成立的政府。這三者的傾向之間顯然有許多分寸，但佛蘭哥下野，則逐漸成為他們的一致主張。如果佛蘭哥獨裁政權崩潰了，與西班牙陸地毗連的葡萄牙之獨裁政權，恐怕多少也會受着一些影響。

一五　瑞典與瑞士

這兩個國家，在這場戰爭中，也是守中立的，而且因為平日所行的本來是民主政治，所以在戰後大概不會有甚麼很激烈的政治變動。不過最近瑞典政府也在開始清查德國在瑞典的經濟勢力以及對德同情的分子。瑞士政府曾屢受蘇聯指摘，如果想要加入聯合國，大概在政治方面，也許須有若干的人事變動。

一六　結論

如上所述，戰後歐洲的政治情勢，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特徵：

第一，整個歐洲，自東至西，自南至北，不論是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抑或條頓民族，都在左傾。左傾的程度和步驟容有不同，其為左傾則一。

第二，在東歐國家，左傾的具體表現，最顯著的為土地改革。從社會進化史講，這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只能算是對殘餘封建制度的革命。這個革命的目標，在使農民分得土地，主要上仍然維持私有財產制度。

第三，東歐國家，雖然不能跳過歷史的必經過程，即刻走上社會主義之路；但是因為其隣近社會主義的蘇聯，而且領導這場反封建革命的中心分子，大都是社會主義的景仰者，所以在他們所主持的政權下，雖然不會用「拔苗助長」的方法提早實現社會主義，但是一面不會容許私人資本主義怎樣抬頭，同時會儘其可能擴張國營事業的範圍，至少對於經濟活動，增加公共的干涉與統制。

第四，西歐國家，因為資本主義比較發達，工業勞動的人數比較衆多，組織也比較堅固，所以政治運動的目標側重實現社會主義，至少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一部份。不過西歐左傾的目標雖然較之東歐為更進一步，但是就階段說，則其實現的成績還遠不及東歐。這裏的基本原因是：西歐的左派運動雖然逐漸得勢，有的還沒有完全得到政權，有的雖則大權在手，但是為時甚暫，或者環境困難，還不能有很多的表現。

第五，戰後歐洲各國的左傾運動，一般以戰爭期間抵抗敵人最力的分子為中心。這個現象之構成，主要由於右派及上層階級之未曾努力參加抗戰，甚或與敵人勾搭。其結果是：抗戰的左派分子用鐵血換來的江山自然不願拱手讓給顯敵親敵或逍遙海外的右派。流亡政府之一般失勢，就可以拿這一點來解釋。當然，在蘇聯勢力所及的東歐國家中，左傾運動，也許有為蘇聯發蹤指使或武力促成的嫌疑，而且行動有些也許未免越軌；但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社會矛盾平日實在太尖銳，封建勢力壓迫人民的手段太殘酷，所以舊秩序一為戰事動搖，廣大羣衆一經解脫桎梏，其心理易趨變態，報復易走極端。甚至有些並不依附或同情軸心的民主分子，也在這一場狂風掃落葉式的大運動中連帶被波及。但是這個運動並不一定要依賴蘇聯的武力而後發生，同時，除非右派假借外國的武力保護，實行恐怖政策，恐怕沒有方法可以鎮壓它。

第六，東歐的左傾運動，手段比較激烈，有些甚或未免越軌。西歐的左傾運動，則大都會經由民主的，合法的程序。當然，如果西歐的舊日統治階級，不知道順應潮流，一意孤行，根本拒絕改革，則那個運動也不見得沒有演成「挺而走險」的可能。這裏，美國的舉動很關重要。因為美國不僅有力量可以予那些國家以巨大的物質贊助，而且可以把羅斯福總統「釜底抽薪」的新政精義介紹給它們。

蘇聯的財政制度

徐日琨

我們立國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經濟制度國家之間，實行民生主義經濟制度，此項經濟制度有它固有的特質和範圍，與英美資本主義的制度不同，而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制度有別，因此我們應當擇兩者各方面之所長，以補我們之所短。就財政制度而論，過去國人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等，曾有不少人加以研究和著述，但是於共產主義國家的蘇聯的財政制度，卻很少作有系統的介紹，原因或以過去材料缺乏，或因報道不正確。最近以資料較完備，我們特別加以敍述，或有可供我國採擇之處。

一　蘇聯財政制度的結構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蘇聯財政制度根本的基礎，蘇聯經濟的結構在她的憲法中規定非常明顯，從經濟上觀察，蘇聯有兩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財產——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兩大柱幹——：(一)國家財產——包括土地、礦藏、水利、森林、工廠、製造廠、交通、銀行、郵政、國營大規模農業，及城市與工業地點之市政企業及主要住宅等；(二)合作社與集體農場財產——凡集體農場與合作社之公共企業，及其工具與耕畜，出產之生產品，以及公共建築物，均爲集體農場與合作社之公共財產（憲法第五條）；此外，(三)在農業方面尚有少數私人自力經營，而毫不剝削他人勞動之個人農民；以及(四)城鄉無數爲求滿足自己消費的勞動者，上述四種經濟單位的所得均取之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其收入的來源全由工資基金所組成（一九三七年達七百八十億盧布），和附屬於集體農場的私人經濟出產品而來，因爲集體農場之每一農戶，除從公共集體農場領得主要收入，即每一農戶爲公家耕種應得按照其勞動價值獲得之報酬外，每戶可以有小塊園地（約十五畝），供給其個人使用，在這塊土地上所有副業以及住宅生產品牲口家禽及小農具等，均爲個人的財產。蘇聯財政制度的組織即與上述經濟結構吻合的。

關於國家財政及基此而生的經濟組織，就是國營企業。其財政制度是一意確立一種基金的蓄積（即成本與售價差額之盈利，及資本償還金），把這些蓄積基金投入，重行分配於經濟組織間的各部門，以及各項需要。同時，財政制度藉國家銀行爲溝渠，安排國有企業，并互相調劑他們各部門的營業。至國營企業的臨時需要經濟的來源，貯積於國家銀行，其分支行有三千，分佈全國，係專門做短期放款的機構。

關於國營企業蓄積基金，由兩種方式進行：一部分得自徵稅方法，即在產地出售產品時徵收營業稅（或稱躉售營業稅），這種課稅是從盈利中提出一部分。另一部分基金的蓄積，除了以營業稅方式提取作累積外，則照總清賬上留有盈餘向預算中提取。

至另一形式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即集體農場與合作社——其財政制度限於集體農場及合作事業徵收所得稅。而營業稅，祇有手工業合作社出賣產品時始行徵收，其目的在維持國營企業與合作企業產品價格的一致，照例工業合作社所付的營業稅率皆列入小工業之林，通常較國營企業所納的稅輕得多。

個人自力經營的經濟單位繳納與所得稅相似的兩種稅，不過稅率較合作農場所納的爲高，我們上面說過，農場所得稅是根據其總收入計算的。

末了，勞動者為着自己消費而生產的經濟經營，繳納遞進所得稅。

蘇聯財政的結構，不僅大受社會經濟機構的影響，並且受聯邦政治組織的影響。蘇維埃聯邦是十六加盟共和國的聯盟(Federation)，其中有幾個是自治共和國，財政制度的組織完全反映她聯盟的組織。因為每個共和國有她自己獨立的預算和她的地方預算制度。

每個共和國雖完全享有自主的權利，以適合每個聯邦地制宜的組織，可是蘇聯財政制度卻根據內部統一的原則。這種原則首先表示財政制度與蘇聯社會主義聯邦的經濟計劃底目的相合，且適合憲法，以決定全蘇聯的經濟生活。統一的原則在兩個基本事實上表現最為明顯：一為聯邦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每年批准蘇聯國家預算，包括聯邦政府預算及各加盟共和國的。後者是先由各該政府所批准的。其次為蘇聯最高機構批准一切稅捐，與其他中央及各共和國及地方收入之來源，俾財政政策趨於一致。

無疑，財政政策統一原則，自然引起某種財政關係的集權，結果全聯邦政府預算所估的數量，遠較各共和國的預算為優越。一九三七年，在預算支出總額九百八十億盧布中，而全聯邦政府則為七百五十五億盧布。全聯邦政府預算之所以如此龐大，有它的理由存在，一則由於這個預算，它引導大量重要的支出，以培養國營經濟事業(三百八十四億盧布)。二則由於這個預算，使有關國防支出趨於均衡。假如我們研究支出的分配，全聯邦的預算可以稱為經濟建設的預算；至於聯邦共和國預算和地方預算，我們可以說是社會及文化事業的預算。一九三七年，這種文化等支出在各共和國預算中佔百分之六十七，地方預算中佔百分之七十一。結果財政方面集權與分權互相拉掣。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無論是全聯邦政府或加盟共和國政府，均不能各自隨意設置稅收機關，此種機關概由中央權力所規定的地方機構管理，換句話說，就是勞動者的代表的地方蘇維埃。蘇維埃的財政機構是執行凡是關於它預算有關的收入的工作的。

二　蘇聯是計劃的財政

蘇聯財政的組織原則是計劃，所以「計劃財政」這個名詞特別適合於蘇聯財政。財政計劃的樹立，可說極嚴格地配合國家經濟計劃，如此才可保證蘇聯財政的穩定。此種穩定狀態事實上表現非常明顯，不僅蘇聯財政上完全免除預算上發生的短絀——因為計劃經濟制度短少根本不發生，——但還有執行財政計劃亦保證對於短絀的防止。

每個管理財政的機構應將每年的財政計劃編立起來，每個經濟組織樹立它們財政活動的計劃，先由基層細胞把各種計劃，依類別集合起來，送給人民委員會。由它們上級機構審查，改正，及批准，於是才達到預算計劃，才有國家經濟事業的各種財政計劃，然後始達到巨大的財政組織。各計劃的中央機構就是「高司卜蘭」(Gospean)(即蘇聯國家計劃委員)，這些計劃由它編列並與國家經濟總計劃相配合。各種不同的財政計劃由「高司卜蘭」集合起來編成總財政計劃，以觀察各部之計劃在不同的財政制度中是否平衡，總預算的收支賬目是否相符。國家經濟事業的計劃與政府計劃的聯系是蘇聯財政制度穩定及堅強一種最好的保證。

蘇聯財政關係與財政活動是根據兩種實際活動的原則而組織的：一是預算計劃原則，另一是經濟總清賬(bilane consmique)原則，後者作每個企業所得的成果及任用的方法以檢別其活動之標準，至於前一項原則的實施，即管理各項行政組織及各種機構向國家預算支取的財務手續，換句話說，就是開支的範圍和母金投資問題。至於經濟總清賬主義，就是使經濟組織的財政工作有一個獨立賬目，事業基金，及流動資本的自給，與國家預算劃開。除非這種情形，或某一個完全國營企業，它的收入與支出總額整個編入預算(如鐵道事業)，通常國營企業的營業額是不編在公共預算之中，亦不在總財政計劃之內。許多經濟機構中，一部分的蓄積基金是附屬於國家預算的，但這種蓄積金全數歸入總經濟計劃裏面。財政制度不准將各種組織及財政機構

間和國家經濟各部間的彼此自相剩餘調盤。假如某種企業認爲要實現一個擴大建設工程的計劃，其費用超過它所蓄積的基金，倘使因爲這個理由，增加預算信用成爲必要，那末祇不過從企業利益中提取百分之十撥入國庫，反之，假使某項企業在經常工作方面不需要投資，幷且超過它規定所蓄積的基金數目，那麼它將撥歸國庫一筆數目達到它的盈利百分之八十。一九三六年各邦國營企業提出之盈利，繳入國庫的總數達一百四十五億盧布（除去先對蓄積數抽稅），其中五十五億盧布由預算中累積起來，一九三七年在盈利數目二百零九億盧布中，九十三億盧布撥歸國庫。

無論如何，各企業保留總盈餘百分之二作爲特別經理基金，同時將超過批准計劃規定的盈餘半數加入在內，這筆特別基金留給企業主管人照章處置，他可用以建築工員住宅，文化及福利事業，或作爲獎金以分配給一班工廠中的工人 ，或生產行政管理人員特別有貢獻的人。一九三六年業務報告可以看出這年獎勵費的重要；撥入國庫盈餘數目竟達一百四十五億盧布，超出計劃估計數爲十八億盧布。戰事發生以後，此項基金已由其他獎勵成績優異工人的辦法所代替。

三　蘇聯財務的監督

在蘇聯聯邦及各聯邦自主共和國，財政制度的監督是集中於人民財政委員會，至地方預算和地方經濟的監督，則在勞動代表地方蘇維埃的手，國家企業財政的監督，其管理權屬於各種人民委員會，它們指揮國營企業各部分。蘇聯人民財政委員會是一個最高監督機構，它決定整個財政制度的方針。

蘇聯監察財政的目的非常廣大且異常徹底。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不僅使財政紀律不致發生混亂，且能事先預防。財政監督深入生活中心。它每每在財政機構運用中執行一切，利用財政職務上的轉移的鍊條(courrois de transmission)，財政監督隨時警告執行計劃時所發生之危險，尋求其原因，立刻加以干涉。它設法去消滅計算方法上錯誤的原因。一切經濟活動和一切經濟方針都是根據經濟總清賬，至於一般財政機關和金融機關的活動，都完全依據監督原則。監督手續很便利，事實上即每個組織的業務進行都要根據它自己的批准計劃。財政機構因爲有監督作用，所以對於計劃的執行，極爲謹愼，幷負責任。

財政監督在蘇聯財政制度上特別注意主要支出：就是關於國家經濟組織的財源問題。這種財源主要有兩方面：一提自國家預算，和另爲各部門國營企業自己經費來源，列於預算上的財源如基金的損失和企業所編列的合法資本。這就是長期信用放款銀行的方法，此種銀行組織底目的就是供各種國家企業通融資金之用。每個銀行投資某項企業是有分別 ，幷由蘇聯人民財政委員會加以審定。銀行都是監督機關。銀行組織是根據二個原則：每個銀行規定投資某項國營企業，而某個工廠祇能向某一個銀行通融資金。銀行設有分支行，由國家銀行的分支行通達各處，舉行短期放款。無論在某種場合之下，國家銀行總是在長期信用銀行中派定會計。

通融資金的銀行把所要投資的基金聚積起來，凡政府由預算上撥給這班銀行以核准辦理大工程的資金，或某些企業的從盈利方面所蓄積的基金，或向銀行存儲的償還金，均可作爲投資，銀行根據批准的計劃有權干涉按期付款，及國家經濟組織所交納之款項。

這些特別銀行的干涉擴張到巨大工程方面消費的支付，監督包括消費方式及其基金用途。銀行有權不付未核准而在計劃欄外的工程款項。對於一個工廠沒有估價單或超過預算數，銀行可不放款。這些特別銀行可以對顧客（各企業及機關等）任意停付款項。

四　短期信用與經濟機構的週轉資金

我們敍述蘇聯經濟制度，如果略而不述其短期信用組織，及社會主義化的經濟組織的週轉資金，那就不能認爲完全。在蘇聯，短期信用完全集中於國家銀行，其分支行遍設全國，可以說國家銀行是世界上最大的銀行。除了短期信用而外，國家銀行負有調節貨幣流通的功

效，和國家各部門間款項匯劃的處置。國家銀行並擁有發行權。

蘇聯短期信用制度的一致性，並不是它不能由一個銀行代表，因爲目前蘇聯法律尚未允許。所謂商業信用，即以期票代替，由某企業向某企業支取，祇有銀行信用和各企業間劃賬制度下才准使用，而且強迫由銀行居中施行。一切企業都擁有一個獨立總清賬，在國家銀行制度中有它的賬目格式，供給者與顧主均根據預算而按照這劃賬的方法執行。

短期信用與劃賬制度推行頗爲簡單，預先規定有妥善辦法，尤其允許各經濟組織自己所周轉的資金。這種工作實施範圍至廣，以完全確保生產與交易間之常態實施。根據生產程序的擴張和商品流通計劃，每年在財政計劃上註明一筆確實的數目，以增加自己周轉的資本。這筆款項的數目首先從各經濟組織內自己所蓄積經費支取，假如數目不足，再向預算中所規定的信用項內提取。一九三七年各經濟組織的周轉資本增加至一百五十億盧布，在財政計劃中，這項註明是「國家經濟通融費」。

一班企業都擁有自己的週轉資本，使它們能夠照常進行。借款的准許祇有在某種情形之下，即某項企業確實證明需要，因爲季節性的關係，可增加週轉金。這種季節性的增加，主要是大批的農業原料品如棉花、小麥、羊毛、糖蘿蔔等的購入，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貨品由生產者轉移到消費者，銀行依貨品數量放款，並以貨品的收條拿來運銷。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蘇聯的銀行信用是堅固底建立於贖回的原則和短期信用之上。

週轉資金季節的增加可以完全計劃化，所以銀行季節放款，可以稱爲計劃信用。但是假使一種意外事件在企業中發現，阻礙它的營業照常進行，譬如運輸困難或顧主付款太遲，那銀行就有權准許它在計劃所規定的另外借款。

國家銀行資產的主要來源，就是自己的財源，每年由銀行利潤百分之五十釀積而來（另外百分之五十屬於國家預算）。其次就是各經濟企業調盤賬目數額，和預算所規定銀行透支於行政機關，社會機關，及金融機關如儲蓄機關等所得。末爲銀行管理一切全聯邦共和國及地方的預算之經濟收入和支出，結果它的賬單上常常保持預算需要大量的資金。至集體農場的大量發展和它們的貨幣流通甚迅速的擴張，成爲銀行新資產一個極多及速增的新來源。

至於負債方面，銀行付給顧主的利率二厘至四厘。因此我們上面所說的銀行放款由經濟組織的計劃所限制，因此銀行利率沒有作用，但在別的國家則爲貼現率所支配。利率長期不變，銀行主要底目的作爲經濟劃賬的工具而反映利率在生產成本中的地位。

工業化使蘇聯經濟運動達到蘇維埃聯邦每個角落裏，即遠處落後的北極地帶亦受了影響。實際上工業化發展經濟運動的容量，結果也就是擴展信用運動。自一九三七年正月起，蘇聯國家銀行放出款子的總數達三百五十億盧布。一九三七年又另新增信用五十九億盧布。

從法律方面言，國家銀行活動的傾向是「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總計劃」，這種動向每年由政府批准的放款計劃所規定。銀行信用計劃化事實上很便利，即每個企業——銀行的永久顧主——有它自己的財政計劃，可以預窺某一時期或某一季節需要週轉資本的擴大。而財政計劃化亦很方便，即一切信用機構均集中於唯一的國家銀行，而國家銀行亦就是各社會主義化經濟組織間劃賬的唯一的中心，這使蘇聯國家經濟很堅強的建立，并且防止信用及貨幣膨脹的惡果。蘇聯全國經濟建立於信用計劃化及貨幣流通計劃化之上，有了這一個條件，遂使蘇聯全國經濟逐步發展而永無經濟恐慌。

五　兩個五年計劃及其財政結果

一九三七年蘇聯有兩個紀念：一是蘇維埃聯邦成立二十周年紀念，二是發展蘇聯全國經濟五年計劃完成紀念（一九三三——三七），在過去幾年中，也和其他事業成功一樣，蘇聯已經創立一種和諧及強力的財政制度，切實而活躍，證明它能動員舉國的經濟財源，以促成

兩個偉大的五年計劃的實現。我們看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財政制度已集合一千二百零一億盧布。至第二個五年計劃，已三倍上述之數，其總數已達到三千五百五十五億盧布，較前計劃多至三倍。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中，兩項事實可以證明蘇聯財政制度的迅速進步和結果優良：執行財政計劃漸臻制度化，及在預算上收入超過支出。後者是財政上最重要的成功，由於下列一表，可以證明：

年別	收入（單位億盧布）		剩餘（億）	
	計劃中預測	實收	收入超過預測	收入超過支出
一九三三年	三九〇	四四三	五三	四四
一九三四年	五二〇	五五〇	二〇	二五
一九三五年	六九六	七一七	二一	一一
一九三六年	八三〇	八八五	五五	一八
一九三七年	一〇四・一	—	—	一〇

第二次五年計劃中之前四年，收入已超過計劃上所預計數達一百四十九億盧布，而超過實際支出達八十億盧布。

根據蘇聯通行的法令，預算剩餘不能併入下期預算，而在國家銀行開一特別賬作爲國家銀行的資產。

由經驗證明這些預算的基金，在近年來曾達到執行全國經濟計劃財政來源平均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其結果有人認爲五年來預算的收入總數，可以表明一切財政制度活動正確的結果。在這五年中，預算動用三千六百三十六億盧布，假如我們在這個數目上加上百分之二十五，我們就可以得到歷年執行預算大約數目的問題。這將達到四千五百億盧布，或者較五年計劃所規定的數目三千五百五十五億盧布多了百分之二十六。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方法來計算第二次五年計劃財政部分成功的可能結果。自從建立五年計劃大綱以來，把它依每年分成爲各段。一九三七年亦是如此，是年財政制度的總收入在五年計劃中已決定八百四十億盧布，所以一九三五年財政計劃參照過去幾年所執行的經費，據報告爲一千三百七十九億盧布，約增加五百二十九億盧布。

五年計劃中所謂將來國家經濟與財政的發展必須首先配合，雙方均係重要和必需，因爲每年建立實際計劃就有一個綱領，彼此可互相接續，按步進行。兩者配合的計劃遂使其在切實執行工作時漸趨完善。每年實際計劃，當執行國家經濟各部門如工廠等，應顧及它有新的可能性。我們再詳細說，一九三七年執行財政計劃所多餘的五百三十億盧布正合乎五年計劃所預定的數字，其中四百九十七億盧布來自社會主義經濟蓄積的基金。這點清楚表示輔助收入的來源，由此證明蘇聯財政的成功幾完全由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而吸收大部國民所得的緣故。

六　戰爭前夕之財政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蘇聯財政制度在一九三七年動用一千三百六十九億盧布以實現國家經濟總計劃，較一九三六年計超出二百八十二億盧布。在一千三百六十九億盧布中，國家預算供給一千零四十一億盧布（佔百分之七六）。又一千三百六十九億盧布總數中，主要包括社會主義經濟事業的蓄積金（一千一百四十八億盧布，或佔百分之八三・八），償還基金五十八億盧布（百分之四・三），人民直接所納之賦稅，國家公債收入，儲蓄金，保險費等爲一百二十七億盧布（百分之九・三），最後其他收入爲三十六億盧布（百分之二・六）。

社會主義化經濟組織之蓄積金所佔的地位，在一切收入來源的總數中漸漸增高，一九三六年佔百分之八一・四，在一九三七年增加來源總數二百八十二億中，有二百六十三億是由社會主義經濟組織所蓄積。這是現在蘇聯財政制度最特別之處。另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們觀察提取所得稅後的資金蓄積和屬於總清賬中的盈利，步調不一致。一九三六年，營業稅的總收入較上年增加百分之一六・六（由四

百零七億盧布增到四百九十一億盧布），而預期的盈餘數目則增加百分之四四·一，後者原由特別明顯，因售價不變，而賬單中所收入的盈餘，當決定於二個因素：執行有數量的生活計劃，和尤其減低主產成本的計劃。

我們上面曾經提到，以公共的財源直接參加而完成財政計劃，一九三七年得一百二十七億盧布，其中八十五億盧布是在預算制度中規定有數額的。在八十五億盧布中，四十一億取之稅收——即所得稅之類，而另外四十四億，都由政府公債抵入。都市人口由工資基金（共七百八十億盧布）繳納三十億盧布的稅。至於農業人口，他們付十一億盧布，較之一九三六年繳十三億盧布稍爲減少。農業所付的稅率數額相當減低，結果是因爲農業集體化推行尚未終止。私人農民經濟的殘滓都很快的發展，所以私人經濟直接抽稅，其稅率較集體農場爲高。

從預算收入的估計，其直接從公共來的有八十五億盧布，但不要忘記與預算所混合的社會與文化工作的預算費，共計二百六十五億盧布。

根據一九三七年財政計劃，蘇聯財政上一切的支出，且照下列各類分配：

對國家經濟事業投資	六七五億盧布	佔百分之四九·三
社會文化工作費	三六四億盧布	佔百分之二六·六
行政與國防費	二六七億盧布	佔百分之一九·五
其他	六三億盧布	佔百分之四·六
共計	一、三六九億盧布	佔百分之一〇〇

一九三七年財政計劃所列的開支，較第二五年計劃中對於該年所預測的支出，計超過五百九十三億盧布。我們再看各項補助開支分配：

國家經濟事業投資	二〇七億盧布
社會文化經費	一六二億盧布
行政與國防	二二四億盧布
共計	五九三億盧布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有一筆輔助收入，共有五百九十三億盧布的開支，以分配於蘇聯主要之九部門的應用。

一九三七年投資於國家經濟的開支的總數，即六百七十五億盧布，其中有四百三十億盧布乃由國家預算流入。最大的數目是用於工業，計二百四十三億盧布，佔全部投資支出百分之三十六。農業用款爲一百十六億盧布，交通支出爲一百零六億盧布，年復一年，預算上投資於工業的數額漸漸減少。一九三五年爲百分之七十六，一九三七年則跌至百分之五三·五。一九三七年計劃中爲二百四十三億加一百三十億，這是蘇聯工業質量上極大進步的可讚美的指數，現在供給全國一切工業所需要的東西。

蘇聯工業進步，從經濟眼光看來，我們知道是增加蘇聯國防預算。一九三六年蘇聯已支出國防費一百四十九億盧布，一九三七年國防預算爲二百零一億盧布。蘇聯巨大的工業和依照大集體經濟的原理從新組織的農業，是蘇聯軍事力量的經濟基礎。法西斯蒂軍事所造成的威脅，可能隨時發生西方或遠東的侵略亟需大量國防支出以備抵抗。但是這種需要，絕不會盡耗國家再生力量，亦不會阻止五年計劃所預期的增加，尤其國家經濟組織投資，特別是社會和文化工作的預算。一切的實現都沒有增加稅收或向外面借款。舊俄羅斯決不會夢想到有今天經濟和軍事的強有力量，而從國家基本需要看，會有這樣能自給自足。

我們看到蘇聯巨額軍費的開支，因爲她要保護大量的土地，她有二千二百萬方哩的土地，一萬萬七千萬人口，四周有十四個國家所圍

綫，國境爲六五、〇〇〇公里，其中祗有三分之一是海境。關於文化與社會工作的經費，在整個預算計劃中達三百五十九億，尚有預定文化開支，在國家經濟特別計劃中，尤其主管人員開支的基金，未計算在內。我們上面已經遍及。此項支出的分類如左：

(一)教　育	二一一億盧布	佔百分之五八・八
(二)衛　生	八九億盧布	佔百分之二四・八
(三)體　育	三億盧布	佔百分之　〇・八
(四)社會保險	五六億盧布	佔百分之一五・六
總　計	三五九億盧布	佔百分之一〇〇

人民社會及文化事業費增加的原因，第一是這種制度工作的發展，第二它們活動品質的提高。一九三六年公佈關於禁止打胎及保護產婦法，幷大大確立兒童保護的基礎，如幼稚園托兒所等，同時對於無數家庭兒童的母親，給予特別津貼，這筆資金化去幾十億盧布。最後，尚有每個學生的費用，在小學裏面一九三六年爲七百四十八盧布，一九三七年則提高到一千二百九十八盧布。

一九三七年財政計劃所列的數額，表明在新蘇聯憲法下大量改進社會主義的社會生活：休息權，教育權，老年及疾病救濟權。至於勞動權，由於國營事業大投資計劃和巨大生產計劃所擔保，人民均有工作機會，而不致失業。

七　蘇聯戰時的財政概述

一九四一年，德國進攻蘇聯，以驚人速度的推進，戰區擴大，蘇聯雖受戰事影響，但其財政制度，幷無變動，惟財政措置上因爲適合戰時需要，在收入與支出方面略呈變化之勢。就收入方面說，因爲戰費龐大的開支以及敵人佔領了經濟上重要的廣大區域，造成財政上的損失，不得不另謀收入。蘇聯戰時財政收入方法是：(一)增加稅課：一方面政府對於國營事業及合作事業機關所蓄積的資金課一種收益稅，凡超過製造成本的一切盈餘都歸國家，其收入一九四四年達到三千八百三十億盧布。另一方面政府向人民課征稅收，蘇聯自開戰以後，曾頒布戰時新稅三種，一九四一年七月，按照原有之營業稅及所得稅，徵收臨時附加稅，就是對原有稅增加一半或一倍以上。第二，同年十月頒布獨身及無子女稅，是年十二月又頒布戰時稅則，規定凡年達十八歲之公民均需繳納「戰稅」，增稅收入一九四四年共達三百三十億盧布。(二)增加勞動生產率，使軍需生產成本減輕，由此節省政府支出三百五十億盧布，同時卻增加軍事工業收益，增多了對預算的收入。(三)人民自動捐獻，蘇聯人民極爲愛國，自戰事開始以來，即自動捐獻，截至停戰以前，單就金錢一類的捐獻，就有一百四十億，其他物品尚不計算在內。(四)發行公債，蘇聯政府曾先後發行公債三次，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及一九四四年，共發行公債六百十二億盧布，亦增加財政上之收入。(五)美國租借物資收入，約三百五十億盧布。(六)另外一個源泉，就是利用信用制度以動員國民經濟的閑散資金，這種資金達二百億盧布，蘇聯預算的收入，一九四一年因戰區擴大，祗收入一千九百一十四億盧布，最不利的是一九四二年，當時國庫收入跌至一千八百二十八億盧布，過後迅速增加，一九四三年爲二千零九十七億盧布，一九四四年達二千四百九十六億盧布。就支出方面說，在戰爭爆發後，遂開始變化，軍費驟然增加，一九四一年六月間德軍攻蘇，軍事費支出劇增，共爲五百六十億盧布，而地區淪陷甚大，經濟發展支出乃減少至二百一十六億盧布，文化和福利費支出也省了一百六十五億盧布。一九四二年，軍費支出爲一千零八十四億盧布，每天爲二億九千七百萬盧布，一九四三年軍費支出增加到二千零九十七億盧布，其中一千二百七十億盧布用於戰費，每天戰費增加三億四千萬盧布。是年蘇軍粉碎德國的防禦，並將經過納粹蹂躪焚刼的地方收復過來，因之建設費用開支不可少。一九四四年軍費支出爲一千二百八十四億盧布，上述數字除戰費而外，尚撥鉅大的金額以資彌補國民經濟及社會文化事業。一九四四年歲出分配，

其主要項目如下：軍費一千二百八十九億盧布，社會文化事業五百十四億盧布，國民經濟四百四十七億盧布，此外尚有一千六百億盧布專為恢復淪陷區之用。以上所述，係大略說明蘇聯戰時的財政問題。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如下

一、莫斯科大學教授 M. Bogolépov-Les finances de l'union soviétique Revue E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vol. III no. I. 1937.

二、Reddaway W. B. The Russian Financial System, Macmillan, London, 1935.

三、邵力子著——蘇聯歸來書中一章——蘇聯抗戰中之財政。

四、比較經濟制度下冊第五編——蘇聯經濟，陳瘦石譯，商務出版。

五、蘇聯財政制度，英國多布作，梁純夫譯，中蘇文化月刊。

六、蘇聯的財政政策——鮑格列樸夫教授原著，焦敏之譯，商務日報一月四號。

七、美國新共和雜誌本年一月號，內中載有「蘇聯戰費籌措方法」一文。譯文見財政評論第十三卷第四期中外財政金融消息彙輯欄。

論中英兩國之造人

儲安平

著者在本刊上期中曾撰「中國人與英國人」一文，已將盤旋於個人思潮中的中英兩國的片斷的比較，略陳梗概，茲特就此種比較所得，申述於次，以當該文之結論。

比較中的中英兩國的民性及其作風，究竟孰佳孰不佳，讀者可自行評判之。但吾人在此至少可以同意兩點：第一，中英兩國人民的性格及社會風氣確是不同；第二，多年以來，英國為一強國，中國為一弱國。此兩點皆為事實，而著者認為後一事實與前一事實實有大大的關係。然而造成民性及基於此種民性而形成的社會風氣的原因究在何處？著者以為其中原因，歸之於民族性者少，歸之於教育訓練者多。何以？蓋為今日中國知識份子所具有的種種缺點，劣點實未嘗悉見之於未受教育的農民。不像知識份子之華而不實，農民之反能務實重行，有如前述，即為中國民族所有的許多美德，其已泰半絕響於城市都會的生活中者，反能在農村社會中世代相傳保存勿替。吾人可以同意：今日中國農村社會中的風俗要較城市都會中的風俗為敦厚樸質。鄉村中的人們反較城市中的人們重信義，講氣節，崇公道。農民的心地亦較知識份子的心地為忠厚、樸實、單純、潔淨。由此可見為今日中國一般知識份子所具有的種種弱點，實非中國民族的固有的性格(natural character)，他們性格上的一般弱點，大都應歸因於他們所受的教育及所接觸的環境。

英人是崇奉思想自由的，這種崇奉自由的精神見之於學校為各種學問之自由研究，見之於社會為異己之容忍，見之於家庭則為父母對於子女的事業及戀愛祇指導而不強迫。但是在思想上，英人雖極力崇奉自由的原則，不求思想之一致，但在為人的基本精神上，則英人固大體相同，有較為一致的傳統。然而他們這種性格上的一致的傳統，究得力於何處？著者以為英人性格上一致的訓練，實大半應歸功於他們的教育。在英國，教育的主要目的即在養成一個人的優良的性格(character)和優良的風格(taste)。英國的教育極重視品性的培養，意志的鍛鍊，以及對於誠實、可靠、服務、負責等觀念的養成。造成今日那種「英吉利典型」的性格的主要力量是一、遊戲，二、宗教，三、在有規律的生活中所包含的種種傳統(tradition)；三者相輔相成，造

殊而歸同。世人均承認英人性格之定型，大得力於英國的公學(public schools)。在英國的公學或一般中學裏，書本不是最主要的東西。在那兒，正如依頓公學一個校長所說，「運動佔第一位，書本佔第二位。」英人對於運動的觀念不像希臘人那樣以達到體格均勻的人體美即爲滿足，他們復進一步以爲運動實爲鍛鍊性格的最好的方法。遊戲(game)的目的在爭取勝利(成功)，但要達到勝利，必須能夠合作；無論足球、賽舟、或橋牌，活動的方式雖異，其須合作則無二致。英人生活中有所謂 team work 者，即言全隊隊員(團體中的每一份子)均須融洽合作，以爭取全隊(團體)的勝利(成功)爲最高目的；人人均應放棄其一己的得失而爭取全體的得失。在這種需要全體合作的遊戲中，人們開始認識何謂「堅定的友誼」，並發見這種「堅定的友誼」乃爲取得勝利所不可或缺的條件。同時，遊戲的目的雖在爭取勝利，但所爭取的勝利必須是一種榮譽的勝利，甚至即使是失敗，也須是一種榮譽的失敗。所以我們實大可說：在英國，遊戲的目的雖在爭取勝利，但勝利或失敗祇是遊戲的結果，而非遊戲的精神，遊戲的精神乃在保持一種崇高的榮譽，而榮譽則從正直中產生。英人所謂 fair play, 或 to play fair，即言交易公平或舉止公正(just and upright)之意，若英人以 it is not cricket 一語批評某人之某一行爲，則該一行爲必爲一種卑鄙的，不誠實的，不受人尊敬的行爲。在英國的公學裏，殆無一不建有廣大葱鬱的運動場 (playing field)，運動場在英國教育上所佔的地位，即使不超過教室及實驗室而上之，至少亦與教室及實驗室等。英人蓋欲在運動場上培養國民的性格，造就領袖的人材。在英國的公學裏，最能代表學校的精神的就是運動，最受人崇拜的英雄人物就是各種運動隊的隊長。一個運動隊隊長所應具備的特質就是公正、勇敢、有決斷、能自持；公正、勇敢、決斷、自持等能力，從運動中鍛鍊出來，從運動中表現出來。同時，運動隊的隊長亦必成爲學校中的英雄人物，因爲在英國，無論學校或社會，公正、勇敢、決斷、自持就是成爲一個領袖的主要條件。然而著者在此以數百字之篇幅敘述英國學校裏的運動情形者，其意蓋欲說明兩點：第一、英人極重視品格的培養。第二、英人從實際的生活而不從抽象的理論培養青年的性格。(英國的教育，至少在中小學是如此，極力反對過份的書本主義，所以即使在課程方面，他們也以實用爲重。今日英國一些公學中，殆皆設有木工、印刷、裝訂、攝影、以及各種金屬製造等等實習課程，對於女生，則常施以烹飪、家政、洗衣等等的訓練，甚或設立在鄉村中的學校，園藝殆爲絕不可少的一門功課。)以空洞的理論爲出發的品格訓練，常有此耳入彼耳出的缺點，唯有從實生活從行動中鍛鍊出來的習慣，始能深入性格而成定型。同時，正因從運動及遊戲中所訓練出來的性格，能深刻永久而成定型，所以已成定型的性格，遂得表現於他全部生命，生活及事業之中。當一個學生走出學校的校門而跨入社會，參加公共生活時，他仍能發揮他在運動場上所保持的精神與原則。爲本文前幾節中所述的英人種種特別性格，殆大都和他們在運動場上所得的訓練有關。

但若離開了宗教而言英國的教育，祇瞭解了英國教育的一半。一八七〇年以前，教育在英國完全是一種私人的事業。一八七〇年以後，國家的手開始伸入教育事業的園地；但自一八七〇年以迄現在，在英國，國家對於教育的管理，較之並世任何一國均爲微弱。依照英人的思想，認爲國家無力擔負爲教育事業中最主要的一個責任——培養青年道德的責任。英人將培養青年道德的責任交與教會而不交於國家。著者固爲一個無宗教信仰之人，他對於基督教的教義也所知甚少，但他覺得基督教終不失爲一種偉大的宗教。基督教之所以偉大，乃因這種宗教的目的在對人類的良知傳出一種聖潔而懇摯的呼籲，使人們在物慾的生活中，因它(基督教)的啓示而仍能時時清醒，不致完全湮沒一個人的真正的靈性。即便離開教義，僅以教會的環境言，它也能喚起人們一種崇高的情緒。那歌德式(Gothic)的教堂建築，那直入雲霄的塔尖，聖經所代表的第一流的文學，大風琴(organ)及聖詩班 (choir) 所代表的高尚的音樂，教堂玻璃窗上的染色圖畫，橡木

的雕刻，祭壇的陳設，牧師的道袍等等所代表的優美的藝術，以及禮拜時的那種莊嚴的儀式和肅穆的空氣，使身處其中者，無一不在冥冥中得到一種神聖的啓示，一種偉大的力量，而因此種神靈的啓示和高尙的力量，使他得以抵抗物慾的誘惑，點醒自己的靈性，發生一種聖潔無比的感應。在英國，就是那些教堂及小禮拜堂，使英人在每一個星期內至少有一次機會檢視自己的過失，洗刷自己的內心，並督促自己努力爲善，要做一個偉大的（在人格上）人物。今日英人之懷有高度的自省能力及自省習慣，實丞受賜於宗教的薰陶。

抑有進者，英人對於性格的培養，家庭、學校、社會三者是一致的，連貫的，相互爲用的。世人固言英人的性格完成於英國的公學及大學，實則英人性格的培養，已開始於家庭。羅素(Bertrand Russell)嘗有大多數父母均無足夠的能力教育他們的孩子之言 (the average parents is not qualified to rear his own child)，但就英國而論，我們若出以常人的標準言之，則英國一般父母對於教養子女的能力固較他國的父母爲高，此蓋由於身爲英國公民之一的父母，即使他們並未受到任何高深的教育，但是至少他們對於衞生知識、公民道德、人生觀念、做事精神、以及一般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種種常識，習慣及傳統，其水準要較之他國爲高。所以在這樣一種「在有規律的生活中所包含的種種傳統」中生活教養的孩子，他在無形中即爲種種傳統所薰陶所育化。馬達革來加 (Salvador de Madariaga) 說，英人性格之造成固得力於英國之公學及大學，但其中若干基本的性格如堅忍不拔、始終不懈、與人合作 (stability, continuity, cooperation) 等，則爲每一個家庭內所通有者；性格的典型實開始鑄製於家庭，學校就家庭所鑄製的性格，再加鍛鍊，遂成定型。所以在英國，無論人們在思想上，事業上、興趣上如何不同，但大多數人在做人做事以及一般生活上所具有的基本習慣是大體相同的。這種「英吉利典型」的性格已成爲一種全國性的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在英國也是和諧一致的。灌輸於學生的教育訓練與社會上的實際生活並不脫節，爲學校教育中所追求的、崇拜的、輕視的、厭惡的種種性格和行爲，也正就是一般社會上所追求、崇拜、輕視及厭惡者。正因學校與社會不脫節，所以凡具有種種優性的素質而能在學校中成爲學生的領袖人物，當他跨入社會後，亦必能成爲社會上一般人民的領袖。他在學校中所懷有的理想及長處，實際的社會亦容許他充分發揮，而不致使他感到失望與悲憤。經過優性的學校教育所育化出來的人物，跨入社會後，可以更充實社會的優性的程度。設若一個人在學校中未能完成其性格上的優性的薰陶，公共生活中的傳統也能給以有益並有希望的彌補。這種公共生活中的傳統乃是多年多人所共同締造成功的，它成爲了一般人生活行爲的標準。在英國，王室固有王室的成訓，貴族家庭也有貴族家庭的成訓，但他們的特殊的成訓較之一般社會的成訓祇有更高更嚴格而不會不及。英人之甘心於保持貴族制度，崇拜貴族至少有一半的原因，亦因爲英國的貴族確能保有一種高尙的心靈和高尙的人品，他們的言行舉止確能爲庶民的表率。貴族、宗教、輿論、傳統、都是社會生活中指導一般人民的性格行爲的有力的南針。英人經過家庭、學校、社會三重不忽視性格的重要的生活，遂使英人永遠保有種種傳統的優性的性格。這些性格的內容即爲生活嚴肅，工作認眞，務實重行，而不尙空談，誠實可靠，勇敢、自持、堅毅，能嚴守本份，自我約束，習於自省，長於合作，不趨極端，不感情用事，能遵守法律，判別是非，崇揚公道，容忍異己，有尊重他人的習慣，能重視公共的利益……這些基本的品格，在各階層各學業各方面異途發揮，而同歸於人人有自尊心，社會有公道，政治清明，國家安定而繁榮，而終成爲今日之英國及今日之英國社會。

今日中國的情形正和英國相反：在思想上傾向管制，在性格上容忍放任。政府、社會、人民三者不僅容忍性格的放縱，且根本忽視性格的重要。羅素所發大多數父母均無資格教養其子女之論，對於中國實不失爲最合適並最眞實的批評。絕大多數的中國父母，未受教育，缺乏常識，他們雖有能力給他們子女以適當的教養；大多數中國父母

對於他們子女的教育，連健康教育都談不上，更遑論品格教育！他們雖愛其子女而不知如何愛，他們祇知投孩子之所好，給他各種不衞生的、不清潔的、不適宜不合時的小吃，滿足他不合理的感情，養成他種種放縱而不知檢點的性格，而不知對孩子給以正當而適度的管教皆開導。絕大多數的中國父母實不知品性爲何物，他們所帶領出來的孩子，大都缺乏正常的品性，良好的習慣，文雅的禮貌，公正的觀念，以及自治自省的能力。

然而今日中國的學校教育又還無餘力足以補救這種家庭教育的缺陷，因爲今日中國的學校教育，自身正陷入於病態及不健全之中。多年以來，新教育的目的在中國爲德智體三育的平均發展，但考之事實，今日中國的學校教育大都僅偏重知識一項。就大多數情形言之，最近數十年來的新教育，各級學校每週固都有體操課，都有或大或小的操場，每年並舉行運動會，然如此卽算提倡體育，固大足笑話。今日國人固大都不明生理原理，缺乏衞生常識，沒有良好的生活習慣，不知空氣與日光的價値，忽略營養的重要，缺乏衞生及保健的觀念，對於遺傳及優生毫無所知……凡此種種，才是體育中眞正主要的內容，而這正是提倡了數十年體育而猶未能認眞觸及的問題；這些問題學校亦很少能切實地給靑年正當並豐富的指導。至於品格，就表面言之，從前中小學都有修身，現在則有公民，中學大學並都設有訓練部門，紀念週上講的也無非是修身勵志之言，但一究其實，這種教條式的訓練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實際的效果，甚屬疑問。中國學校裏的訓育大都是消極的，形式的，表面的；訓育在中國幾乎也成爲了知識的一部分，而非道德的一部分。中國的訓育，祇訓而不育，訓育與實生活完全脫節，不能使他們在實際生活中自發地培養出一種優良的品格和風度。（有許多人認爲在中國的一些教會學校，單論品格的培養，較之普通國人辦的學校爲有成就。教會學校的學生比較普通學校的學生生活有規律，講話有禮貌，做事有效率，富於自治能力，能遵守公共秩序；教會學校能在實際生活中訓練學生的行爲，他們能造成一種空氣或一種環境，使學生生活在這種空氣環境裏，自然而然地感受薰陶，養成習慣，造成一種定型的性格。）在中國絕大多數學校的絕大精力，都花費在知識的傳授上。今日中國的學校教育完全偏重在知識一面，從小學到大學，入學考試都是以筆試（知識）爲主，口試雖不能判別一個人的品性，但口試的原意多多少少是在藉此審查投考人的談吐，儀理，及氣息，然而在入學考試中，因口試而落第者，百不得一二。師資的選任亦悉以資格爲主（資格是知識的形式），而與人品無關，卽使聲名狼藉的人也一樣能爲人師；此與英國中小學延聘教員之以人的品格較之教書的能力尤爲重要者，情形迥異。知識本不一定在書本裏，也不完全在書本裏，然而今日中國學校中的知識傳授又通都成爲了過份的書本主義。學校純粹根據分數來判別一個學生的造就，同時又根據此種以分數爲基礎的學分與年限來決定一個學生的升級或畢業。這種形式下的知識傳授，使所傳授的知識有時祇是些知識的渣滓。抑有進者，中國人的傳授知識完全側重於抽象的理論及不切實用的文字，前文所言今日中國士大夫階級的那種好虛文而不務實重行，我們不能不說這種缺點實由於多年的科舉制度而來。科舉制度今雖廢除而代以學校教育，但今日的學校教育與舊時的科舉制度，形式雖變，而本質仍一：仍是用考試作文的方法以定人才的取捨。這種側重於抽象的理論及浮華的文字的教育，使教育出來的人民好高而不務實。同時這種祇知知識傳授而忽略品格陶冶的教育，使所傳授的知識都失去了結實而健全的基礎。就學問與品格言，品格爲土地，而學問爲建築；沒有品格的人去從政，他必違法亂法；沒有品格的人去從軍，他必強橫霸道；給沒有品格的人以知識，等於給蛇狠以牙爪。然而在今日的中國教育中，固極少人注意品格的重要。在中國學校裏，一個最無抱負、最無才幹、最無個性、從各方面看都是最平庸的人，常常被學校當局認爲是最優秀最標準的學生，因爲這種學生大都按時上課，預備考試，循軌道矩，甚少過失。我們若出以公允，這種學生當然是良好的學生，但不是優秀的學生，考之過去，凡是學校中被許爲模範的學生，一入

社會，常常反都沒沒無聞，無甚造就。這個原因很簡單，卽學校以分數的多寡定學生的學業的造詣，以犯規的有無定學生的品性成績，而對於學生的有否創造能力、分析頭腦、調度才具、現代觀念、以及是否說話有信義，做事有效率，爲人有風度等等，不聞不問，在目前中國的教育制度及教育傳統中，著者疑惑：一個青年從小學到大學，他將從什麼地方得到各種合乎現代標準的爲人做事的基本觀念，並養成這種習慣？他將如何養成一種定型的觀念：組織較散漫爲優，正確較含糊爲優，條理較紊亂爲優，迅速較濡鈍爲優，以人爲主不及以法爲主，做事應力求合乎經濟及效率 (economy and efficiency) 的原則，以及卽使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生活觀念如適當的營養爲一種必要而非爲奢侈，休息爲一種預防而非治療……等？觀念決定一個人的道德標準（卽好或不好的標準），道德標準支配着一個人的行爲，而行爲則爲一種性格的表現。要使一個人有正常的現代的性格，須使他先有一個正常的現代的頭腦（觀念），而觀念則完全得之於後天的教育而非先天的遺傳。然而在今日中國的學校教育中，有多少人在注意這個問題？能有多少人明白給學生以各種關於做人態度做事方法以及生活習慣等等科學的訓練，較之做一百篇作文其價值高出萬倍？舉例言之，有一個英國教授曾在北京大學講中英教育觀，曾舉網球爲例；說在英國，學生打網球，練習了幾分鐘後，卽開始打 game，因爲他們覺得那種有規律有組織有目標的遊戲較之散漫而無紀律並無目的的遊戲爲愉快而有意義。在中國，大多數學生打網球，不論是單人或雙人，永遠是練習（卽不規則的隨便打）而不打 game，他說這充分表現中國人缺乏一種在有組織裏生活的習慣，並不習慣在一種行爲中追求它應有的合理的結果(result)。（在中國，有許多人認爲遊戲祇是遊戲，何必認眞！）但是據我們的經驗，有多少學校裏的體育的或非體育的教員，能注意這種情形，能在這種實際的生活中給予青年一種正常的爲人的訓練？再舉一例：在著者去年夏秋兩季幾個月的逃難生活中，與他隔鄰而住者，有大學教授及其孩子、大學生、中學畢業程度的機關職員、中學生、小學生、那位帶着孩子的教授及其受過高等教育的夫人，從不想到隔鄰的人需要睡眠或工作而聽任其孩子無分日夜放肆他的感情大哭大叫；那個大學生則因於酷熱不能成眠，天色黎明，卽在床上大誦唐詩，那時他同室中人大都未醒；那個機關職員每晨一醒，必高聲唱歌，直唱到洗好臉、盥好口、披好衣服出外他去，無一日不是如此；有一次有四五個中學生，又有一次有三個小學生，他們都從遠處旅行來城，寄住著者隣室，無不鬧到午夜以後，天色甫明，又大唱大笑。這幾種人在所受的教育程度上容有很大的距離，但他們之祇顧自己從不顧到他人，則無二致。然而我們不妨自問：在我們所熟識的家庭及所知道的學校中，曾看見有多少爲父母的及爲教師的，在孩子及學生的生活中，能處處對他學學以不妨害他人爲戒？誥戒他須處處注意尊重他人，不應妨害他人的權利及自由？（所以大多數的中國人從小時候起，卽已養成了一種任性恣意而以自我爲中心的性格。）著者引述這些例子，其意蓋欲說明，今日中國的教育完全忽略了爲教育事業中最最主要的一種責任——發展青年的道德的責任，陶冶青年的品格的責任 。著者自己在一個造就師資的學校裏就了五年，對於這種教育上的缺點，特別感覺敏銳。然而就是這種舊式的過時的教育，在中國仍舊年復一年地維持着。這種舊式的教育完全形式化，機械化，書本化，這種教育製造出來的人，正如一架舊式的機器生產出來的貨物一樣，完全不合時代的需要。這種一切過了時的貨物對於國家顯然不能成爲一種財富。這種不加改革的教育，可說完全是一種浪費。我們爲了國家的未來的自由、幸福、和榮譽，對於這種浪費的教育不得不出以呼籲和抗議。

前言英國除了家庭及學校都注意品格的培養外，還有一種公共的傳統，也有極大的力量影響一個人的性格的定型。這種條件在中國是完全缺乏的。而且相反，英國社會上的公共傳統對於人民品格的影響是優性的，中國一般社會風氣對於人民品性則發生一種反優性的作用。中國的社會正像一股濁流，一個青年從學校跨入社會，幾乎很少

能夠抗拒那股遍地泛濫的濁水。有許多青年在未入社會前，大都志行純潔，並有高大的抱負，但一入社會，性格與志趣均起變化。這種變化的時間的緩和程度的深淺，自須視這個人原來的教育根基及所處的社會環境而定，但無論如何，社會在無形中總多少在改變他，腐化他，侵蝕他原有的品德，使他在多年多種現實的刺戟及打擊下，產生一種新的適應這種黑暗社會的自然的生存能力。在最壞的情形之下，那些教育未能受好的人，一入社會，竟立刻同流合污，變本加厲。中國這種可怕的社會風氣，同時威脅着優良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當一個父母自身的道德水準下降時，他給子女的教育自然也隨着下降。學校的團體力量雖較家庭為大，但若認為師道可以決定學風，則不免成為太理想的看法。學校並非離社會而孤立者，學校亦不能離社會而孤立，學生無論在身心那一方面，並不能完全被包圍在學校的範圍之內，教員對於學生的教誨，其力量實不敵一般社會所給予學生的影響。而且就教員本身論，教員的言行舉止，有時亦常受政治上一般作風的影響。然而我們在此正可回返本題，正因中國社會充滿許多罪惡的勢力，故在家庭及學校的兩個階段中，對於青年的健全的優良的性格的培養，越見重要，因為唯有有了成熟了的優良的品格，當他跨入社會後，始能抗拒社會種種齷齪的狂瀾，始能在求適應中始終堅持內心的方正。一個社會的進步須歷時甚久而進行迂緩，我們依賴這種量小而質強的優性性格，在緩慢的時間中，或能漸漸地改變我們社會上各種公共生活中的缺點和風氣。

著者對於教育問題素乏討論的興趣，然而我們既在討論國家的前途，我們自不得不縱論到為國家生活中最基本的這一個建人的部分。著者既認為今日一般中國人性格上的弱點大都應歸因於他們所受的教育，故他相信經過了合理的改革的教育，仍有希望改造中國人民的性格，而使之合乎一個新的現代國家的需要。我們誠以今日中國社會上令人鼓舞欣慰之事常少於令人悲憤失望之事為憾，但我們既為中國之臣民，單單失望悲憤，固無補於實益。這種性格上的改造或須超過半個世紀以上，始能漸見成效，但祇要確在進步，亦即不能嫌怨其迂緩。我們固希望有一個富強繁榮康樂的中國，但一個富強繁榮康樂的中國固不能得之於幻想，而須出之於中國人民的實事求是的努力。惟有一個務實重行、能辨別是非、主張公道、急公忘私的人民才能造成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亦才配有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祇空談而不行，任何事業都不會建樹起來的；祇知一己而不知合作，公共生活是不會持久的；祇祈諸感情而不祈諸理性，社會是不會合理的；祇知「政治」而不知其他，社會是不會平均發展的；祇知擴張一人、一派、一黨的勢力，而不知普遍地改進人民的生活的、知識的、道德的水準，國家社會是不會進步繁榮，生氣勃勃的。一個進步的現代的中國固常為著者所追求者，而他之所以於敘述他所知之英國以後，復寫此文一述他心中的感觸者，蓋他實亦希望他的感觸能夠引起讀者的共思，因而或能慨然興起稍挽我們目前的頹風於萬一。

訴訟程序之簡化

——司法問題之三——

桂裕

現行訴訟程序之過於複雜繁重，無論法律界或非法律界人士均知之而詬病之。此種指摘具有相當之真實性，否則司法行政部亦不設置兩所「實驗」法院，以為若干簡化的程序規則之實驗矣。但細察此項規則仍覺與理想之標準相差頗遠，願在另一方面言，於不搖動法律基

礎之範圍內，已屬簡至無可再簡。須知中國法律係仿歐洲大陸法律而訂定。大陸制本質如是，祇可遷就之。如簡化至此而仍有所抨擊者，其咎在大陸制而不在中國法矣。

他姑不論，茲以訴訟進行之紓緩一事以證之。就一般情形而言，案件由第一審法院審判，所需時間必不短於三個月。第二審至少亦需時三月。如上訴至最高法院，則更須另加一年。此種計算方法絕未誇張，抑須進行順利，方克臻此。但若由老練之律師經辦，可將一案拖延至三年五年或更長之時間。此誠爲令人遺憾之事實，非過甚其詞。處此世界，事事務求經濟，而在訴訟方面時間之浪費若是，縱然最後獲得程序上絕無瑕疵之判決，亦復不能補償所失。

司法機構果有何障礙在乎？此問題係多方面的，故解答亦不能限一方面；惟扼要言之，有兩事可提出討論：(一)司法官職權上所加之限制過多，同時，訴訟當事人尋求程序上補救方法之尺度太寬。(二)無關實際而僅於理論上有其存在之方式及手續過於注重。

第一點之原因在對司法官傳統上的不信任。司法官有廣泛的判斷權，深恐其趨向腐化，故於其權力上加以若干限制，以期平衡得中。例如，任何裁判均須出以書面(間或有以言詞爲之者，但事例極少)，直與卷宗脫離關係，而形成單行之文件，無論事件如何微小，或有無爭議，莫不如此。若是，裁判是否適當，有無弊病，可一目了然，易於審察。但此種防範方法是否有效，不無疑問。爲防盜計，築圍牆而扃門戶，力求週密，但屋內如有可竊之物，而屋外確有賊人在者，仍能濟其技巧，越牆破戶而入內。今於司法官一面授以廣泛之判斷權，一面以懷疑之目光監視之，洵非計之得者。曷不另取較爲積極之辦法乎？若於司法官之良知良能加以薰陶，使之深切明瞭責任之所在，寧不更佳。試遴選第一等人物充任司法官，崇其地位，信之無疑，效果必更爲圓滿，蓋可斷言。如此則貪污絕跡，毋庸爲之防範矣。故簡化訴訟程序之先決問題爲改變對司法官之態度。顧須申明者，如非其素質已予提高而臻優良，不克致此。簡化訴訟須以此爲條件。不然，一切企圖不特徒然，抑且有害。

第二，現行制度過於機械化。吾人往往以機器比喻法律，而司法人員則爲機器之一部份，如一齒輪然。實施工作者爲機器而非爲人。換言之，司法官降爲法律之奴役，地位低落，有自尊心者不免覺得難堪。第一等人不願加入司法界者，其故在此。尤不幸者，現行制度亦不需要第一等人服務。蓋辦事程序已經詳細規定，卽中資之人亦能勝任也。在眼光淺短者視之，或以是爲經濟，以資格較好之人，其俸給亦必較高。然員額增多，公家負擔加重，實際上並不經濟。按諸英美制度，司法官不但執掌司法，抑亦創造法律；地位崇高，必第一流人物始得充任。人民信之重之，故能放手做事而收宏效，毋須有繁複之規則以束縛之。實際上，司法官與法律合爲一體，法律充溢人的精神，故活躍而有聲色。英美人之視司法官非如機器工人然，而爲一藝術家——美術品之創造者。中國反是。所求者祇欲使機器行動，人隨之工作而已。試舉一例：民事債務事件，債務人已承認債務，而法院本其承認爲判決後，其事尚不能視爲終結。如債務人欲上訴，仍得藉口任何理由而提起之，而上訴法院亦必須受理，因依法律所定之原則，凡案件均得受三級三審之利益，雖無實益，然原則如是，不能不守。吾人明知其爲浪費，亦復無可如何。機器如何行動，工人卽如何工作。我國之制度如是，法律亦如是。困難之點在此，解決之途亦在此

(另有『簡化訴訟程序之管見』一文見東方雜誌第四十一卷第二號)。

認定上述兩點，方可在實質上着手簡化訴訟程序之工作。局部之更張尙非解決之良法。現行法制已有約三十年之『實驗』，結果未愜人意。當此簡化訴訟程序之說甚囂塵上之際，敢爲建議，宜由政府派遣若干具有實際司法經驗之法學者往國外考察法制，研究有無可供我們採取之優點，藉以改善本國法律，增進司法效率。

從生命本質的直觀中談戰後社會改造

程懋珪

戰後社會之需要改造，應無異議，所須討論的，只是如何改造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站在政治的立場上講話，也可以採取經濟的或教育的觀點，更可以運用社會學的看法；不過若追求到這個問題的中心，探究一個基本的指導原理，似乎要從生命本質的直觀中發言。因爲社會是生命的人之社會，同時社會本身也未嘗不可視爲生命的。然而生命是甚麼呢？

斯賓塞 (H. Spencer) 說：「生命者，卽不絕地適應內的關係與外的關係也。」柏格森 (H. Bergson) 則認定「生命是一個流，是一個眞實之變成，是一個成爲繼續且不可劃分的運動之變化。一個生活的東西就是一個綿延的東西，但所謂綿延不是保持原態而綿延，乃是變化不息而綿延」(Cf. H. Wildon Carr's Herri Bergson: The Philosophy of Change)。這二說都有所發，不過前者把生命看成完全被動的東西，而後者又嫌玄奧。竊意仍以我國學者傳統先的綜合的看法比較平實，他以爲「生命是一種永恆完整體之表示。此完整之生命，不但內部機能的和合，而且與外在環境是互相和諧配合的。遺傳與環境僅此唯一完整體之兩部分。是以無論生命之維持與綿延，無論生命之長成與發展，無不以達到生命之完整爲條件，亦無不共同和合相互聯繫以求完整生命之表現 。是以生命之價値卽求生命之完整」(見所著「現代哲學之科學基礎」頁一一九)。至此，不如我們簡單地說：生命是動的(active)和諧之表現。因爲在這句話裏面，不僅可以概括生命的一切現象，而且指出了生命是不斷的自動的生長之活潑的歷程。要確立此說，我們須將生命學說上的兩大思潮略加評論：這就是機械論(mechanism)與生力論(vitalism)。

早在紀元前第五世紀的魯西柏斯 (Leucippus) 和德穆克利特斯 (Democritus)，就把有機體視爲無數物質原子之組合物；以爲靈魂也不過是較爲精密圓活的原子而已。然而當時只是一種臆說，一直到現代科學勃興，機械論纔奠定其科學的基礎。自哥白尼，加利略及牛頓以來，把物理化學的概念應用於有機體，似乎無不得心應手。十六世紀解剖學興起，十七世紀笛卡兒又建立完全的機械論，生物學竟成物理化學的支流。英有哈特烈 (David Hartley) 與普利斯特勒 (Joeph Priestley) 繼起，法有拉梅特利 (Teliende La Mettrie) 狄德羅 (D. Diderot) 荷爾巴哈 (Paul d'Holbach) 等接踵而至。近時達爾文（物種由來）海克爾 (E. Hackel 宇宙之謎）及赫胥黎 (Huxley 生命之物質基礎) 等又都竭力爲機械論辯護，而以現代德國生物學羅厄布 (Jacques Loeb 1859–1924) 達於機械論的高潮。羅氏根據實驗生物學主張生物爲物理化學的產物，生命除物理化學的機械觀以外，便沒有事實足以說明它了 (Cf. J. Loeb: Forced Movements, Tropisms and Animal Conduct 1918)。

反之，生力論以爲生命之活動，是一種不能爲物理化學所能解釋的「生命力」(élan vital 或稱極索 Entelechies) 所推進的。此說自亞里士多德以來 ，直影響到近代 。像胡爾佛 (Wolff) 布倫門巴哈 (Blumenbach 1752–1840) 等都是生力論的代表。十九世紀後大生物學家孟戈茂尼 (E. Mongomery) 爲生力論辯護尤力。至現代與機械論健將羅厄布對鋒的便是杜里舒 (H. Driesch 1867)。這兩大派各執一端，多少時日爭辯得臉紅耳赤，總不罷休！其實兩方面都有困難：

(一)機械的概念，不夠解釋生命之特性，而我們也沒有理由必以這些

概念為解釋；同時生命的比非生命的，如說只是組織的更加複雜，但孰組織之？孰使之複雜？似乎有假定一個組織力（organizing force）的必要。（二）生力是甚麼？神秘的名詞並不能說明什麼。同時依能力不滅律（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一個系統內的能之量是不變的：如物質會改變心力，則物質的能消失了，如心力能改變物質，則物質的能增加了。物理世界是一個自足的系統，能有形式的轉變（如熱、光、電），而無量的增損。生力論於此困難，至今無法克服。

進一步說，這兩方面還陷入了一種同樣的大錯誤。這個錯誤就是把生命觀為可分析的，都沒有認識生命並非單個物的總和，而是一個綜合的不可分析的完整體；不是那樣機械的，也不是神秘的不可知的，只是動的和諧之表現。不過這兩者鑄成這種錯誤的出發點，則各不相同。機械論以為生命可分析為若干物理化學的單個成分，並且視生命完全受自然力所支配。但未看清：生命是綜合的完整體，以及在生命中各部的機能，結構和種種活動所共同和諧而形成一共同整體的關係（其實機械論者也有看到生命之調和的，譬如日本生物學家永井潛論生命之和諧作用，恰如「弧燈調節器」，並以生物保此和諧的必要條件為神經系及興奮系 hormon 二者。不過他和羅厄布的精神一致，昧於生生之道，不瞭生命是自動的和諧之表現，更不知這種和諧的生長性及不可分性）。生力論這一方面雖然認識了生命的這種關係（即了解生命內在的共同維持和諧的關係，如杜里舒所謂平等可能生系 equipotential antogenetic system 便可證明。此外，他還提出所謂因果和諧 harmony of causality、組織和諧 harmonly of composition 和功能和諧 harmony of function 等。詳見講學社編杜里舒講演錄第一、三期生機體之哲學），卻以為這種關係是一種生力支配或反應與其分隔的物理環境所發生的結果。因此，它又不明白生命還有一種與內在所不能分割的外在的共同和諧之關係。換言之，它把有機體與環境分割了。所以，機械論以生命內部是可以分析的；生力論則以生命外部是可以分析的，這兩者根本上有同樣的缺點。

在我們看來，生命非但內部是綜合的和諧，而且它與外部環境也是綜合的和諧，都不能機械地分割：因為它是一個生長的完整體，是動的和諧之表現。就是外部環境也當以生物學的觀點去解釋（biologically interpreted），纔足以說明真正的生命。這可以借用英大生物學家漢爾唐（J. S. Halane 1860—）的理論以為我們的證據（Cf. Haldane: The Philosophy of A Biologist 1935, Oxford）。漢氏的基本主張約為三點：（甲）凡一切生命活動都是互相和諧合作的，動其一必影響及全體；（乙）生機體與環境是合而為一的，兩者分裂便都失了意義；（丙）經驗是整個的，而最後的實體是精神的（有人誤認他是一位生力論者，因為他不能接受幾十年前傳統的機械生物論，但他自己否認為生力論者，而且永遠也不會是的。詳見所著「生物學之哲學基礎」頁三一）。這種理論可以彌補機械論與生力論雙方的缺陷，而獨給生命之性質問題以融貫的中正的說明。

事實上有機體的構造是維持機能的表現，機能又是維持構造的表現。機能和構造是生命整體之不可分割的顯示；生命之一切活動是互相配合的動的和諧歷程。舉粗淺的例子說，譬如呼吸，不僅其本身是一種調和的節奏，而其他機能構造的各部之所以保持常態均衡，都有賴於它。反之，它之所以能保持常態均衡，又必賴其他一切身心活動之有常態均衡的保持。整個生命是有機的完整，是動的和諧。再就生命的內外關係說，呼吸不僅為內部的和諧之表示，而且尤為生命與環境合一的表示。因為在肺部裏的炭酸氣的平均壓力，總是均衡調和的，不論呼出了或吸進了多少炭酸氣，而肺部的炭酸壓力仍然調和。呼吸始終是調和內部與環境，使這種炭酸壓力的調和即在保持動脈管血液活動之均衡。更進一層看，炭酸調和的重要性，尚不僅在動脈管血液中，而且在週身的組織纖維中。因為在各纖維或各器官中的炭酸產生率是均衡調和的，則週身血液循環的效率也是均衡調和的。另一方面，氧氣與炭酸在呼吸作用有同樣的重要。假如在所吸收的空氣

中，氧氣壓力銳減，那末呼吸次數便立刻加多。這因為血液中氧氣壓力銳減，經過神經系上的影響而激動呼吸作用，必使呼吸次數增加；又因呼吸次數增加，使肺部的空氣中減低了炭酸壓力，於是影響神經系使呼吸又慢慢減少。結果是兩相調和。由此可見生命之所以表現，除賴身體機能構造一切活動的調和外，更賴其與環境的諧合。所以我們說：生命實言之無物，只是動的和諧之表現，亦即為多樣統一的歷程而已。這事，我們還可指明，在生命發展的歷程中，自有程度不同的心之活動，而生命所趨的方向，便是心之完整和諧（參閱東方雜誌四十一卷十九號拙著戰後心理建設與德育改造之基本原理）。哲學上原在表現愛智者不斷的窮究，這裏亦容有餘地（可另文討論）；不過避免了機械論的困難與生力論的神祕，這裏是可以聲明的。

社會是生命的人之社會，所以亦有容受生命本質的理由。社會學家柯萊(C. H. Cooley)說得好：「個人與社會為一體的兩面。我們了解個人，即了解社會；了解社會，即了解個人。個人與社會為雙生的(twinborn)，是同時並存，不可分離的」。所以「個人與社會成一個有機的關係，恰和樂隊所表演的音樂，是由各種不同而相關的樂音配合而成。各種樂音的勻稱合作，始成為一種音樂的和諧」(Cf. Cooley;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1902; Social Organization 1909; Social Process 1918)。和柯萊同生又同死的霍伯號斯 (L. T. Hobhouse) 著社會公道的原則 (the Elements of Social Justice 1922)，也說明了社會本質的和諧。他以為「和諧是一個柔和的原則，能夠改造而不能毀滅。」他還指出：「如果人類以為全部是能達到和諧的，那末將來人類生活究竟怎樣，我們難以預料。在歷史上有許多好人要想達到許多目的，而這些目的大部分是有益的。但是歷史是充滿着這些目的之爭鬪的。假定每個目的之善良部分，能夠了解自己的意義，那末這些爭鬪自然消滅而發生穩固的合作以代之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世界，或者和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大不相同，這是有理由而可以肯定地說的。社會哲學的工作就是闡明這個見解。我們抱一種觀念，就是愉快生活的要素，在乎人類能力的和諧實現，那末我們不得不去求得怎樣達到這個觀念的條件。關於法律，風俗和制度，我們應該就牠們：(一)維持不論何種社會生活，(二)維持或者提倡和諧的生活兩件事之功用，去研究牠們」。

於是，中國社會之病徵，便瞭如指掌了。過去我國社會之所以衰落，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所以無辦法，主要的原因不出於整個文化的失調或違和。我國社會的毛病是散漫，需要的是團結組織，然而自外輸入的恰巧同所需要的相矛盾——根據個人主義而來的自由分離的風氣固不論；即後來一知半解的黨派門徒，也專門講鬪爭，分離，適與要求的團結，和諧合作，相背而馳。大家都明白，西洋近代個人主義抬頭，自由主義盛行。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為西洋人始終過着集團生活，不過從前的集團是宗教教會，後來的集團是民族國家。在從前每一個人都是某一教會裏的一個人。如同現在都是屬某一國的一個人一樣。所謂個人實從團體反映而見的；現代因個人分量過高，妨礙社會，又翻轉身來講團體。個人主義與集團主義相互輾轉，無非是求取合理的和諧。一般國人不會了解這點，更因為根本缺乏集團生活，無從映出個人問題，而只滯留於一種倫理關係——始於家庭。家庭當然不是中國人所獨有的，而因為缺乏集團生活，團體與個人的關係便經驗如無物，所以家庭關係維特別顯露出來。一切的活動都以家庭為中心，於是國家社會的利害都不去理會。俗語說得好：「各人自掃門前雪」，由此士豪劣紳乘機活動，貪官污吏魚肉人民，國家社會自然弄成一團糟的樣子。試看，多少的丈夫只能在他們妻子面前說風涼話，在兒女面前擺威勢，素來就「不敢」，因此也「不能」出門做社會的國家的「公民」。當然，人與人之間都劃了鴻溝，沒有共同興趣，更沒有公共目的之形成；雖然到了二十世紀，還是固守着各自割據的社會情況，封建的田園！這是整個文化失調的主因，所以「國族不團」了！

國父曾有見於此。當他說到社會建設，便體認着社會與個人的相

互依倚的和諧作用，而極力主張「服務道德」，更重「群力」（見民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對各黨員演詞「國民黨員以後要注重宣傳的奮鬪不要注重兵力的奮鬪」）。所以他說「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坦實言之，國父整個思想，莫非在「相匡相助」的調和一切文化，使人人相互助長的發展，而繫成整全的和諧的大同。這也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之本意。關於這一層，非僅我先哲的理想，實應爲全人類最崇高的，也是最優美的要求。

然而這不能定出一個「本位」（社會本位或個人本位），而是社會透出個人而成立及個人滲過社會而表現的和諧發展。從個人說應尊重社會，從社會說應回頭來尊重個人，如此恰調和了狹隘的集團主義與散漫的個人主義。這種看法，並沒有什麼奧妙，只是根據中國倫理思想而來的，彷彿是在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這五倫之卜，又添了團體對個人，個人對團體的一倫（參閱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頁一七二至一七五）。中國社會本是倫理的家庭的，所以比國君爲大宗子，稱地方官爲父母；而且偏重禮俗，是從父義當慈，子義當孝的倫理關係出發。於是尊重對方，而人人向裏用力。一個人要向上發展，便是自立志，自努力，失敗了便自責怨，自悲嘆；正如不得於父母，須轉眼自顧由何失愛，反省自責，全在自己身上用力盡心。所以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可惜並沒有好好做到，做起來也只限於五倫，而不了解社會國家的整個關係；同時反陷溺在「人」心用力，而忘了對自然去探究，所以社會國家一團糟，整個文化也固守在「非科學」的境界。

關於人與自然的關係，應另文討論。這裏要急於提出「交通」(communication)的原則，以爲上述六倫的基礎，而打破人與人的隔膜，求取共同興趣之了解和共同目的之體認。我們借杜威的話說：「人類不因爲生活在一起，得形體的接近，便能成爲社會。一個人也不因爲與別人離開很遠，便彼此停止社會性的影響。一本書或一封信，可以使得相距數千里的人，比住在同一屋裏的人還要親密些。即爲着一個公共目的工作的人，也未必就能組織成社會的團體。譬如個機器的各部分，爲着一個公共的結果，在那兒幹絕大的協作；但是它們並不是因此就能組成社會。這是因爲它們都不認識這個公共的目的。假使它們都能認識這個公共目的，對於這個目的都有興趣，因此各人都按着目的而調整他們的特別活動。這樣一來，便成爲社會了，但這便含蓄交通作用在內。各人必須要知道別人在幹甚麼，並且必須有某種方法以看別人對於自己的目的與進程之提示」。「這樣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就是最有社會性的團體裏面，還有許多關係仍然缺乏社會的精神。無論在任何社會裏面，仍有許多人的關係好像機器一樣，彼此沒有充分的交通作用。許多人彼此利用，只顧到自己所要得的結果；至於被利用的人之感情與理智的傾向怎樣，心裏情願與否，都一概置之不顧。這種利用，不過表現物質的優越，或地位、技巧、及操縱機械或經濟工具的優越罷了。假使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僱主與傭人的關係，治人者與治於人者的關係，仍然還在這個地步，無論他們各個的活動怎樣接近，總不能組成眞正的社會團體。各方面命令之授受，雖然變更動作與結果；但單靠這種辦法，決不能影響於目的之了解，與興趣之交通。所以不僅社會之繼續存在有賴於交通，而且更可以說，眞正的社會，實存在於交通作用之中」。(Cf. J.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Chap. 1, pp. 5-6)。柯萊在人性與社會秩序一書中，也以「交通」爲基本概念，認定它是人類關係藉以存在和發展的要素 (Cf. Cooley: Human Nature and Social Order p. 61)。實際上各別的人所以能分享社會的經驗和發生共同的興趣目的，確端賴於「交通」。由「交通」的發展，使多態滲過統一而表現，統一透貫多態而綿延。這就是社會與個人的相互調適與和諧之橋樑。這也就是改造戰後社會的根本大法。

不過「交通」僅是方法，戰後社會的改造，還須有理想的指導，也就是運用「交通」所要求的共同興趣與共同目的。這興趣、目的、理想自然也有其等級，而其最崇高的也是最優美的標準是甚麼？這

當然要回照着生命本質之顯現，而順揚其發展歷程之自然。於此，我們可以指出「和諧」一概念；不過運用社會學的看法說，是整個文化之「調適」(adjustment)；採取經濟的或教育的觀點說，是「平章百姓」或「黎民於變時雍」；若站在政治的立場上講，是「協和萬邦」以進「大同」（參閱東方雜誌四十卷十號戰後教育改造之基本原理及同刊同卷十一號戰後政治改造之基本原理）。而根本上着眼之點，也就只有一個，用柯萊的比譬說：「恰如樂隊所表演的音樂，是由各種不同而相關的樂音配合而成。各種樂音的勻稱合作，始成為一種音樂的和諧」（見前）。每個國家社會應是如此的，整個世界社會難道不應是如此的麼！

水與人類的健康

W. S. Mahlie 作
劉遐章 譯

有豐富清潔的水充人類的使用，在任何世紀，都甚重要。沒有適量的水給，人類的文明就無以長成，水對人類壽命雖然沒有直接影響，但是普通皆認為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假使我們來研究一下上古的文明，無論在巴比倫，古羅馬或迦太基的名城遺址裏，都可發現有良好發展的水給證據。

我們還可以回億到當以色列的子孫飄泊的時候所遇到的難關之一，就是缺水，於是摩西就把馬拉 (Marah) 地方的苦水變成甘水，（見舊約出埃及記十五章二十五節）。以後以利夏 (Elisha) 在耶利哥 (Jericho) 地方用食鹽來澄清飲水。在所羅門的名言裏有「喝你自己槽裏的水，吸你自己井裏的水」這句話，大概就是忠告人們不要飲性質不明的水。

古來城市裏的水給最著名的，也許要算是羅馬了。佛羅汀諾 (Frontinus)在他的「羅馬的水給」(Water Supply of Rome) 一書裏，描寫他在水給專員任內（公元九六年至九八年）的渠道 (aqueducts) 的情形。自公元前三一二年開始，賡續至公元二二六年間，羅馬建築了十九條渠道，共長三八一哩，普林尼 (Pliny) 在公元七十年說，羅馬由於天賜，全城有極好的水給。馬西亞渠道(Marcia Aqueduct)是世界上最清潔的。他並記載阿格利巴 (Agrippa) 在一年之內建築了七十處水池，一〇五處噴水泉，一三〇處貯水塘。

希臘與羅馬相繼崛起，文物燦然，人民得大量清潔的水充飲與沐浴，但後來文明趨於沒落，在中世紀時，疾病和邪教都很盛行。那時貽禍歐洲的瘟疫全是不清潔的水裏帶着有流行病菌。

什麼時候人們才知道水是有品質不同的，那是不易考證了，不過我們毫無疑義的相信初民總是喜歡清清寒冷的泉水，而不喜歡飲不清潔的泥水，久而久之，人們也就會知道某地的水是含有某種病菌的。

要想把良好的水與健康的影響關連得非常正確精密，雖然不是不可能，但是也相當困難，不過我們可以先指明飲水與病菌的關係，以及飲水經過清濾可使水內傳染病菌減少。以往許多流行的疫症，大都是由水所傳染，可是我們不能確定如此，因為從一八五〇年以後，細菌學才廣汎被人注意，同時流行疫症，也顯出明顯的徵候。

今天我們知道有三種重要的病症，大都是不潔淨的飲水裏傳染來的：就是霍亂、傷寒、副傷寒和桿菌性及阿米巴性赤痢。這些病症是由別的方面混入水中，而且並非同時成立的一種特殊有機體所釀成，水不過是把它們傳播於各地的媒介。所以一種水裏可能容着大量的這種有機體，只要水中所存此種有機體絕跡，飲後是不至生病的。

現在將幾種由水裏傳染來的特別顯著的病症簡要的列舉出來。一

八八七年，西西里島麥西納 (Messina) 地方霍亂猖獗，從九月十日到十月二十五日，患者五千八中死去二千二百人。政府衞生機關發覺這種病症是由水裏傳染來的，於是停止飲用當地的水。用槽船從大陸運來大量的飲水，結果，正如當地作者所謂，「霍亂之停止，有如魔術。」因之在這次大戰中美國的第十五師開入西西里時，他們是從非洲攜帶了備五天飲的十五萬五千加侖的水，使用每艘裝水一萬加侖的槽船 (Tankshf) 三艘，此外又有十二萬五千加侖是裝在二萬五千個五加侖裝的罐子裏，另用船運往。這僅是一個師用的水。

霍亂流行的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在德國漢堡。從一八九二年八月一八九三年三月，患者一萬七千人中死去八千六百零五人。當時全到城的人口僅有六十四萬人。他們是用易北河的水，並且沒有經過清濾。亞爾多納城(Altona)和漢堡比鄰，兩者的邊界差不多無法辨明，亞城的飲水也是取自同樣的河流，並且還在漢堡的下游，漢堡城的溝渠污物總是向亞城下流，但是亞城的飲水經過清濾，所以沒有霍亂。檢查時疫的柯希教授 (Protb. Koch) 說：「霍亂在漢堡盛行到亞爾多納城邊境。一條作爲兩城界線的街道，在街道一邊是霍亂盛行的漢堡，在另一邊就是不受霍亂侵襲的亞爾多納。」

水的傳染傷寒病菌比傳染霍亂菌還要常有。最驚人的要算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普里穆斯城 (Plymouth)。在一八八五年，全國人口八千人，患傷寒者一千一百零四人中死去一百十四人。時疫的流行完全由於水給，因爲水內含有患者排洩的污物。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Columbus)也因爲水的不潔而傷寒病盛行。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到一九〇四年三月患者一千六百四十六人中死去一百六十六人。哥倫布城的水給是來自一條低於溝道的河流裏，一家瘋癲病院的排洩物恰巧流入此河內，全城飲水又沒有經過清濾。那時傷寒死亡率每十萬人中有一百三十九人。一九四〇年中則變爲每十萬人中患傷寒的還不到一個人。

飲水傳染痢疾也是常見的，不過不像傷寒那樣厲害。美國全國共知的就是一九三三年支加哥盛行的痢疾。八百五十個患者中有五十二個人死去。市內水給的本身個很好，只是排洩物的鉛管發生了毛病。

這些由水傳染病菌的實例是許多例子中比較重大的，其他有許多例子雖然不甚重大，但其總數比以上所列舉的例子要大得多。很多死去的人，本來是可以飲用清濾過的水來防止病菌的。莎士比亞和泰勒 (Zachary Taylor) 是害傷寒病死去的，路易九世和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是害痢疾死去的，巴士特的得力助手杜易利爾 (Thueillier) 是患霍亂死去的。這樣一批天才還有其他的人由於水的不潔以致於死是多麼可惜！

飲水與病菌的關係既如上述，現在尙待指出的就是經過清濾的水可以減少死亡。茲先就清濾的水的歷史簡單的講一下。

現代清濾的水是開始在一八二九年，英工程師詹姆斯・辛博生 (James Simpson)的規劃是造一座沙床下，舖磚瓦，使水通過其間後和來自天然狀態的泉水相同，濾去一切的污物。因此他便在倫敦近郊契爾啓 (Chelsea) 地方築成一英畝大的濾池，清濾泰晤士河的泥水，結果極爲滿意。以後並發覺飲用此水之本區居民，都較其他各地居民爲健康。一八五五年國會通過議案決定全城居民的水給都要經過清濾。當時除掉知道濁水經過清濾可以澄清之外，並不明白知道清濾還有其他作用。一八七〇年以化學來分析經過清濾的水與未經過清濾的水，並沒有得到什麽結果，一八八五年以後細菌學昌明，乃發現清濾可以掃除細菌。

辛博生的濾池每天每英畝要濾三百萬加侖的水。水中天然膠質與淤泥使濾池上層形成有如蓆子的一層東西，可以清除細菌。這層蓆狀的東西愈濾愈厚，追厚到妨礙水過濾的時候，就需要將上層刮去一寸，再舖以新沙。但是這樣做法，既費人工，又不經濟，於是不久就改用機器代替洗刮換沙的工作。

一八九七年福勒(George W. Fuller)在路易斯維 (Louisville) 地方作一種新試驗，結果大改以前機械式的清濾方法。他發現濾池上層的蓆狀物可以用明礬迅速形成，那麼清濾工作的速率因之增加了五十

倍（每天每英畝濾池可以清濾一萬二千五百萬加侖的水）。同時不需要刮去上層的沙，可用下層的水反冲上來除去堆積的污物。此後不斷有新工具與新發現的利用，但過濾的基本手續仍然一樣。

一九〇三年喬治·約翰遜(George A. Johnson)以次氯酸鹽(Hypochlorite)通過支加哥的柏布里溪(Bubbly Creek)的污水中殺滅細菌。一九一三年以後漸漸改用液體或氣體的氯，而到今天，則廣汎地採用來殺菌。

過去三十年中，水的清濾工作，是在不斷改良中。水中過多的礦質可以使其軟化，水中的鐵和錳可以用特殊清濾法除去，並且可以用炭素，氯，與阿毋尼亞混合物除去水中的怪味與惡臭。此外還有各種方法和工具來清除水中的炭，硫，和氯的伊洪(ion)，所以現在的水可以抵得過，甚至超過商業上的蒸餾水。

在美國，傷寒病死亡率，大致可說是公用水給品質良否的最理想的標準。以前（一九〇七），喬治·柯柏(George Kober)博士於研究六十處的水給後，曾作成一篇「改良水給以保持生命健康」Conservation of Life and Health by Improved Water)。茲將其結果列表於下。其中數目字自係代表未經清濾的水。

每十萬人中傷寒病死亡率表

四個城市用大井水	一八·一
十八個城市用幽閉的水和保存的河水或泉水	一八·五
八個城市用小湖裏的水	一九·三
七個城市用大湖裏的水	三二·八
五個城市兼用地面與地下水	四五·七
十九個城市用污濁的河水	六一·一

一九一三年約翰遜（發明利用次氯酸鹽清濾飲水的人）提出在水給未經清濾的六年中，每十萬人中患傷寒死者八十人，經過清濾以後，每十萬人中患傷寒病死者降爲二十一人。以上數字係根據考檢九個城市得來。在今天，每十萬人中要有二十一人的傷寒病死亡率，還要被認爲是流行性病的比例哩，一九四〇年集合許多城市來研究，三千六百萬的人口中，每十萬人的傷寒病死亡率是〇·四八，較之在一九一〇年每十萬人是二〇·五，已進步很多。得克薩斯州的防得渥斯(Fort worth)地方，在一九一〇年，每十萬人是二七·八，到了一九四〇年，每十萬人是一·一。

有人認爲死亡率的減低並不完全歸功於飲水的清濾，因爲還有許多衞生上的改進以及傷寒病預防針的使用。但是衞生專家也承認傷寒病有百分之七十是從所飲的水裏傳染來的，百分之二十是從牛奶裏傳染來的，百分之十是由於媒介物。因此飲水的清濾，至少應有百分之七十的功效。

飲水清濾除掉減少傷寒病外，還有其他的好處。在一八九四年密爾斯(Mills)在馬薩諸塞州與萊恩克(Reincke)在德國所作之研究，均不期發覺飲水經過清濾後，死亡率便大爲降低，且並不以患傷寒病致死爲限。這就是所謂「密爾斯與萊恩克現象」(Mills-Reincke Phenomenon)。一九〇四年赫森(Hazen)對這個現象作種數量的說明，以後在公共衞生上稱爲「赫森定理」(Hazen's Theorem)。

因飲水經過清濾能使一個患傷寒病的免於死亡話，同時很可能使二三個患其他疾病的亦免於死亡。這是統計很明顯而合理的結論。

水與患他種疾病而致死亡的關係是不像與傷寒病那樣容易說明。但居民能自由並放胆使用良好的水給，則他們的健康便可改善，間接減低了死亡率，而且這一部份死亡率的降低，是因所患的疾病已經與水給品質，並無顯著關係了。

現在我們有了化學和細菌學的種種分析方法，含有危險性的水，已很容易辨認出來，所以在肇禍以前，就被停止或禁止使用了。

（註）本文原名Good Water and Human Longevity，載本年六月Scientific Monthly。

何謂生霸死霸

岑仲勉

六七年前，偶讀王國維氏生霸死霸考，頗信其四分一月說，大致不妄，但對「霸」字仍墨守故訓，殊爲可議。十餘年來，王說迭受攻擊，最近再檢讀一過，則覺其文尚有——不能作盡分時代的研究——之一缺點，周人之四分一月，始終認爲根本無誤，因將鄙見寫出。最末，更覺得趙曾儔、劉朝陽兩家之文，乃略易原稿，節採其說，參入討論。

原來一月四分之說，亦非剏自王氏。尙書古文疏證六上，「秦淵云，古文武成一月旁死霸、二月死霸、四月旁生霸等日，皆四分之一之歷，差至二三日，」閻若璩氏引此而未加辨正，當亦彼所贊同。王氏所論殆本此，（註一）而更詳稽古器，期從歷法證明，然其弊在急於求功；劉氏所駁，王國維據以推算之歷法，是否確是周初實用之歷法，所研究之古器，是否確屬厲、宣時代，（註二）正中其失，今不必再論。所須聲明者，此祇能推翻王氏之歷法證明（證例不可必信，同擧張苑峯君往年亦嘗言之），不能推翻周金之原有事實，因金文係初吉——旣生霸——旣望——旣死霸四種平列，明明擺在吾人眼前。

現在我國所能見千眞萬確的上古文字，就祇有卜辭及金銘，卜辭義簡短，可與古籍相比傳者少，周金（除可確認屬於商人者不滿十器外）多長篇文字，得與古籍相比較者數數見，故研究周金文字，大致比卜辭爲易。（註三）紀日方法又周金最常見之例子，且屬於較普遍的知識，若此類名詞，尙無法徹底解決，則上古文化之確切認識，更從何談起。

一　金文所見之材料

前文謂三氏不能作盡分時代的研究者，卽謂其不能將靑銅器中之紀日方法，與古籍中之紀日方法，畫分作兩起研究。由於近世靑銅器大量發見後，其給予吾人之眞確史料，往往與戰國時傳下會說多少有異，（註四）畫分研究，乃更屬必要。抑論者祇揭擧自己利用之資料，固爲便於行文，然苟能將其全盤列出，非特有助於研究，卽向來於金文、歷法未嘗問津者觀之，亦不難取得一概括的觀念。爰就所見，類列如次：

（甲）初吉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晉邦𥂴、陳逆簠、𨙸鐘、楚王領鐘、冬叔匜、姑馮句鑃、黃大子白克盤、余旻盤、丑尊、共九器。（異器同銘者不錄，下倣此。）

唯正月初吉丁亥。齊𡢃氏鐘、諸𣪕鐘、邾子𤔲師鐘、𪊨鐘、王孫遺諸鐘、沇兒鐘、楚王鐘、蔡大師鼎、王子吳鼎、陳侯鼎、曾壺、邾子妝簠、陳子匜、余冉鉦、曾子簠、陳侯簠、共十六器。

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盤。

唯王命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尊。

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師𢿱𣪘。

唯正初吉丁亥。其𢊁句鑃。

唯王月初吉日丁亥。伯戔盤（是否正月，未詳。）

唯一月初吉。叔皮父𣪘。

唯正月初吉庚申。黃韋俞父盤。

唯王正月初吉辰在乙亥。郙公𢽾鐘。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華鐘。

唯正月初吉辛亥。𨟭大史申鼎。

唯正月初吉癸巳。格伯𣪕。

唯正月初吉。鄀太宰簠、要君盂、湯叔尊、共三器。

唯正月初吉庚寅。宴𣪕。

唯正月初吉乙亥。君夫𣪕。

唯十又一年正月初吉乙亥。虢季氏子盤。

唯王正月初吉壬寅。㠱鬲。

唯正月初吉日己酉。宜桐盂。

唯王一(?)月初吉庚午。庚午盂。

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無㠱𣪕。

唯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鄦𣪕。

唯王正月初吉庚午。楚嬴匜。

正月初吉，日在庚。郘𪒠尹句鑃。

唯正月初吉元日□亥，郘王子旃鐘。(註五)

唯二月初吉丁亥，……唯王二祀，吳彝。

唯二月初吉丁卯。叉尊。

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鄀公𣪕。

唯三年二月初吉丁亥。師兌𣪕二。

唯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鬲攸比鼎。

唯三月初吉甲寅。大夫始鼎。

唯三月初吉甲戌。康鼎。

唯三月初吉乙卯，……唯王二祀。遲尊。

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師𩛥𣪕、師晨鼎、共二器。

唯王三月初吉癸卯。𢻱叔𣪕。

唯三月初吉庚午。何𣪕。

唯五年三月初吉庚寅。諫𣪕。

唯三月初吉。格伯𣪕。

唯四月初吉丁卯。友𣪕。

唯四月初吉。害𣪕、正考父鼎、共二器。

唯四月初吉丁亥。𢽾𣪕三。

唯四月初吉甲午，效卣、匡卣、共二器。

唯四月初吉丙寅。靜卣。

五月初吉甲申。衛彝。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𥿋鎛、仲偁句鼎、共二器。

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師兌𣪕。

唯五月初吉丁酉。鄭師𠫑父鬲。

唯五月初吉。免盉。

唯六月初吉丁亥。召仲考父壺。

六月初吉癸卯。辛史彝。

唯六月初吉，王在鄭，丁亥。免彝。

唯六月初吉王在㝠京，丁卯。靜𣪕。

唯六月初吉丁巳。大𣪕。

唯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望𣪕。

唯正八月初吉壬申。𡨦兒鼎。

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旂鼎。

唯六年八月初吉己巳。史伯碩父鼎。

唯鄧八月初吉。鄧伯氏鼎。

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班彝。

唯八月初吉庚申。戈叔朕鼎、楚子簠、共二器。

粤八月初吉庚寅。靜𣪕。

唯鄀八月初吉癸未。鄀公平侯盂。

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季𣪕。

唯八月初吉丙申。毛叟𣪕。

唯八月初吉庚午。𤔲𣪕、伯𡢁𨱆、共二器。

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克鐘。

唯正九月初吉丁亥。儔兒鐘。

唯九月初吉戊申。不𡢁毁。
唯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師𩛥毁。
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霥簠。
唯九月初吉戊辰。不𡢁鼎。
唯鄀九月初吉。屯大人毁。
唯九月初吉丁亥。陳公子子叔原父甗。
唯九月之初吉丁亥。𨙶太子鼎。
唯九月初吉庚寅。師𨘇鼎。
唯正九月□吉庚午。庚午□。
唯九月初吉庚午。賢兕觥。
唯十月初吉甲戌。㪤毁。
唯正十月初吉丁亥。子璋鐘。
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匊生壺。
唯十月初吉辛巳。𨹗毁。
唯十月初吉庚午。叔朕簠。
唯十又一月初□丁亥。丁亥旅鼎。
唯十又二月初吉壬午。𢐗鼎。
唯十又二月初吉丙午。師湯父鼎。
唯十又二月初吉辰在丁亥。善鼎。
唯十又二月初吉丁丑。同毁。
唯十又二月初吉。免毁。
唯十又二月初吉乙巳。叔上匜。
唯十又二月初吉丁卯。召卣。
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克盨。
□□□□□吉甲戌。吳生鐘。

以上初吉共一二．三例（註六）

（乙）既生霸

唯正月既生霸乙未。守宮尊。
唯正月既生霸丁酉。師遽尊。
正月既生霸辛丑。競卣。
唯二月既生霸。史𣪕彝。
唯王二月既眚霸辰在戊寅。豆閉毁。
唯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大毁。
唯三月𣪘生霸乙卯。免簠。
唯王四月既青霸辰在丁酉。舀鼎。
唯四月既生霸己丑。作册大鼎。
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師遽毁。
唯五月既生霸庚午。㝬季鼎。
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趞曹鼎二。
唯六月既生霸庚寅。師奎父鼎。
唯六月既生霸戊戌。師毛父毁。
唯六月既生霸辛巳。𪓐毁。
唯六月既生霸。遹毁。
唯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伯克尊。
唯八月既生霸。癸毁。
唯王九月既青霸庚寅。揚毁。
唯九月既生霸辛酉。𡩜鼎。
唯七年十月既生霸。趞曹鼎。
唯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卯毁。
唯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鄭虢仲毁。
唯十又二月既霸生丁亥。𧽊毁。
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㪤尊。
唯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敃毁。
唯十又五年三月既生霸丁亥。大鼎（既霸殆即既生霸）。

以上既生霸共廿七例。

（丙）既望

唯一月既望丁亥。䨓伯星父𣪘。
唯征月既望癸酉。員鼎。
唯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伊𣪘。
唯廿年正月既望甲戌。休盤。
唯元年二月既望庚寅。師訇𣪘。
唯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走𣪘。
唯三月既望乙亥。史族𣪘。
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庚嬴鼎。
唯五月既望甲子。小臣傳𣪘。
唯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寰盤。
在五月既望辛酉。辰盉。
唯五月既望。師秦宮鼎。
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師虎𣪘。
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曶鼎。
唯王廿又五年七月既□。𤔲比盨。
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粵若翌乙酉。小盂鼎。
唯九月既望甲戌。無惠鼎。
唯王九月既望乙巳。守鼎。
唯九月既望庚寅。𪻐彝。
唯王十月既望辰在己丑。庚嬴卣。
唯十又二月既望辰在壬午。榰𢼸彝。
唯元年既望丁亥。蔡𣪘。

以上既望共二十二例（註七）

（丁）既死霸

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兮伯盤。
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頌鼎。
唯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呂鼎。
唯五月既死霸辛未。守𣪘。
唯六月既死霸壬申。競𣪘。
唯六月既死霸丙寅。遹甗。
唯八月既死霸戊寅。史懋壺。
唯九月既死霸丁丑。矢令𣪘。
唯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下蠚雝公諴鼎。

以上既死霸共九例。

合四者計之，共得一百八十一例，（註八）搜採所得，數當有限。更有稱元日者二例，其一爲邾王子旃鐘，已引見前初吉例下，其二爲陳肪𣪘，文云「唯王五月元日丁亥」。此外或稱吉日，或稱月吉，都與紀日法無關。若今審本所見，唯上舉四詞相同，餘則金文均未著錄，據此推之，余以爲金文時代（約春秋末已前）通用之紀日法，祇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個名詞，審本所錄，係別爲一套（說詳下四節）。夫系統不同，欲強合而聯貫之，所謂治絲益棼矣。

或謂宜別出典籍所有、金文所無者爲另一套，事近默證，殊不知默證非絕對不能用，反對默證者固承之。（註九）高等代數有所謂探球法，以白、黑球各五枚置瓶中，任意探五枚，能一次完全探出白球者機會極少，反之黑球亦然。今上舉諸例，已逾百八，數不爲少，況器之作人不同，作年不同，作地不同，其出土之年之地又復不同，而謂當彼一時代已有「旁生霸」、「旁死霸」等詞，恰爲作器者所未用，或用而恰在吾人未經發見之內，衡以決疑率（亦稱或然率probability）可能之機會，微乎其微。（大系考釋序云，「傳世兩周彝器，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夫故謂金文與典籍兩種紀日方法，不能混在一起研究，蓋典籍所錄，雖或同乎金文，然別有不同者夠連其間也。

二　初吉與既望

初吉是公名抑專名，第一個問題，即涉文字之如何解釋，今願

命、「惟四月哉生霸，王不懌，甲子，……」說者既認不懌前乎甲子，顯於書例相類之靜𣪘「唯六月初吉，王在葊京，丁卯，……」又謂王在葊京，不必前乎丁，卯，(註一〇)則大有一國三公之感。劉氏以爲典籍中記月相後常隨以粵幾日字樣，今顯命不作粵幾日甲子，故知甲子卽載生霸；然此祇可就古籍言之，金文除可疑之小盂鼎外，絕無記月相後隨以粵幾日之例。且劉固認吉卽上旬，比王說尙放寬兩日。若疑王屛棄初九、初十兩日於初吉之外爲不當，則須知初吉之後，別有旣生霸限之，余所謂「霸」字定義未明遂招攻擊者此也。

上舉金文諸例，初吉幾占全數十分之七，劉以爲周人行事，似乎特喜上旬，其說近是。倘依毛傳、韋昭，以初吉爲朔，依俞樾、趙曾儔，以旣死霸爲朔，旣生霸與旣望在十五或十六日，是周人行事，大多數限於初一及十五、十六之三日。(據余太概統計，周金有干支者約二百六十，對前舉金文一百八十一例，約爲十與七之比。)當時縱多忌諱，未必錮蔽若此。唯初吉等四詞各管七、八日，則雖偏重初吉而餘日尙非全無舉動，斯爲近於現實矣。且初吉實際旣管七、八日，苟推算時削足適履，非無恰當朔日之可能，但能證若干器初吉干支之當乎朔日，仍未足以否認初吉非四分月之一名；無他，全可以包舉部分，而部分不能超出全之外也。

劉師培、吳其昌兩家會證初吉得爲中、下旬，旣望與旣死霸得爲上旬，旣生霸得爲下旬，然關於金器時代之鑒定及據以推算之歷法，其不可信，視王國維之例證，固猶二五與一十，未得他據，絕不容軒輊於其間。推言之，無論何家，於現時而欲安排一周初歷譜，縱非絕不可能，要屬來得太早，此則魯實先氏所謂共和前年數，史記未明，古歷疏闊，難以逆推，劉氏所謂要使古代歷法像現在精密，眞是厚誣古人者。今不必侈言上古，試就唐觀之，則天光宅元強進正月癸未朔爲甲申，聖曆元強易甲午朔爲甲子，永昌元僅十一月，久視元乃十五月，其他與推步相差之處，更僕難數。又如開元二十年，朔閏考稱七壬寅朔，八辛未，九辛丑，檢出土唐誌，著九辛丑朔者固有三石，而著七辛丑朔者亦見兩誌，(註一一)足證當年歷書，或七、八、九三月連三大，中古如此，上古可知，試問吾人有何術以推求其如何疏誤耶？

春秋重書朔，疑初吉是朔者許受春秋之暗示，然而無庸疑也。春王正月，經生費盡幾許筆墨作注，然今所見諸召鐘「唯正月孟春吉日丁亥」，商鞅量「冬十二月乙酉」，均入戰國中葉，「夏」、「秋」用作四時名稱者，金文直未之有。「朔」字亦不見，祇得元日兩例(引見前)。「元」雖可訓「善」，但邾王子鐘用「初吉」冠「元日」上，「吉」、「善」義複，故應依尙書正義釋元日爲朔日。「初吉元日」者，恰確證初吉爲四分一月之公名，蓋朔是初吉中之一日，其例猶後世言「某年某月上旬甲子日」也。不然，金銘簡短，古人寧肯作複贅語耶。

初吉非必爲朔，在金文本身尙可得一重要旁證。譬如正月丁亥朔，平均須數十年乃一見，此在稍明算數者自知之，今金文著錄「正月初吉丁亥」者凡卅一例，倘謂同是某某年之作品，雖非絕對不可能，然時間限制問題，要當注意。但如初吉係管一日至七八日，則十數年之間，便有得遇丁亥之機會，雖易適不侔，前文謂材料盡情羅列而後眞象易見者此也。

董、劉兩家均謂初吉非月相，不能據以觀察月之形象，爲何能與生霸、死霸等月相名詞連在一起云云。(註一二)按稱「霸」爲「月相」，係日人及趙氏沿用漢儒之誤解，初周雖根據月之盈虧而分一個太陰月爲四分，但其命名固不必定用關乎月相之字樣。後世每一種科學發達，其最初命名，多凌亂無章，及久而經世界學者會議，乃漸臻——猶未完全——一致。今說者曰四分一月之命名，必須同準乎月相，是挾持科學發達時代之主觀，追責古人以不就範也。抑「初吉」字面雖不含月相，但因有「旣生霸」相輔而行，實孕「未生霸」之義，其理由將於下節見之。

其次說到旣望。按「旣」雖有「盡也」之訓，然經典中所見，率適用「巳也」之訓，兩者不可互通，(註一三)又說文，「望、月滿也，

與日相望，似朔君。」按歐人所謂月相(phases of the moon)，約分新月(new moon)、前四分一(first quarter)、滿月(full moon)、後四分一(last quarter)之四名，依許說望為月滿(full moon)，是「望」字顯指月相，「相望」是臆解。依前說既望為月已滿，申言之，即「月已滿之後」，是「既望」亦顯指月相，苟謂望與既望「非月在天之形相」，實所未解。

趙氏於此，則謂「哉生霸等沿自太古觀察自然之時所用名稱，晦、朔、（望）等為歷法知識發達以後所定名者，」別既生霸、既死霸為一系，望、既望為別一系，(註一四)無非欲遷就其生霸即望、既生霸即既望之假定。考趙文全篇，申重複不可信之主張者凡六七次，而此處則認有重複之兩系，已嫌矛盾。且曶鼎既用「歷法知識發達後」之既望，何故復用「太古觀察」之既生霸，趙謂由此可以解疑，總未見得。劉氏認王斷既生霸之非望為批評確切，可為的論。

劉氏又疑廿三四日何以不能稱既望，則須知既望之後，有既死霸為之限（見下節），與初吉後之有既生霸同。若易經三著「幾望」，其義與「望」無別，非「幾近也」之幾，此乃古語之僅存者（別有字說）。

三　霸之古義

今人作古文化研究者輒謂東西不可互比，此無力招架之遁辭也。石器及古陶、古銅等何以常取與西方比？passive voice, apposition 等古語法何以能與西方比？況乎天文、歷算，自來論者即謂我國與西方有多少關聯乎。故涉四分月之研究，尤不可不向西方文化兩大近鄰，——伊、印——看其有無相類之事實；因周金紀日諸名，甲骨文字絕未發見，東方（商）之文獻，已不足徵也。

古伊蘭文有 vi-shaptatha，字義為「其間相隔之第七」或「第七日」，(註一五)即月滿日及新月日後第七日之神；換言之，則每月之廿三日及八日，在月滿（十六日）及新月（一日）後各七日也。就每月三十日之月相言之，此兩日相當於「後四分一」及「前四分一」。(註一六)由上所引，足徵古伊蘭人已有四分一月之方法。

梵文有 paksa 字，猶云「一部分」或「陰歷月之一半」，自新月以至滿月，謂之 purva（有前之義）或 apuryamana（有未滿之義），其後則稱曰 sukla-p，梵語雜名（六二頁）譯曰「白分」(white portion)，每月之前十五日也。後半月謂之 apara（有後之義）或 apa-kshiyamana（有月缺之義），後來則稱曰 krishna-p，梵語雜名譯曰「黑分」(dark portion)，每月之後十五日也。西域記二、「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註一七)由上觀之，古印度人雖無四分一月之制，但分陰歷月為兩分，則與再分兩分為四分者性甚相近。

周金之霸字，據余所見，應與印度文同原，其證有四：

（一）霸，切韻 p'nk，同乎梵文 paksa 之 pak。

（二）說文、「霸，雨濡革也，從雨革，讀若膊，」按雨濡革之「霸」，典籍絕無可徵，而其音讀若膊（切韻 pâk），則與霸又作魄（切韻 kek）甚相近，梵文 pak 之 k 如重讀，可類於「革」（切韻 knk），而霸在廣韻復一音「革」（同義），有此種種符合，不能不令人認許慎「雨濡革」之字原，純屬望文生義。(註一八)再考 paksa、梵語雜名之譯音為「博乞史」，博切韻 pâk，與「膊」祇不送氣小異，粵音更膊、博無別。古人於天文類之字，多假「雨」為會意，從雨者不定與雨水相關。今所見周金，如癸殷、鄭虢仲殷之霸或作䨣，知䨣是省文，霸是繁文，(註一九)許氏未見周金，霸之真義，自戰國末業已失墜，雨濡革之為臆說，自可於上舉諸證佐反映出之。

（三）博乞史之義為「部分」，施於心計，可表陰歷月之一半，則施於目察，當可表太陰圓面之一半。月光已現或已缺其一半，在一般肉眼，均能判別，初不必賴較深之數學知識。商人一月分三旬，具經諸家考定，假使周人東來，改為二分一月之紀日法（如印度），是走向退化路徑，惟將「一半」專用諸目驗，非徒易於辨識，且比三旬稍

進一步，乃我國歷法上極自然之進展。

（四）白虎通「月三日成魄」，康誥馬融注：「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此以魄爲有光部分，與說文釋霸略同。漢書孟康注：「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此以魄爲無光部分，與前說異，俞氏於是謂孟不知霸爲本字，魄爲假字，近人又謂孟沿魂魄之盞而誤。然以梵文解之，則「博乞史」得爲光分，亦得爲黑分，兩義可並存，漢代經生，各傳師說，僅得其一知半解，末路遂愈趨歧異，余屢言讀書須先求其所不可誤者此也。

綜上四證，凡字體之構造，音讀之變遷，詞義之歧互，前人所忽略或誤會者，得梵文之助，均可疏明而溝通，故苟謂霸非與「博乞史」爲同原，斷斷乎不可。

唯然而周金紀日之四詞，解釋自易。初吉者指最初之一分，字面本無限制，以下有既生霸爲之輔，故自一日至七八日而止。既生霸者，月已生半分也，自上弦以迄望。今鄉僻婦孺猶言「十五月團圓」，古來文獻又嘗稱十五夕爲望夕，依此揣之，上古之望，殆無「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釋名）之嚴密規定，復次周金無單書「望」之例，故就「事實」言，既生霸之一般用法，應包「望」在內以湊成其半月之分割。第三分曰既望，猶云月既滿之後也。譬如吾人說「已食飯」，初無限用於飯後一刻或一小時之理，專既望於十六或十七，揆諸辭意、文理，同覺難通。既望之名，本可管領下半月，然因別立既死霸爲之佐，故至廿二廿三日而止。既死霸者月已缺其半之謂也，晦以前均得言之，但不能遞至下月一日，侵入初吉之範圍。換言之，後世之上弦、下弦，即既生霸、既死霸之上限，所異者前爲專名，限用於一日，後爲公名，所函乃七、八日。俞氏言「朔爲死霸之極，望爲生霸之極，」如果將「朔」改作「晦」，而斷章取義，恰是周金既死霸、既生霸之的解。王氏能推明四分月之術而不能抉出霸之朔誼，殿之者能替王氏說出霸之近誼（「霸爲月球西半有光處」），顧又不信四分月之術，互爲糾紛，各有是非，而其蔽皆由對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一條，未能勘破，清儒捧許過當，積二百餘年之淫威，稍涉遲疑，便不易跳出圈套，甚矣許學之誤人也。

四種名詞，如上解釋，則當日雖三尺童子，猶了其義，丁天朗氣清之夕，舉今夕何夕以問，當必能數四分月之某分而對。即使天氣陰雨，或時近月晦，但因四分月之一分約七、八日，兩分約十五日，在稍有經驗者，亦不難據前度所見之月相，約略推算，或相差一二天（劉氏說是極可能之事）。又可據下回所見月相矯正之。若「旁死霸爲月亮缺盡日期，不容易由觀測求規定」，古人縱愚，未必採此作標準。從比較方面觀之，則上古印度人分月爲光、黑兩面，我國分月爲光、黑兩半，迄於今科學發達，所論月相之「前四分一」、「後四分一」，猶是光、黑兩半之變言，此固古今中外之自然觀察。霸是中性或中立詞，非正詞或乏詞，則趙氏所論「霸爲明文正詞」，已根本打銷。歐文之「前四分一」及「後四分一」，就字面論，固不露月相，更何疑於周文初吉之非月相耶。

梵文又有 pra-vkāś's 義爲可見、光照(to become visible, shine)如縮略其音讀，當與朏切韻 p̑jwei 相近，但亦得類於「魄」，立義則與說文「朏未盛之明也、從月出」無殊。兩兩比勘，余確信說文、「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實誤析「朏」字之訓，分隸於「霸」，馬融說、「魄、朏也，謂月三日，」即同時學者誤混之迹。王氏不審，因有霸、朏「二字同義、聲亦相近」之引申，余則謂朏當與梵文此語有關，其立義適乎霸也（古文月朵、「三日曰朏」）。（註二〇）

四　古籍中之記日名詞　古文武成未佚

往日金文出土不多，學者力求其與典籍合流，自係被環境所犧牲，非今人智勝古人之謂，此吾儕對前修所應曲爲體諒者。今則不然，金文所見，當弗與古籍合轍，業被學者陸續指出，倘不可同而必

強其同，不能合而竟使之合，結果將使異象愈晦。劉氏言周書關於紀日之材料，與金文者性質頗有不同，如果將兩者混爲一起，則從此混合物求出之結果，往往潛伏着先天的缺點，其區別之最值得注意者，就是金文著錄初吉甚多，而在周書武成業篇卻未見過，王國維未曾注意此點，乃其理論不能十分健全之一要因，故金文時代，應較早於周書，兩者顯劃淸時代，周書有許多地方，係插入旁生霸、旁止霸等晚近名詞云云。（註二）上舉大要，拙見恰與相同。所略異者，顧命等數篇，余以爲仍是周初作品。蓋漢書律歷志已標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家之歷，劉歆作三統歷譜，自是兼採衆說，非純出創造。我國學者重建商、周舊歷，十餘年來已再三見，古人之智，不讓今人，則自戰國以降，歷數漸明，各逞本能，互爲追步，亦固其所。簡册時代，多憑口授，口授之際，勢必兼及解說，假經師本其推步所得，附帶說出，經過再三轉授，便不難忘爲釋文。夫編帙傳抄，正行與附帶易別，而猶有相混，況口授專憑領會，毫無迹象可尋者乎。如是之滲入，純出傳誤，與作僞迴異。金文大系序云，「周文（尙書）而可信者僅十五六篇耳，而此十五、六篇，復已屢經傳寫，屢經隸定，簡篇每有奪亂，文辭復經竄改，作爲史料，不無疑難。」周代諸子，近人謂常被後師屬累插入，古人經與子等觀，故經有插入，殊不足奇。

典籍記初用月日之較爲詳細者，莫如古文武成，舊說其篇早佚，茲試取與世俘解作比較表如次：

漢書律歷志引古文武成	汲冢書世俘解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
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
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

其最異者爲壬辰、癸巳與丙辰、丁巳，三月與二月，前者尙書後案及莊述祖謂丙、丁當壬、癸之誤，後者經義述聞四謂三月乃二月之訛，再除去字體之古今，（如霸、魄。）傳鈔之倒錯，（如「庶國祀馘于」與「庶祀馘于國」。）引書之省略，（第二第四兩條，志引均略去一句。）意義之互換。（如莊述祖校旁生當作旁死）。兩書幾無不同之處。古人名篇，多用首兩字，今世俘解首云，「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若不要紀月日一句，首三字便是「武王成」，更略去常見之「王」字，便是武成（可與同書嘗麥解之得名相比觀）。由是可斷劉歆所謂武成，實卽今之世俘，篇並未佚，特傳授之家派不同，遂命名各異耳。依是歸併，古籍紀日法乃僅存極少數之材料。

甲、初吉　小雅、「二月初吉」。國語周語、「自今至於初吉」。

乙、既生魄　汲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大開、「維王二月既生魄」。柔武、「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小開武、「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大戒、「維正月既生魄」。本典、「維四月既生魄」。亦見今本武成，孔傳謂十五日後。

丙、既望　召誥、「惟二月既望」，劉歆謂十六日。

丁、既死魄　見世俘，劉歆謂朔日，閻若璩疏證五上謂晦日。

戊、哉生魄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顧命、「惟四月哉生魄。」劉歆謂十五日，許愼、馬融謂三日或二日，孔傳、十六日。

己、旁生魄　見世俘，依莊校則並無此名，朱右曾、俞樾、黃以周同以爲十六日。「旁」、劉歆訓旁近，孔晁訓廣大。

庚、既旁生魄　見世俘。劉歆謂十六日，閻、鍾（墉，槪亭述古錄。）俞、黃同以爲十七，王國維疑既字衍文。

辛、旁死霸　見漢志引古武成，依莊校亦見世俘，孟康以爲二日。

壬、哉生明　見今本武成，孔傳以爲三日。

由上可見金文所有自甲至丁之四項名詞，古籍中僅及十例，其有干支可考者又祇丙、丁兩條。餘則自戊至壬，皆金文所無，壬條生明

是臆撰。己、辛兩條任一有誤，依此裁汰，實祇得哉生魄兩例、既旁生魄及旁死魄各一例，而末兩詞又在可通不可通之間，故此三詞不能不認爲戰國學者之虛構及插入，絕非初周民俗之通語。新城氏論四分月相，不列哉生、旁生、旁死三名，誠比王氏進一步。蓋春夏末葉，朔望之推算漸準，舊有初吉四詞，因久廢而異義失墜，戊、己、庚、辛數語，又作贅疣之意釋，固無怪解各不同。夫例證孤乏如彼，而戰國學者理想中之語義及曆法，又不可捉摸如此，乃欲據爲重造周初真曆之大綦，難矣。

斷言以蔽之，周金之紀日法，是當年的事實，書本所是，是後人的意造，前者千真萬確，後者疑問百出，前者各具多例，後者幾全屬孤證，其不應同爐而冶，理由甚顯而易見，王氏不能盡分涇渭，此其立論所以弗完而示人以隙也。

準是推論，謂古籍之既死霸等是專名，余並不反對。但金文之初吉等則不然。蓋金文之紀日，係應用年——月——四分月——干支的四級制。近年所獲漢簡，有書「始元三年三月丙申朔丁巳」者，有書「元鳳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者，丙申朔本無事而特書之，所以見丁巳爲月中第幾日，戊子之重書，於以見前文戊子朔之屬於領導性質，金文如「唯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等，所用名詞雖異，而書法用意則與漢簡同。彼時朔、望未能確推，故以四分一月之初吉爲其領導，非如是，則不能約知丁亥在月之某分也。趙氏等徒知向古籍推尋，又誤用尚書後案之說於金文，故其立論不當，與王無異。

五　初周歷法之推測

欲求本問題之徹底了解，勢須略論初周之歷法。杜預以爲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眞，所傳七歷，皆未必時王之術，祖沖之又言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劉氏力主之。據余所見，此說最少適用於黃帝、顓頊、夏、商四歷，黃帝乃人格化之神，（註二二）試問安所得歷也。唯劉氏謂初周歷法，承襲商制，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月整三十日，則未敢苟同。商歷非本篇範圍，不復旁論，今祇從周代論之。

（一）甲文最重旬，而周金用旬紀日者卻未見過。爾雅釋十干十二支，而甲文無干支字。

（二）初吉等四詞是創見於周金，甲文絕未之有。

（三）攻堯典之僞者大不乏人，余則以爲初周作品（不連舜典）。周初雖知一太陽年爲三百六十六日，但欲與陰曆相調節而形成「陰陽歷」，由歷學史觀之，中間須經三四百年之演進，并不爲長。故謂初周係行用一種適用月相之粗疏陰曆，既無背乎初吉等詞，而下接漸明置閏之春秋歷法，亦相適合。若謂穆王以後，始用陰歷，則下逮春秋初期，僅二百年，反嫌時間過短，堯典的話，更難安放。

（四）依劉說初吉縮上旬十日，是固定的，又依其所推論，則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是不固定的，各有輪着上、中、下旬之可能。但吾人可問，周人爲何未應用更自然之「中吉」、「下吉」以與初吉相配。爲何未見「初吉既望」等之連書？

（五）周禮非周公作品，幾爲定論，鄭注據文推測，更難置信，即使認小宰注、「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爲無誤，仍不外古人「舉其大數」之常例，此外更無初周一年爲三百六十日之柄據。

（六）周人建子，當由周、商異族周人守其故俗而然。（註二二）錢寶琮氏謂「由夏正因歷家失閏而變爲周正，爲無心之過失，」其言至可玩味。（註二三）秦始不知底裏，誤爲易姓必須改正，故有無意識之建亥更革，第此事固爲反映子、丑異建之故事非虛也。劉謂正朔與歷法似無多大關係，雖屬可能，但錢說苟不誤，則初周當自有——而且固守——其久奉之歷，故鑄此錯。依是而論，周人未必遽然改襲商歷，吾人亦難設想周人固有之歷與商歷相近。

劉氏又謂初周歷法，如照一月卅日的排法，不特合於周書，且合於逸周書的一切曆日云云。吾人要問：（一）從克殷至周公攝政六年祇八年，已閏過三十日，爲何從文王廿三祀至武王十一年共三十八（？）

年，又從周公攝政七年至成王廿八年共二十八年，中間竟未嘗置閏？應閏不應閏，究有何明證。(二)如果成王以廿八年四月崩，依春秋繫露「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故畢命之康王十二年，實卽成王崩後十四年，爲問康王以後，是否如此遵行？(初周有無三年之喪，今且不論)。(三)依說既生霸爲三日至十五，既望約十六至廿九，既旁生霸爲二日至十三，因失閏之故，充其量又可轉到上、中、下任一旬(引見前)。按劉評王國維說，謂每一名詞有四五天游移範圍，安排自不發生困難，「這是佔得了他的理論的缺點的便宜」云云，但如上所舉，似乎可佔之便宜，更比王爲多。

六　結論戰國爲我國文化大斷層

戰國爲我國思想解放時代，固今人所樂道，然名物之間，屢發見若干重要變化，余曾一再揭之。(註二四)卽就紀時、紀數而論，初吉等四詞，不須見於戰國記事文字，青銅器確知屬戰國者，如諸召鐘「唯正月孟春吉日丁亥」，大良造鞅量「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始見用四時與月份相連系。又周金百與十、十與單位之間，恆著「又」字(例外者祇師獸𣪘及可疑之小盂鼎)，而詛楚文「十八世」與鞅量，均已省「又」字弗用。凡如是，皆足徵戰國爲結上開下時代，歷法之變遷，亦不能逃出此一段過程。無如青銅鑄業，春秋末已日就衰微，出土器文字較長，可決確屬戰國者，數不上十，石刻時方萌芽，量更有限，青黃不接，遂令歷法興廢之實際，吾人無從置言。故戰國時代，可認爲上古文化之一大斷層，其遺憾或終於無可彌補。至始皇焚書，略類乎惡皆歸紂，書可焚，口授不可焚，金文、石鼓之奇字，說文幾全未收入，漢儒疏於考古，要尸其一部之咎。

總言之，本問題之癥結，純在霸之字義，至戰國而失傳，霸字一明，便易全盤了解，欲明澈先民文化之遺跡，孰謂不須賴考據方法耶。

卅四年七月上旬，南溪板栗隘。

(註一)趙會儒氏月霸論(史學雜志二卷二期)謂王本國維(一四頁)，但顧爲十六至晦爲生霸，祇兩分，非四分一月。

(註二)劉朝陽氏周初歷法考五四頁。(一一)一〇〇頁。(一二)六八頁。(一三)六九頁。(一四)七八頁。(一五)六〇及五七——八頁。(二二)五二頁。(二三)五九頁。(三〇)九〇頁。(三三)一〇三頁。(三四)一〇六頁。(三五)九九及二六頁。(三八)九頁。(三九)一〇五頁。(四〇)九九、一〇四及一〇一頁。(四一)一〇一頁。(四二)八七及九〇頁。(四三)九五頁。又劉氏在所著關於殷周歷法之基本問題，對周金之「初吉丁亥」，曾提出朔[illegible]，嘗於拙著釋吉日丁亥再討論之。

(註三)往歲聞人言，卜辭研究，比周金爲易，年來略加涉獵，始知並不如此。甲文常有一條十數字，不明其大意云何者，一般所謂已認識之字、或已了解之字義，往往出以臆測，周金除人、地名外，類此者尚比較少數。

(註四)屬此者不止一事，其著要則爲周代職官，可參金文叢考一周官質疑。

(註五)此鐘或謂僞作，於省吾氏已辨之。按作僞者必嘗擬倣舊文以取人信，而「初吉元日」是紀日法僅見之例，馮雲鵬氏剩金石索在道光元年，彼時陳肪𣪘之銘文，尚未公布，亦未經孫詒讓氏考定爲元日，如其作僞，似不出於弄巧反拙之一途也。餘別有說。

(註六)拍尊是吉日乙丑，新城新藏誤引爲初吉(支那學五卷三號上古金文之研究)。公𣪘蓋銘是「辰在丁亥」，非初吉丁亥(同上)，又劉引吳其昌金文歷朔疏證本壽𣪘「唯九月初吉戊戌」一條，未經對勘，故不採。

(註七)劉引號𣪘尚有師𩛥𣪘「唯王元年九月既望丁亥」及大保𣪘「唯四月既望丁亥」兩例，以未勘原文，故不採。

(註八)新城新藏所搜金文資料，計初吉八七例，既生霸二十，既望十六，既死霸六，共一二九例，遺漏尚多。

(註九)參古史辨二冊二七頁。

(註一〇)華西協合大學研究所集刊二卷三及一一頁。

(註一一)拙著突厥集史卷十五。

(註一二)同前引集刊五頁及歷法考六一頁。

(註一三)清儒常誤用連環相等式以證字詁之互通，并於拙著評方言箋疏條闢之。

(註一四)史學雜誌一七頁。

(註一五)黃以周釋生霸死霸云，「殊不知古人計日數，皆以本日數至來日，僞武成雖本日而數之，所以見譏於後儒也，而朱氏斷從之以爲說乎。」依其說則當作「粵八日」，但余以爲黃說特片面之辭耳，古人計世數，亦有連本身、不連本身之兩法，說見拙著姓纂四校記。

(註一六) Bartholmae 古伊蘭字彙一四七二行。

(註一七)按載歲月發生論之「霸」，係作始生光解，不作[illegible]解。

（註一八）說文段注、「兩猶革則成龜，今俗語若朴，」顯是附會許說，然靈父當「革」，不知殷將云何？

（註一九）師壺父鼎既生霸之霸，下右從帛，不從月，又別一寫法。

（註二〇）孔拉第稱 Ideyers, chalmers 等曾指出印度天文學係在西元前二紀輸入我國（古史研究二下五六九頁），其文未見。依本節所論，則西元十紀以前，我國曆法已有與印度相似之點，且比其更進一步。又劉文謂朔、朏同義（一〇四頁），亦藉以信，朔始一。始之義，猶後世云一日也。

（註二一）本誌四一卷三號拙著三八頁。

（註二二）參拙著夏時與狄族（民族學集刊六期）。

（註二三）可參閱本誌四〇卷一七號四七頁拙著記波斯曆法。

（註二四）參本雜誌四一卷六號拙著四六頁及拙著三伏日起始第三節。

殷商拓地朝鮮考

蔣逸雪

朝鮮入吾版圖，或謂肇自唐堯，或謂始於六國，稽古者以悠久自矜，識微者認時晚爲可信。參稽羣籍，始知俱非篤論也。

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此以堯時朝鮮已爲我屬者之論據也。孔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但釋其義，未嘗明言在何地。范蔚宗著後漢書，其東夷傳贊始指爲朝鮮地。（註一）杜君卿通典，胡朏明禹貢錐指，並承其說。孔傳雖僞，然所稱漢儒之言，似非臆造。其引馬融曰：『嵎，海嵎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之地名。』（今坊間所印尚書正義，有作『暘谷海嵎，夷之地名，』至嵎爲讀，夷字屬下者，未敢以爲然，以其上下文皆釋暘谷，非釋嵎夷也。檢原書自見。）案嵎本通隅，山、小篆作山，金文多作凵，亦作山，字畫有虛實，而形無殊；阜、小篆作𨸏，古文有作𠂤者，乃山之轉側，形變而義不改；故嵎可通隅，支遁述懷詩：『息肩棲南嵎』。注：『南嵎即南隅』。史記五帝紀，嵎夷作郁夷，張守節正義：『郁、音隅，』是唐人猶有明此者。海隅，古澤名，呂氏春秋有始：『何謂九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具區（即太湖）雲夢等均澤名，則海隅亦當爲澤之稱。爾雅釋地，郝懿行義疏：『今自登萊之黃縣掖縣以西，歷青州之壽光樂安以東，及武定之海豐利津以北，延袤千餘里之間，皆古海隅澤之地。』暘谷，楚辭淮南子並作湯谷，史記舊本亦同。竊疑湯谷即海隅澤，孔傳謂暘谷嵎夷爲一，有所據矣。馬釋嵎爲海嵎，是也；謂爲海嵎夷，則非也。既釋夷爲萊夷，若海嵎亦爲夷，則應稱嵎萊；否則則爲不辭。後之說禹甸九州者，謂青州當今山東省東北境暨遼寧省南部之地，（漢古文家謂嵎夷在齊地，今文家則謂在遼西，許叔重雖爲古文家，然今文之說亦兼錄，自亂其義例矣。史公習春秋於董仲舒，又學尚書於孔安國，乃兼通今古兩家言者，其五帝本紀結論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其識辨超人遠矣。）未聞及於朝鮮也。堯又在禹前，彼時國力更難及此。司馬子長謂黃帝『東至於海』，定羲仲所居在登萊之間，由時空兩方面言，均屬可信也。

史記朝鮮列傳，直從燕人王滿敍起，此以朝鮮屬我始於六國者之論據也。不知宋微子世家既錄洪範全文，接語即曰：『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朝鮮未入中國版圖、箕子豈能經往而君其民耶？史公於王滿前不述者，特避文之重複耳。

日人林泰輔著有朝鮮通史（陳清泉譯），其敍古朝鮮之發源曰：『古代朝鮮之興起，當然受中國之影響，亦可謂藉漢民族之力而開拓

者也。中國爲東亞最古之國，至少距今當不下四五千年；朝鮮雖不及此，當亦在三千年以上無疑。舊說：當中國唐堯之時，有神人降於太伯山（平安北道妙香山）檀木之下，因名之爲檀君。此爲後世佛敎家附會之辭，殊不足信。然謂殷之箕子避地於朝鮮者，必非無稽之談也。」彼不信堯時之神話，則是；謂中國開拓朝鮮始於箕子，則非。吾以殷商之拓地朝鮮，遠在相土之世，早於箕子且千歲。詩不云乎？『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註二）毛詩：『烈烈威也』。常武下傳云：『截，治也。』謂相土聲威遠播，海外亦受治也。禹貢：『海岱惟青州』。傳：『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疏：『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是以岱指登萊半島，以海指遼東半島也。詩曰『海外』，則必超越遼東而入於朝鮮境矣。王靜安依甲文謂「截」爲春秋隱十年伐載之「載」，漢書地理志，梁國留縣，故載國。章帝改曰考城。春秋三傳，左作戴，公穀作載，戴國即載國，是載在今河南省，何以解於「海外」二字耶？竹書紀年，夏后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王肅云：『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漢書刑法志：『殷周以兵治天下，天下既定，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三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蓋猶是相土之遺制。（註三）唯其整軍經武，始能揚威海外，此中顯有線索可尋。案漢書地理志，樂浪郡屬縣中有昭明；元菟郡屬縣中有上殷台。據史記殷本紀，商之始祖爲契，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竊疑拓地朝鮮，昭明或已具斯意，至相土成其志，乃以昭明名一重鎭，以紀念其親。上殷台，上殷者，殷之先世，蓋指成湯以前。豈相土既定朝鮮，於其地作京觀以耀武功歟？縣制晚起，而名則每襲舊稱，非蘧質然而生也。

至相土東征之進程，或緣今之山東蓬萊至遼寧之老鐵山嘴，然後遵海而東，渡浿水（註四）以達朝鮮者。蓬萊老鐵山嘴之間，現爲渤海海峽，一片波濤。彼時爲陸爲海，則不可知。蓋渤海古作渤澥，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渤澥』。文穎曰：『渤澥，宋之大澤也。』齊都賦注：『斷水曰澥』。渤澥海在昔與外海不通也。夫泰山山脈，本由遼寧渡海而來，今之長山竹山猴磯牽牛鼉磯大欽小欽城隍諸島，棋布水上，迤邐不絕，猶有遺蹟可見。此實由海水沖刷，陸地逐漸斷陷所致，非自古如斯也。或謂：人事興衰，歲月有變；滄桑移易，歷時綿長；人史地史，未宜比傅而論。雖然，無論如何，渤海在夏商之時，峽口必較今爲仄，操舟易渡，無庸致疑。易下繫云：『黃帝堯舜氏作，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渙之爲卦，下坎上巽（註五），象徵木在作上。舟楫之興，其來久矣。竹書紀年謂夏后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而滅之。論語亦載南宮适『奡盪舟』之語，奡春秋傳作澆，與紀年同，先儒皆謂其多力，能陸地行舟，有類戲論，實則其時豈僅有舟濟，且有水師矣。后相九年，居於斟灌，括地志：『斟灌故城在青州壽光縣東五十四里』。其地去蓬萊密邇，從是東征，殊屬便捷。殷爲東方民族，始終以齊爲根據地，其人才亦多出於東方。史記殷本紀：『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古稱渤海爲北海，孟子：『挾太山以超北海』；『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皆是也。今山西平陸縣東有聖人窟，俗指爲傅說版築處，其去北海遠矣。世之治殷商史者，往均側重中原之致爭，而忽視遼海之闢拓，地之在東者，強指西以實之，致多失真相，是一蔽也。更就晚近所得之地下材料言，李濟在歷城龍山城子崖所發見之黑陶黃粉陶，與安特生在錦西沙鍋屯之所獲，初無二致。是渤海南岸

與渤海北岸之文化本屬一源，卽民族亦同出夷系。後漢書旣列朝鮮於東夷，又曰：『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呂氏春秋古樂篇：『殷人服象，爲虐於東夷』，是殷亦夷也。孔子，殷人，（註五）故有浮海之歎，（註六）居九夷之思也。（註七）李濟讚歎城子崖之黃陶與黃粉陶技術精絕，惜其至春秋以後失傳。余以爲殷人陶業之發展，實肇於舜，路史疏仡紀記舜云：『東夷之陶苦窳，陶於河濱，期年而器以利。』河濱在濟之鄆城，（註八）故孟子指舜爲東夷之人也。案竹書紀年，后相三年，征風夷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后少康二年，（註九）方夷來賓。在此三四十年中，正相土佐夏政之時，名爲夏人有事於域外，實則殷人自拓其疆也。其後后芬三年之九夷來賓，后泄二十一年之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黃夷，（註一〇）乃殷人賡續作疆邊之舉也。翦伯贊氏謂根據考古學家之報告，沿渤海灣自南而北，如在今日山東龍山之城子崖，黃縣之龍口，在遼寧錦西之沙鍋屯，在旅順之老鐵山郭家屯，在大連之東老灘貔子窩傳家莊柳樹屯，以及撫順朝鮮等地，均發現新石器時代之文化遺址。此等文化遺址，說明在史前時代，渤海沿岸已是中國文化搖籃地之一（見中國史論集）。所言平實可信。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漢書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括地志：『孤竹古城，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案令支當今河北省遷安縣境，盧龍與遷安毗連，二說無甚出入。夷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蓋示殷民民族不屈於周也。世本：『昭明居砥石』。砥石當今何地，自來無定說，余疑砥石卽碣石，古無舌上，是砥與碣之同屬舌尖音。說文無砥字，但砥从氐得聲，氐碣古音均在第十五部。魏書隋志通典通考均謂碣石在盧龍，明一統志則謂在昌黎西北五十里，昌黎在盧龍東南，亦屬鄰縣。要在灤河流域，渤海之濱。可徵環渤海皆殷民族也。渤海沿岸雖皆殷民族，然由泰岱以征朝鮮，以自今之蓬萊經老鐵山嘴爲捷徑：遼西北而行，迂迴過甚，彼時似罕由也。

相士旣定朝鮮，殷人競事移殖，初屬外藩，寖同內服。後漢書東夷傳：『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姙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魏書高句麗傳：『河伯女有孕，生一卵，大如五斗。』與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呑之，因孕生契。』詩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同屬一事之演變，於此可見朝鮮土著與殷人同化，直認商之祖先爲祖先矣。又說文乙部：『乳，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从孚乙。乙者，乙鳥。月令：乙鳥至之日，祠於高禖以請子，故乳从乙。請至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昦司分之官也。』夫人與獸同屬胎生，（註一一）鳥則卵生；今觀乳產二字之釋義，人反與鳥近，而與獸爲遠，非起於殷人之神話乎？許君之言，信有所本；而月令之說，亦必爲殷之故俗。吾以是知乳之一字，造作於殷人；而中國文字之何自始，亦殊待商量矣。倉頡造字，說起戰國，最早見呂氏春秋君守篇韓非子五蠹篇，前此無聞也。（荀子亦有『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之語，韓當秉其師說。然荀仍戰國時人也。）案商契卽倉頡，爾雅釋鳥：『倉庚，商庚。』契頡同屬屑韻。又契與絜通，絜，刻也，發明刻字之人曰契，（註一二）猶發明稼穡之人曰稷，發明音樂之人曰夔也。（註一三）河圖玉版：『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玉版爲緯書，未可置信；然傅會之談，未始不另有依稀髣髴之事蹟。契封於上洛，（註一四）文字初起，刻於龜甲，故有此似是而非之說也。甲骨文亦稱貞卜文，後漢書謂倭『灼骨以卜，用決吉凶。』明明此俗由殷人傳至朝鮮，倭復由朝鮮習得也。周居西土，重筮法；商居東土，重龜卜；故洪範論及龜筮，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祖伊諫紂，亦有『假人卜龜，（註一五）無敢知吉』之語。箕子、殷人，此其習尙之表徵也。左傳僖四年，『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是亦舊俗歟？

箕子名胥餘，箕，國名，子，爵也。馬融王肅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史公以爲紂之親戚。余以馬王之說爲得其實，箕子爲太師，微子稱之爲父師。(註一六)微子，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殷亡，箕子之朝鮮，其因說頗不一：史記謂周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爲陳洪範，於是武王乃封之於朝鮮。(註一七)尙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注：『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也。』鮮書有謂：『周武王滅殷，箕子率五千人避之朝鮮而君之。』但未詳所出。余以大傳之言爲可信，箕子謂微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註一八)誓言旦旦，何忍遽受周封。朝鮮早入殷之版圖，殷人之在彼者已衆，乃遠遯海外，以示不屈，而保其清潔之躬。箕子素負人望者，武王因其成勢而封之。邊徼之地，既非所必爭，藉是消滅殷人反感，更所樂爲也。至箕子受命與否，則非彼所問。易林：『朝鮮之地，箕伯所保，』玩其辭意，似未嘗隸屬於姬氏也。夫以武庚續殷祀，不旋踵而誅戮隨之。以微子代之，國於宋，亦不過以夷制夷之策耳。殷尙質，其性仁，然徐偃以仁義而亡，宋襄以不禽二毛而敗，在周室領導之政治勢力下，造成社會上事事歧視宋人：揠苗助長，宋人也；(註一九)守株待兔，亦宋人也；(註二〇)宋人縱愚，何至爲此！箕子智燭幾先，飄然遠引，尺土能守，殷墟猶存，是豈不足爲致耶！敎以禮義，課以田蠶，施八條之約，(註二一)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謹厚成風，三方不及。故班范兩史，屢致贊歎者也。

綜之：朝鮮開拓於相土，成教於箕子，雖有土著，後盡同化，而成爲殷民族之一支，禮教習俗，與中土無殊焉。今朝鮮已迫爲倭藩數十年，而志士仁人之謀匡復者，不顧艱危，前仆後繼，其沾匄於先民之德澤者深矣！

(注一)後漢書東夷傳：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

注二　見詩商頌長發。

(注三)案世本：『黃帝之臣相土作駕馬』，當爲另一人。

(注四)濵水，即今之鴨綠江。

(注五)檀弓上：『而丘也，殷人也。』

(注六)論語公冶：『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注七)論語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注八)舊說以河濱在孟津，或以爲在滑州，均非。

(注九)後漢書注引作三年。

(注一〇)後漢書注引無賓夷，今本竹書紀淶夷。

(注一一)獸類中除屬單孔目者，此外無不胎生。屬單孔目者，僅鴨嘴獸等數種而已。

(注一二　商用刀筆，刻於甲骨及竹木上，竹木年久腐爛，甲骨質堅獨存耳。尙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典冊實竹木爲之。

(注一三)舞象人持尾而舞，古代歌舞相連。

(注一四　此非陝西商縣。山東縣城之上洛口鎭，乃古之上商也，史載上洛口鎭金[illegible]，其實金亦[illegible]也。

(注一五、卜來本作元，今依徐廣說改。

(注一六)見尙書微子。

(注一七)見宋世家。

(注一八)見尙書微子。

(注一九)見孟子公孫丑。

(注二〇)見韓非子五蠹。

(注二一)漢書地理志下：『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讎。』師古云：『八條不具見』。

趙匡胤的得國及其與張永德李重進的關係

鄧廣銘

曾孟德司馬仲達奪人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自來爲談史者所詬病。然而這兩個人在漢魏兩朝都曾東征西討，都已建樹了極高的功績和威望，而其篡竊之事却還都是經由數十年的處心積慮，到他們的子孫一代方得以實現了的。宋太祖趙匡胤於後周世宗的顯德六年六月方被陞擢爲歸德軍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功業威望，兩俱闕如，而次年正月便扮演了一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喜劇，從此便成了北宋一代的開國皇帝。其起家之低微與其野心的實現之速，在歷史上只有楊堅篡竊北周的事可以約略與之相比，而楊堅畢竟還有一個外戚的地位作爲憑藉，這地位可以給予楊堅以無限的方便，在趙匡胤，卻是並此而無之的。因而自來論列這件事的，不但在兩宋時候的人無不稱頌讚歎，即在今日，也還有不少人以爲近似一樁奇蹟的。然而這樁奇蹟之造成，也還只是由於人謀之豎巧，而絲毫無涉於所謂「天命攸歸」等等。唯其如此，對於這事件的醞釀經過，我們便應當作一番探索。

在幾年前，對於所謂「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故事，我曾爲文加以考釋過，意猶未盡，今再爲此篇，稍加補綴。

趙匡胤的父親名叫弘殷，在後唐莊宗時候投身於軍旅之中，碌碌無所表現。到郭威篡漢之後，趙匡胤也廁身於禁軍之列，並於世宗顯德元年以宿衛將而跟隨世宗出征北漢，在高平的一次戰役當中顯露了一些力氣，爲郭威的駙馬爺張永德所賞識，在世宗面前盛稱其智勇，遂被拔擢爲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這算是趙匡胤第一次嶄露頭角。此後他們父子兩人便一同在禁軍中作小的將官，也便是宋史太祖本紀中所說「父子分典禁軍，一時榮之」的事。實際這所謂「一時榮之」者，也還是一句飾詞，兩人的地位全不甚高，榮於何有呢？而此後不久，弘殷便去世了。

趙匡胤和張永德兩人，在高平之役以前是否已經有了交誼，無從得知，其見於記載的，以這次事件爲始。自此以後，便見兩人日益親密，並且共同樹立派系，排除異己。這於後來趙匡胤的得國是有極大關係的。

顯德三年，周世宗親征南唐的淮南之地，趙匡胤也身與其役，擒獲了南唐的將官皇甫暉姚鳳二人，第二次立了功績，而其與趙普之相識，也始於此時。從此趙匡胤乃又有了一個運籌帷幄的謀士，輔助他一步步提高其慾望，實現其野心。此事據王銍默記所載如下：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攻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是時江南李璟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數全師入憩滁州城下，令翌日再出。太祖兵聚於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曰：「……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誠能由山背小路率衆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潛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大亂，遂下滁州。……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

書。

此事在資治通鑑和宋史太祖本紀中也全有記載，所述較簡略，而節概則無不同，知默記所載為翔實可信。趙匡胤得力於趙普（即鎮州趙學究）的策略而建立了滁州的功勳，遂得被超擢為殿前都指揮使領定國軍節度使。王船山在宋論中所說「滁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者，即專對此事而發的。

滁州之役，使得張永德趙匡胤這一派系當中又增添了一個足智多謀的趙普，也就在這一役的前後，這一派系便開始有計劃地要排擠陷害另一個勢均力敵的統軍大將，即後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李重進。其事在資治通鑑和宋史當中也都有記載，大略也皆相同。茲但舉宋史李重進傳所載如下：

重進色黔，號黑大王。張永德屯下蔡（案即出兵征討淮南時），與重進不協。永德每宴將吏，多暴重進短，後乘醉謂重進有奸謀，將吏無不驚駭。永德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二將俱握重兵，人情益憂恐。重進遂自壽陽單騎而詣永德帳中，命飲酒親酌，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同奬王室，何疑我之深也？」永德意解，三軍皆安。

根據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知道，所謂二將不協這件事，乃是張永德羅構了「有奸謀」（通鑑作「有二心」）的罪狀，希圖陷害李重進的。李重進對於此事並不還擊，而直詣張永德的軍營中去申說大義，與之和解，這又可知李重進大概是一個比較能識大體的人。

就周世宗而言，張永德和李重進二人，同為外戚，同為統兵大將，其地位是無何不同的。但在滁州之役以後，周世宗用張永德做了殿前都點檢。這件事又足以證明，雖然周世宗並不疑惑李重進真有「奸謀」「二心」，而其對於李重進却總不及對於張永德的信任之篤，則是張永德也終還收取了「讒言」徵中的效果了。到這時，李重進怕也不能不發生一些戒心和疑慮，而所謂「點檢作天子」的讖語，大概就是因此而逼出來的。這件事，據宋史太祖本紀所載是：

（顯德）六年，世宗北征，……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異之。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不豫，還京師，拜太祖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以代永德。

這一塊三尺有餘的木版，對於後來却有着非凡重大的關係。我很疑心，這韋囊，這木版，以及木版上的五個字，乃是張永德的反對派李重進為要陷害張永德，乃學取了張永德的故智，勾結了周世宗的左右，特地製造出來的。我所以有些猜想，不祇是因為李重進和張永德素有嫌隙，須要拼個你死我活；也因為只有李重進的地位和資望才能和張永德相比擬，才有覬覦這個殿前都點檢的資格。因而我們這項推測，應該是既近情且符實的。這事情發展演變的結果，張永德果然就被罷免了，而周世宗却不敢再用一個羽翼豐厚、聲名遠越、如李重進那樣的人物以為代，乃特地超擢了一個名位未高易受制使的趙匡胤繼其位。而因為既有一個「點檢作天子」的木牌，使這個崛起的趙匡胤也居然發生了非分之念，不臣之心，而後來竟一切如願以償。這却是李重進等人所萬萬不曾料到的了。

因為趙匡胤和張永德早已沆瀣一氣，所以在趙匡胤做了殿前都點檢之後，張永德並不起嫌惡之心，不但維持着舊日的交誼，而且這交誼還在與日俱進。宋史張永德傳云：

從世宗北伐，還駐澶淵，解兵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即位，加兼侍中。永德入朝，授武勝節度。入覲，召對後苑，道故舊，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永德明天文術，……罄家資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書生嘗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潛意拱嚮。太祖將聘孝明皇后也，永德出緡錢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遇不替。

今查孝明皇后即宋太祖的王皇后，其聘娶在周世宗顯德五年。那時候最得意的軍人是張永德而非趙匡胤。永德之所以肯出緡錢數千助匡胤婚娶的事，只是由於兩人平昔的契分之厚，必非「潛意拱嚮」的表示。所謂「睢陽書生嘗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潛意拱嚮」者，

其事必尚在以後，至少當在趙匡胤已經做了殿前都點檢的時候。永德傳中所敍前後節次，必是有意加以顚倒的。張永德旣是一個迷信方士的人，在他的黨與當中有了一個有「受命之兆」的人，他當然要竭力擁戴，情願屈己以效奔走馳驅之勞了。

荒誕無稽的相術以及符命等等，直到今天還盛行於我們的社會的各階層中。它最能啓動一個人的慾望和野心。趙匡胤在纂周之前，旣遇到這個「睢陽書生」，而據釋文瑩的湘山野錄所載，更有一個遨遊於關河之間的道士，也推測趙匡胤將於某年某月某日膺圖受禪。我們現時不必深究這兩說的「個性眞實」的程度各若何，其在趙匡胤突然地超陞爲殿前都點檢之後，一般昏瞶糊塗的「大相士」和「預言家」們便跟在後面曲意奉承，遂使趙匡胤存心要賺取這個後周的天下，這卻一定是事實的。

張永德和趙學究，一武一文，二人都在盡力爲趙匡胤運籌帷幄，馳驅效力，中間更增加了所謂「義社十兄弟」如王審琦、石守信等等的幫同活動，而又巧逢「天不祚周」，在趙匡胤做了殿前都點檢後，不一月而世宗下世，集合這種種條件，趙匡胤做都點檢半年之後便一躍而登了「九五」尊位了。

因爲趙匡胤原是和張永德爲同一派系，所以後來能得到張永德的「潛意拱翻」之力卽很快地成就了帝業。到這時，才正證明了對於後周帝室「有奸謀」「有二心」的，並不是李重進，而卻是張永德和趙匡胤這一夥。在趙匡胤纂奪了後周的帝位之後，素來站在反對方面的李重進，對於自身所應取的態度，自然用不到多加考量，不論是爲要表示效忠於後周，抑或爲了料定趙匡胤必不能不念舊惡而曲予優容，他都不能不起而聲討這個竊國的人。宋史李重進傳載其事云：

太祖卽位，……移鎭靑州，加開府階。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鎭，陰懷異志。太祖知之，遣六宅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爲左右所惑，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人求援李景，景懼而不納，聞之太祖。……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四將率禁兵討重進。……太祖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當暫往慰撫之爾。」遂親征。次大儀鎭，石守信遣使馳奏：揚州城破在旦夕，願車駕臨視。太祖徑至城下，卽日拔之。……

初，重進謀舉兵，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還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以分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甚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書聞，並如太祖之策。其不信鐵券，亦如守珣所云。

鐵券是用以紀功勳褒德美的，趙匡胤要以此物賜李重進，自然是爲要表示籠絡之意，以稍安李氏之心的。賜以鐵券而猶不能安定其心，藉知李重進是絕無屈服順從趙匡胤的可能了。只可惜李重進之爲人，大概耿直有餘而謀劃不足，因而，最初當周世宗在位之時，旣無法制張永德於機先，及至趙匡胤篡竊之後，李氏興師致討，不能不爲「義舉」，而左右親吏先爲對方所賄買，致當李筠舉兵之時，坐失良機，終至爲趙匡胤「各個擊破」，而重進失敗之後，親屬黨與受禍之慘，當時絕少其比。重進傳云：

太祖入駐城（揚州）西南，閱逆黨數百人，盡戮之。重進兄深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贇，子尙食使延福，並戮於市。……

又有張崇詁者，周廣順初爲樞密承旨，……重進赴淮南時，道出泗上，崇詁說以畜兵完城之計。重進敗，事露，詔捕之，棄市，籍其家。

對於李重進的親屬黨與，株連蔓抄，幾乎是不使其「無噍類」不止了。然而趙匡胤卻是素以寬厚仁愛著稱的，不但在他的統一事業的

過程中，對於被征服的國家一切多從寬宥，卽對於後周舊臣之舉兵相抗的，於韓通被王彥昇殺害之後，曾特別下詔以示追悼，且令「以禮收葬」；於澤州李筠失敗自焚之後，依然擢用其子李守節及其部屬趙處愿、孫孚、史文通、馬廷禹等人；而獨獨對於李重進極盡殘酷之能事，這便足以說明，趙匡胤之與李重進，因爲早已處於敵對的地位，怨毒仇恨，非一朝夕，故趙匡胤一旦制勝，便下此毒手以發洩宿恨，根絕後患。而李重進的黨與之多，團結之固，勢力之可畏，均遠在趙匡胤的其他敵人之上，也均可從此看到了。

第二次歐洲大戰史略

石地

歐洲大戰是亞洲烽火延燒的結果。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與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都是日本侵略中國的表現。那時國聯不能維持國際間的正義。這鼓勵了歐洲侵略者的野心。而歐洲從此便沒有和平的日子了。

第一個倣效日本的是墨索里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北非義阿邊境發生衝突，這獨裁者的機會來了。次年十月三日義軍大批侵入阿比西尼亞。阿人英勇抵抗，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國亡爲止。這是國聯又一次的失敗。

這時冒險者希特勒正在暗中從事重整軍備。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德國撕破了凡爾賽和約的一頁。次年三月七日德軍突然進佔萊茵河區。凡爾賽和約等於一張廢紙。

西班牙內戰是希墨兩人一手製成的。一九三六年六月西叛軍首領佛朗哥在北非西屬摩洛哥發動內戰。英法倡導了一種不干涉政策。德義表面上雖也贊同，實際却派「志願軍」參加叛軍作戰。經兩年半的抗戰，西班牙共和政府終於被顚覆了。

希特勒覺得在西方有義大利作盟友還不夠，又在東方拉住了日本。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德日簽訂反共協定，不久墨索里尼又簽上字。於是侵略集團就這樣造成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事起，日本如虎狼似的橫行於中國廣大的領土上。希特勒知道各民主國家都沒有作戰的準備與決心，於是決意在歐洲幹一下。

希特勒在歐洲眞正的作亂，開始於一九三八年。那年三月，希特勒逼走奧總揆舒斯尼格，由奧國國社黨領袖殷瓜特繼任。奧國宣佈與德國合併。

於是希特勒想併吞捷克斯拉夫。他說捷克是德國的命脈。他對張伯倫達拉第威脅利誘，墨索里尼出面調停。他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張伯倫以爲歐洲的和平由此而奠定，卻不知上了希特勒的大當。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德軍佔領全部捷克，歐洲又一個國家被滅亡了。

這時英法才明白希特勒無限的貪婪，方興未艾的野心，於是匆匆備戰。從這時起，歐洲彌漫了戰雲。到德軍侵入波蘭，歐洲大戰便爆發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是歷史上空前慘酷的大戰開始的一天。在波蘭拒絕德國要求歸還但澤與波蘭走廊的最後通牒後，希特勒以九十個師團的兵力，九個機械化師團及六千五百架飛機，直擣波蘭。九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

德軍分三路侵入波蘭。波人奮勇抵抗，但無法阻止有空軍配合的高度機械化部隊。九月十日德軍北路與西南路逼近華沙，並切斷波森

區的波軍。九月二十七日華沙陷落。不到一月，波軍便這樣崩潰了。

在波蘭被侵前，英蘇談判不成功，蘇德忽然於八月二十三日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在九月十七日德波戰爭正劇烈時，蘇軍忽然開入波境。九月二十九日德蘇兩國劃定在波蘭的疆界。波蘭便這樣亡國了。

德波戰爭時，西線德軍很少。於是法軍越過馬其諾防線，侵入德境。此後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四月，西線德法軍僅有小接觸，無大戰爭。

英國是海上的女皇。她對德宣戰後，立刻施行封鎖德國，而德國報以反封鎖。大西洋之戰是最後決定英國的命運的。英法海軍的優勢使德國商船深藏在波羅的海或中立國港灣內，不敢露面。但是德國潛艇的活動，最初却使英法難於應付。到一九四〇年中，德國潛艇被消滅的很多。德國在海上另一可怕的武器是袖珍戰鬭艦。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德艦「斯比上將」號被迫自沉。

德國在海上雖處不利的地位，但在陸上却惟我獨尊。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與十月十日兩次提出和平要求。可是張伯倫不再受騙了。整個歐洲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災禍的到來。

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德軍突然越過丹麥國境，幾小時內佔領了該國。同時德軍又在挪威六處的海岸登陸。由於吉斯林的賣國，挪軍開頭就不能作有效的行動。後來英法軍在特龍罕南北與納維克附近登陸，也無濟於事。六月七日挪王哈康只得隨着軍隊流亡倫敦。

波蘭之戰，英國成立戰時內閣。挪威之役，首相張伯倫却因之垮台。五月十日邱吉爾繼任首相。他立刻擔負起英國救亡的責任來。

挪威之戰尚未了，德國的閃電戰又轉向荷比邊境。這是為的消滅德國的世仇，法國。

五月十日，德軍同時侵入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荷比兩國英勇抵抗，但是擋不住德國巨大的機械化部隊。英法聯軍赴援。德國在這次戰爭中，利用傘兵與軍隊渡河的橡皮船。荷軍抗戰四日，被迫「停戰」了。比軍在比王李奧保特領導之下，仍繼續戰爭，犧牲甚大。不數日德軍佔領布魯塞爾與安特衛普，並突破法比間的防線。於是德軍直趨英吉利海峽。亞拉斯、亞眠、阿倍維爾、布倫、加雷等地先後陷落。又比軍經不住德國兩千輛坦克的壓力，於五月二十八日不先通知盟方便全部投降。這時在比境作戰的英法軍陷入危境，只有敦刻爾克一條生路。這次悽慘的撤退，邱吉爾認為「奇蹟」。在八天當中，由海空軍的協助，三十五萬的英軍被拯救了，但所有的裝備都被丟棄在大陸的海灘上。

這時的英倫三島上，眞是空虛之至，祇有一個剛剛訓練完畢的裝甲師，與兩個加拿大師團。如果希特勒抓住這個機會，也許這次戰爭結束得不會這樣早。英國把撤退下來的軍隊，匆匆地武裝起來。

德軍分數路侵入法境，一路由海岸南進，一路東進附馬其諾防線之背，中央一路直指巴黎。墨索里尼乘機趁火打劫，便於六月十日對英法宣戰。六月十四日德軍進入巴黎。法國政府先遷都爾，再遷波爾多。貝當向希特勒求和。六月二十二日德法停戰協定簽字。兩日後法義停戰協定亦簽字，法國的獨立與光榮完了。

法國的復國責任隨即落在戴高樂將軍的肩上。他在倫敦主持自由法國（後來改稱戰鬭法國），繼續抗戰。

法國崩潰後，英國在歐洲完全孤立。為使法國的海軍不附敵，英國便立刻把停泊在英國本部與殖民地口岸的法艦解除武裝或扣留，甚至擊沉之。

法國崩潰得這樣迅速，各民主國家為之震驚。羅斯福總統明白，如果英國失敗了，美國便要受到直接的威脅，民主主義便會被消滅。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向美國工業領袖呼籲急速增產，以「美國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他盡量以軍火與糧食接濟英國。他最初施行的中立法案，現在已取消了。

德國在法荷比境建立許多的空軍根據地。自一九四〇年七月起，德空軍大規模襲擊英國倫敦，其他工業城市，港埠及船隻。大戰八十四天，德國空軍被擊敗了。從六月稍起，德國就在挪威到法國的不列

顛尼半島一帶港口，佈置了無數的軍隊，準備侵英，因空戰不利，遲遲不敢發動。到蘇德戰起，侵英的計劃便成泡影。

地中海的烽火又燃起了。侵英不成，德義想佔領蘇彝士運河區，切斷英國作戰主要供應的遠東航線，而致其死命。義大利艦隊威脅着英國的船隻。一九四〇年九月間，北非義軍又侵入埃及。十二月九日起，英軍開始反攻，大敗義軍。東非英軍亦克復全部阿比西尼亞。阿皇在五年流亡生活後，又回到他的寶座了。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義軍侵入希臘。希軍堅決抗戰。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一年四月，義軍着着失敗。英國根據同盟的義務，立刻以人力及物力援希。英國海軍飛機偷襲義大利大蘭多港，擊毀義大利六艘主力艦中的三艘。墨索里尼只直求援於希特勒了。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希特勒迫使羅馬尼亞加入軸心。次年三月一日不費一彈，德軍佔領了保加利亞。三月二十四日南斯拉夫亦被逼與德國簽定一紙條約，可是三天後便被南軍撕破了。希特勒惱羞成怒，於是在四月十六日大舉侵入南希兩國。五天迫南軍停止有組織的抵抗，而遊擊戰却從此活躍起來。

早在三月初，英國自北非調來六萬軍隊援希。英希軍隊怎能抵擋強大的敵軍？四月二十三日希臘投降。英軍分向克里特島與亞歷山大港急撤。隨後德國傘兵降落克島。英軍只好又撤退。

北非英軍一部援希。三月二十四日北非德軍乘虛進攻，不到一日攻入埃境。開羅與亞力山大港爲之震動。

這時——三月十一日——從美國伸過來一隻巨大的援手。這就是邱吉爾讚揚爲「新大憲章」的軍火租借法案。

自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英艦隊追擊橫行於大西洋上的德戰鬪艦「俾士麥」號與巡洋艦「友金親王」號。英損失戰鬪巡洋艦「胡特」號。「俾士麥」號終被擊沈於法國海岸外。

蘇聯在這次大戰中是極重要的。蘇聯的強盛，希特勒便不能高枕無憂。在侵蘇前，赫斯於五月十日單獨飛落英倫，想以消滅布爾塞維克的聖戰來哄騙英人，可是英人已決心戰鬪到底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自芬蘭到黑海一千八百哩，德國集中了一百六十個步兵師，二十多個裝甲師，全國五分之四以上的空軍，及附庸各國三十多個師，突然侵入蘇境。德軍分四路進攻，一自波羅的海各國向列寧格勒，二自中部波蘭向明斯克而直指莫斯科，三自南部波蘭向羅夫與基輔，四自比薩拉比亞向奧特薩。蘇聯措手不及，動員完成於八月十五日前，已損失了四千架飛機，五千輛坦克及六十萬軍隊。戰爭之猛烈與殘酷，史無前例。

德軍勢如破竹，蘇軍且戰且退。蘇軍分三路抵抗，北路列寧格勒到九月底已被保圍。中路蘇軍放棄明斯克後，自七月中到八月初堅守斯摩棱斯克，最後亦只好撤出。紅軍動員完成開始反攻，血戰二十六日，雖不能收復斯城，但使德軍第一次受到了慘敗。南路德軍於七月中向基輔推進。蘇軍苦戰四十五日才於九月十九日放棄該城。德軍這時的目標是莫斯科，而冬季的嚴寒來懲罰他們了。

德蘇戰爭開始時，英美立刻聲稱援蘇。英國皇家空軍自七月份起，出動轟炸德國全部船塢及潛艇根據地。美國也對德國及其附庸採取有效的行動。七月十二日英蘇互助條約簽字。八月二十五日英蘇軍隊開入伊朗，打開了援蘇的近便的道路。

十月二日希特勒下令德軍進攻莫斯科，誇稱「今日爲本年最後決戰的第一天」。不到兩星期德軍佔領奧勒爾，布里揚斯克及維亞茲瑪等重要鐵路交叉點。莫斯科危急，宣告戒嚴。史達林稱「決以全力保衛莫斯科」。蘇政府於十月二十日遷都古比雪夫。俄國可怕的冬季降臨了。德軍凍僵，坦克與摩托車也停止了動作，而勇敢的紅軍這時反撲過來。十二月八日柏林宣佈放棄進攻莫斯科的企圖。

在進攻莫斯科時，南路德軍於十月二十四日佔領工業中心哈爾科夫。克里米亞半島與內高加索油區也被侵入。十一月二十二日德軍侵佔高加索門戶羅斯托夫，不數日又被蘇軍克復。這樣高加索暫保安全了。

北非英軍響應蘇軍，於十一月十八日開始總攻利比亞德軍，戰事進行順利，克復西倫尼加區。隆美爾這時據守陣地，等待援軍到來反攻。

日本看到它的盟友在歐洲的勝利，於是也在太平洋上掀起了風波。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美珍珠港海陸空軍根據地。這把美國拖入了戰渦。

這次歐戰前，歐美各國對於侵略者不敢採取積極的手段，因而助長其氣燄。自蘇德戰起，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制止國際強盜便成爲必要。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羅斯福邱吉爾會談於紐芬蘭海外，發表富有政治建設性的包括八項原則的大西洋憲章。自太平洋戰起，盟國各領袖人物認爲不但在戰時，就是在戰後和平也需要國際上的合作。於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二十六國在華盛頓簽訂聯合國宣言，表示贊同大西洋憲章。到一九四五年的今天，加入聯合國的已有五十國左右。

一九四二年是聯合國開始轉敗爲勝的一年。希特勒的如意算盤，原想六個月結束德蘇戰爭，再轉而攻英，於是建立「歐洲新秩序」。可是他太自信了。

這時美國加緊生產，用武裝的船隻把作戰物資直接輸送到英、蘇、埃及伊朗等港口。德國却加緊潛艇的活動，一月裏竟出現於美國的東海岸。英美海軍便分頭搜捕德艇，到年底德艇的標掠大殺了。

這時美軍踏上了歐洲的戰場。一月裏美陸軍首批開入北愛爾蘭，六月裏美空軍也到了英國。

德國空軍東調後，英國在西線便獲得制空權。自五月份起，英空軍開始大規模轟炸攻勢。五月三十日英機千架首次夜襲德境工業城市。七月四日美機也開始參加轟炸德國。

這次歐戰的勝利，蘇聯的力量不可輕視。而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三年一月的史達林格勒之戰是勝利的關鍵。由於此役，德軍一敗不可收拾，最後只有投降一條路。

一九四二年三月蘇聯停止冬季攻勢，以後數月，東線便無大規模的戰爭，而德軍却在準備夏季大舉反攻。

六月二十八日德軍開始在庫爾斯克發動攻勢。他們想攻到伏爾加河，而切斷中路與南路蘇軍的連絡，威脅莫斯科區與頓河區的蘇軍。但是蘇軍堅守佛羅內茲，德軍只得沿頓河東岸南下。七月二十四日羅斯托夫失守，高加索危急。八月二十二日德軍已強渡頓河，抵斯達林格勒外圍。

德軍三十到四十個師團，輔以大量坦克與飛機，於八月二十三日開始進攻斯達林格勒。九月裏他們攻抵斯城南北兩端的伏爾加河，接着進攻城區本身。蘇軍逐屋逐戶抵抗，往返衝殺，雙方傷亡慘重。這樣到十一月十九日，蘇援軍趕到，大舉反攻，自兩翼鉗形而進，十一月二十三日終於包圍全部德軍。這正是蘇聯又一次殘酷的冬季。希特勒急調大軍赴援，潰敗而去。於是蘇軍開始消滅入圍的德軍，到次年二月二日，斯城殘軍投降，被俘三十萬人。

蘇聯這次冬季反攻，除斯達林格勒光輝的勝利外，還逐退高加索德軍，收復羅斯托夫後，復於一九四三年三月攻至哈爾科夫。

在這期間，北非德軍也遭到了嚴重的打擊。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東線夏季攻勢的前一個月，德軍在利比亞發動反攻，一直攻到離亞力山大港七十哩處，埃及全境震動。但是好景不長。十月二十三日英軍反攻，將德軍一直逐至法屬突尼西亞邊境。十一月八日美軍第一次在敵後北非西海岸登陸。此後氣候惡劣，不便作戰。到次年三月二十九日，英軍西進突破德軍防線，於四月七日與東進的美軍會師。此後英美法聯軍並肩北進，五月十二日德軍投降，被俘十五萬人。

史達林格勒與北非兩次大捷，打破了希特勒會師中東，再由此入侵印度，與東方強盜，日本會師的迷夢。

在這兩次勝利的進行曲中，羅邱兩領袖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到二十四日，會商於北非西岸的卡薩布蘭加，決定了對德義日進攻的辦

法，儘可能攪中蘇兩國，侵略者必須無條件投降。

北非隔地中海遙望着西西里島與義大利半島。這是攻擊「歐洲堡壘」的時候到了。在七月十日晨，英美與加拿大軍在空前兩棲的活動中登陸西西里島。盟軍先建立灘頭陣地，然後向前推進。到八月十七日美軍進入墨西拿，西島抵抗停止。法西斯主義也跟着敲喪鐘了。

在登陸後不數日，羅邱警告義人投降。法西斯黨領袖墨索里尼被憤怒的人民於七月二十五日拘囚起來，但不久又被德國特務人員救出，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最後被米蘭義大利愛國志士槍決並陳屍示衆。侵略者的末路是如此！

義大利新政府成立。德軍自布里納山隘源源開入，佔領義北並逼近羅馬。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義無條件投降。同日英軍越海峽進攻義本土靴尖。九月九日盟軍登陸那不勒斯。這時德軍佔領了羅馬。德軍抵抗雖猛烈，但義大利南部已成爲美機大規模轟炸德國心臟的基地了。

在盟軍進攻西西里島前數日，德國在東線又發動了一次夏季攻勢，但不到二十天便夭折了。蘇聯在它的攻勢後一星期便開始反攻，八月四日收復奧勒爾，次日又攻下比爾哥羅德，八月二十三日又克復哈爾科夫。紅軍繼續挺進，斯摩稜斯克在九月二十五日，基輔在十一月六日，都已無敵蹤。德軍狼狽而退。

這時國際外交又緊忙了起來。十月十九日美英蘇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其結果促成了德黑蘭會議。緊接着開羅會議後，羅邱史三領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德黑蘭商定對德作戰的問題。喧嚷已久的第二戰場就要開闢了。

開闢第二戰場的消息使人興奮。中路蘇軍沿基輔西線長二百哩的戰線進攻，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四日越過一九三九年波蘭國境。北路蘇軍於一月二十七日解圍蘇聯第二大城列寧格勒，那裏孤軍奮鬪了二十七個月。於是北路蘇軍轉兵南下與中路蘇軍在敵後會合，包圍德軍十師。南路蘇軍也向比薩拉比亞猛衝，於四月二日攻入了羅馬尼亞。中路蘇軍於四月八日抵達舊日捷克邊境。北路蘇軍這時靜候蘇芬和平談判結果，戰事比較沈寂。

在義境，也傳來了勝利的消息。美、英、法、波、比、義聯軍，於六月四日，正是第二戰場開闢的前二日，解放了羅馬。軸心國的一個首都被佔領了。

英美空中攻勢，侵略者也受不了。自一九四二年初起，英皇家空軍開始有計劃地大規模轟炸德國。不久美第八航空隊也參加作戰，且以晝襲爲主。這一年英機投彈三萬七千噸。到一九四三年，美機又自義大利根據地出擊德國及其附庸國。這時德國百分之五十的白日戰鬪機與百分之八十五的夜間戰鬪機，都調到西線來對付盟機。這一年英機投彈十三萬四千六百噸。到一九四四年第二戰場開闢前數日，英美機更是活躍。四月份美機投彈了七萬一千噸。五月份盟機出動了六萬五千次（每次一架計），一天內竟有出動七八千架，投彈至八千噸的。六月二日美機四千五百架又首次自英至蘇，作穿梭轟炸。德國及其附庸國一切的工業中心，交通中心及海岸防務，都被炸得糜爛不堪。德國的人民與士兵作戰意志因而渙散，飢餓與死亡逼迫他們走進絕境裏去。

這時德國的海軍也快完蛋了。一九四三年三月盟方研究出一種對付潛艇的新戰術，德國潛艇因此葬身於大西洋的很多。德國主力艦「竇匹茲」號被炸傷於挪威海灣，另一主力艦「柴霍斯特」號又被擊沈於挪威北部海外。而盟國造船業空前發達，開戰以來海上船隻的損失，這時已全部補足了。

德國在四面楚歌中。第二戰場的呼聲愈來愈高。一九四四年四五月間，英吉利海峽的天氣已經轉佳，沿海的德國守軍開始不安起來。

六月六日晨，盟軍在船艦四千艘，飛機一萬一千架的支助下，在法國諾曼第海岸登陸。盟軍由灘頭陣地逐漸推進。德軍決堤，以海水來淹沒五十萬英畝的土地。可是美軍涉水而戰，佔領瑟堡。英軍亦攻陷克恩。於是盟軍向平原東進。八月十五日盟軍又在法國南部海岸登

陸。這時法內地軍聞風響應，紛紛光復各城，於八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巴黎。盟軍於九月二日進入比利時，九月十日又進入盧森堡，終於次日攻入德國本土。

在這期間，希特勒曾以久已大肆宣傳的法寶，飛彈襲英。這的確使盟方人士為之一驚，可是除了毀壞英國許多的房屋與殺害許多的英人外，對於整個的戰局並無大的影響。

同時蘇聯也開始進攻德國。

蘇芬和平談判不成，北路紅軍於六月十日再度進攻芬蘭，穿過卡累利阿地峽。九月十九日芬接受停戰條件。蘇軍隨即佔領愛沙尼與拉脫維亞。中路紅軍於六月間發動攻勢，向波蘭長驅而入，到八月逼近華沙，十月二十三日又進入東普魯士。南路紅軍於八月二十五日進抵多瑙河，八月三十一日佔領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九月十二日羅國簽定停戰協定。四日後蘇軍開入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於是蘇軍還奔匈牙利與南斯拉夫，十月二十日解放南京伯爾格萊德，十二月二十五日又攻入匈京布達佩斯。次年一月二十一日，匈國亦簽訂停戰條件。東南歐德國的各附庸國不存在了。

在歐戰勝利中，不幸國際上來了一些暗影。這就是波蘭，南斯拉夫及希臘諸問題，在政治上與權益上，使英美與蘇聯間稍有磨擦，但決沒有影響到盟國間的合作。這種暗影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的克里米亞會議，才算烟消雲散。

一九四五年春，歐戰在迅速地結束。上年十二月德軍曾在西線一度反攻，雖威脅了盟軍，但不過是強弩之末吧了。二月九日西線盟軍七路開始總攻，突破齊格菲防線，渡洛爾河，三月六日佔領科隆，次日渡萊茵河，一星期後又渡摩塞爾河，由此到柏林是一片大平原。四月十一日美軍到距柏林西面五十哩的馬德堡。四月二十六日美蘇會師於易北河上。德國被切成了兩段。德軍已呈分崩瓦解之勢。

這時義境盟軍於四月十日也開始總攻，四月二十三日渡波河。義北很快被解放了。

在東線，一月十四日蘇軍發動冬季攻勢，三日後佔領華沙，於是由維斯杜拉河一直猛攻到奧得河。這時波蘭，東普魯士及上西里西亞，差不多都被佔領了。希特勒着慌，立刻自西線抽調四十四個師到東線去，但仍不能阻止紅軍的前進。三月十一日蘇軍攻佔距柏林三十哩的庫斯特林。這時南路蘇軍在佔領匈京布達佩斯後，於四月十三日復攻克奧京維也納。於是蘇軍猛攻柏林，四月二十二日攻入市郊，三日後攻入市中心。五月三日史達林宣佈佔領柏林。德國的心臟這才停止了活動。

世界第一號戰犯，希特勒，這期間在柏林指導作戰。盟國正要逮捕他並嚴厲懲罰他。他自知命運難逃，只有自殺一條路。五月一日傳來墨索里尼的慘死時，德國也宣佈了希特勒的死訊，由杜尼茲繼任元首。於是在五月七日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次日，即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英、美、蘇三國領袖正式宣佈為停戰日。歐洲大戰至此終於結束了。（杜尼茲在法林斯堡所組織的政府，於五月二十四日消滅）。

正當盟軍向柏林進軍時，在這次戰爭中第一有功的美總統羅斯福，突然在四月十二日逝世了。全世界愛好民主，愛好和平的人士，都感到切身的悲痛。他的偉大比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總統威爾遜，過無不及。他的偉大不但在促使侵略國家的崩潰，尤在努力戰後和平建設問題。他所領導的世界和平機構會議，已立有基礎，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才在舊金山正式開幕，參加者有四十六國代表，接着又參加了三國。他的精神是不死的。

波羅奈城與鹿野苑

李樹青

——天竺遊踪瑣記之四——

法顯所稱的波羅奈城，玄奘時稱爲婆羅痆斯國，現在則稱爲柏納瑞斯（Benares），爲恆河中游的大城市之一。法顯對此城未加描寫，玄奘的記載較詳。他說：『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相蔭，淸流交帶。鍮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懍如在。』從這兩段記載裏，可見波羅奈城佛教一向不盛，玄奘所謂天祠，大概卽印度婆羅門教所崇奉的濕婆天，亦稱大自在天或世主（Shiva or Vishvanartha）。直到目前爲止，柏納瑞斯這些印度廟宇，還是印度人認爲最神聖的地方，而流經城外這段恆河也是印度人所最崇拜的聖水。由此可見釋迦佛的獨選這個城市作爲初轉生輪的聖地，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七月十三日午夜，我所搭乘的火車進了柏納瑞斯車站。下車後，爲着遊歷上的便利計，僱車到城市中心的一家印度旅館住下。這裏面一切設備殆全係印度式。門窗桌椅，不要提了。屋角上有一個像鼠洞樣的窩匯，這便是洗臉沖涼盥漱的地方。茶房壓根兒卽不懂英文，一切呼喚皆還手式。對的時候固然未嘗沒有，而錯的時候常多。旅行至此，總覺得眞正到了印度。

翌晨起來以後，本想吃點東西，再行出去遊歷。但出屋外參考了一番，看見旅館所伺候的飯食，一個方盤，中間放着米飯，四周圍擺着幾種炒菜，旣無刀叉，亦無匙箸。印度的朋友們都在很悠閒地用五指選擇着菜肴，慢慢送進嘴去。我檢閱一番自己的手指，又細看一遍他們吃的菜飯，終是覺着下不得手去。回屋裏洗了一次手，又挖㧡了一陣指甲內的泥垢，三番幾次的下了決心，想要嘗試一下，可是等到一經走出屋外，看見那小方盤內放着那些炒的與燴的菜蔬，原來那股勁又全洩了。於是只好餓着肚子，出街僱車到仙人鹿野苑去。

鹿野苑現名薩爾納珠（Sarnath），本係印度教的一個神名。距城約六七華里，爲釋迦初轉法輪的地方，亦係佛教的四大聖地中的一個（其它三大聖地爲佛出生的藍毘尼園及佛入涅槃的拘尸那揭羅城）。我所僱的還是那種脚踏東洋車，自城內穿出了鐵道，約有多半個鐘頭便到達了鹿野苑的原址。

在尙未抵鹿野苑時，很遠便望見一座黃色的中國式的建築，因朋友們預先提過，想來必然是建築在這裏的中國廟宇。車到門前，果然看見了華文『中華禪寺』等字樣。院裏的建築頗爲簡單。前面有兩間門房。正中便是正殿，裏面供的只有一座緬甸式的玉石佛像。此外旣無其他陳設，四壁亦且尙無壁畫。後面是一排僧房，約六七間。主持老和尙德玉見面以後，迎我到後面客廳裏休息。德玉法師爲北平法源寺方丈，歷遊南洋，戰前來到印度。這座中華禪寺，便是他秉承他的戒師純一的遺志，一手捐募建築起來的。這位法師雖然對於佛法亦無若何較深的理解，但一眼望去便知道是一位戒行純潔的和尙。他很高興地說：『最近捐募到一萬三千盧比，購買廟後很大的一片空地。這是一件並非容易的事。』老和尙一再重複這句話：『發願也不只一次了，臂上也已燒了不少願香的疤痕，我的目的就是修造一座中國式的寶塔。現在有了地方，這座塔是會建造起來的。』原來這裏原有一個很大的窣堵波，過來便是錫蘭人建造的塔，再過來便是中國的佛寺。

德玉老法師覺着這是佛的意旨，讓他在中華禪寺的後面，再建築起第三個中國式的七級玲瓏寶塔。

在寺裏吃過午餐以後，德玉老法師陪着我出來巡禮古蹟。因爲隸近的關係，最先當然到錫蘭的伽藍裏去。這座塔式的廟宇，修得頗爲壯麗。廟內的佛像雕工尚佳，可惜太小，不能與室內的空間相稱。四壁繪着釋迦佛一生的事蹟，係日本畫家所作，在此相當有名。

錫蘭伽藍的旁面，巍然聳立着那座龐大的窣堵波，高約六七十丈，直徑亦有十丈。塔頂業經傾圮，下面塔座部份也已斑剝脫落，唯殘留石刻及花紋，仍尚隱約可辨。這座大塔，既不見法顯著錄，亦未見玄奘述說，顯然是七世紀以後的建築物。繞塔再向前去，左面是一個耆那教的廟宇，正面是印度教的伽藍，左後一帶地方便全是昔日佛教的遺址。靠中華禪寺的後面有一池，即玄奘所謂『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這是昔日釋迦曾經盥浴滌器與浣衣的處所，現在池水早已乾涸，無復能辨認是三池抑係一池，而當時潛藏在水底常興風雨的龍，恐怕是早已遷到別處去了。

塔後及右面約十餘畝的地面，均係發掘出來的當年七個伽藍的遺址。從目前荒榛斷梗與頹垣碎瓦之中，其殘留的規模的廣大，基址的寬敞，猶可想像當年所謂『臺觀連雲長廊四合』（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的盛況。在這片遺蹟裏，其最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幾處：第一，在基址的中部有一隆起的部份，這裏牆基厚十英尺，地勢崇高，四圍磚基相聯，密如蜂房。據推測：這地方即釋伽佛在此初轉法輪處。當年的主要佛龕，當亦在此。其次，在此佛龕前面有四石柱，石質細緻，光華潤澤。其中三柱已經崩損，只一柱完好。四柱當中有一石座，上有鐫刻，囑佛教徒不得互分派系。因佛涅槃後不久即有上座部與大衆部之爭。故此種石刻相傳爲無憂王所建。唯據玄奘記載，在此區域內有二無憂王石柱，其一在城東北婆羅痆河西，據謂『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另一個當在此地，『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見大唐西域記卷七）現存四石柱，共立一處，兩兩對稱。至高不過一丈二尺。假如玄奘的記載不錯，則此殘存的石柱是否係無憂王時代的遺物，頗值懷疑。不過，在大唐西域記內所記載的石柱，均謂係在無憂王所建石窣堵波的前面。而此地的窣堵波，當玄奘時，據謂：『基雖傾陷，尚餘百尺……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現在所殘存的石柱，或許即原來石窣堵波的遺址，亦頗有可能。再次，在此四石柱的左面有一殘留的精舍遺蹟，在靠下處有一整石所鑿成的『塔基』（？），現已毀損。其上面特建一屋頂，藉資保護。基址寬約丈餘，高及六尺，畢竟昔時係作或種建築的基址，現在亦無從懸揣。大唐西域記有一段謂：『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爲基。陛甎作層龕，龕帀四周節級百數，皆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或者這個地方即是從前的精舍遺址。而這種石基即係沒羅果石。當然，這些伽藍，據謂係毀於第十二世紀土耳其人入侵的時代，而玄奘的留學五印則係在七世紀前半的後期。相距已達五百年。在此綿長的時期中，此處佛教的興衰與廟宇的毀建，自然經歷過不少滄桑的世變。吾人不能根據玄奘的記載來推斷目前的一切遺跡。不過，在印度，因爲史料缺乏，玄奘的記載即英國考古學會亦據以爲最可靠的資料而加以徵引。吾人旅行至此，一困於行篋無書，再限於時間短促，亦只能略抒所見，以供後來者的參考而已。

仙人鹿野苑的成爲佛教聖域，係因釋迦在此首次說法，而釋迦之所以在伽耶成正覺後獨走了七百餘華里的路途，到此地來初轉法輪，完全係因爲阿若憍陳如等五人的關係。五人爲釋迦的家族及舅氏，陪同苦修。迨釋迦苦行六年毫無所得，接受了牧女的乳糜時，這五個人遂以爲釋迦已悔初志，便棄之而逃。共來鹿野苑。後來釋迦在尼連禪河畔的菩提樹下，在一個明星燦爛的早晨，突然徹悟了無上正等正覺，心裏想到這五個人應最先加以誘導，便自菩提樹到鹿野苑來。現在在鹿野苑路旁田中還留下一個已經傾圮的窣堵波，這即是五人初見如來並拜迎問訊處。那時初成正覺的釋迦，據謂：『威儀寂靜，神光

晃曜，並含玉彩，身冥金色。』五人見如來後，又那得不起立爲禮呢！

釋迦在菩提樹下所悟得的正道，主要的是他的十二因緣觀。因而在鹿野苑所發揮的也特別側重道方面。所以佛在鹿野苑所說佛法殆全係後來阿含經典，即小乘經典，因而在鹿野苑的佛法始終以小乘爲正宗。這和那爛陀寺的專門發揮大乘佛教者，適不相同。

在鹿野苑的佛教建築被焚燬以後，（關於此地伽藍的破壞，因史料缺乏，有的人謂係突厥入侵時所焚，有的人則歸之於蒙古帝國的奧關吉布大帝 Aurangzeb 的毀偶像運動。無論如何，現經發掘出的什物證明，此伽藍係經敵對的人縱火焚燬，因在此廢墟與焦土之中發現了許多僧人的隨身什物以及製熟了的食品，均被焚毀，未及攜出。）不知在焦牆頹壁與荒烟蔓草的狀況下埋藏了若干年代。後來經英國考古學會的注意與發掘，獲得了無數的佛像與遺物。現均收藏在伽藍遺址前面的博物館中。德玉法師引導我參觀完了遺跡以後，也共同到這個佛教的博物館去。裏面所藏的僧用什物及佛像特多，佛像則自七世紀以迄十二世紀的塑型均可尋得，各種形相，各派雕工，殆爲研究佛教藝術者的寶貴資料。當門之處放置一無憂王所建的石柱，柱頭有四獅子，面向四方，身連一處，精神栩栩，雖在兩千年後猶見其姿態之佳與雕鑿之細，洵爲珍品。石質極細，呈青灰色，光澤如玉，近可鑑人。惜其下部已毀，無法測知其高度。意者或即無憂建在佛初轉法輪處的石柱，在伽藍被焚後埋藏土中，後被考古學會發掘出土，移來博物院內保存也。

遊覽未終，天色將晚，遂不得不返回車站，就食西餐，然後再回到城內的印度旅館。

翌日午後再僱一馬車，遊覽波羅奈城內各種所謂外道的廟宇及建築。今略敘遊踪所及的處所如下：馬車自車站出發，最先到一博物館，此館係甘地奠基，頗爲有名。內部最著名的建築，係一幅印度的地形圖，全部用白色大理石雕鑿而成。山川平原，悉按照自然形狀，加以比例的縮減。參觀的人可以一目了然於印度的山川形勢，而對於本邦人士自然可以誘導其愛國的思想。其次便前往所謂『猴廟』。廟內的牆頭樹梢共有約二百餘猿猴寄生其中。進廟以後，觸目皆猴，因此遊人都呼此廟爲『猴廟』。廟內所祠爲大自在天的妻子婆婆帝(Parvati)，爲掌管災荒及豐收之神。印度天祠大多不准非印度教徒進入神殿，無法知其所供的女神作何形狀。只遠遠望到殿內的塑像好像是一個青面的神披着一件綠袍。馬車再向前進到達了恆河河岸。在城的靠河一帶爲印度教的全印最神聖的地方。下車以後，由一個嚮導指引，前往金頂的天祠，亦即所謂『金廟』。廟內祀濕婆天，爲印度教中的創造之神保護之神同時亦係毀滅之神。印人的崇拜濕婆，因其具有毀滅的力量，早已超過了大梵天之上。這座金頂天祠在歷史上便是最神聖的廟宇。原來的天祠爲奧蘭吉布大帝所毀，並利用其建築材料造一回教教堂（現在『金廟』的後面），這是印度教徒所最痛心的事情。目前這座金頂天祠係後來建造。因無法進入內部，只從門外窺見裏面金銀的裝飾與輝煌的建築，以及印度人的不斷進入焚香頂禮，顯然是一座重要的廟宇。金祠的牆旁有一磚孔，專爲遊人向內窺視而設。我也在這裏向內探望了一下。磚孔甚小，所見景象有限，但見一大理石鑲嵌的井沿，井前放置無數的花圈。再前的地面係用一塊一塊銀質的金屬鑲成。井後大概爲神像所在地，不能從洞中望到，只見好多印度人的光赤的雙足，向着跪拜及行來行去。這一次鑽穴隙相窺的代價係一個盧比，印度教雖把不信奉的人關在門外，却不忘記一切可資勒索的機會。在我登上金祠前面對街的寺宇去瞭望一下金頂時，印僧一再地想把他們的花環套在我的頸上，同時並需索金錢。祀神的廟宇而不能公開給一切人士，已是徵其教義的偏狹；而僧人竟利用神名作爲向人歛錢的工具，則其宗教的墮落程度也就不難想像了。

從牆外轉到金頂天祠的後面，在回教教室之前，有一小片空地。當中有一條神牛像，跪臥其間。據說係尼泊爾國王所贈。從此轉出河岸，名爲浴場(Ghat)，實係葬地。岸旁建一高臺，上面燃燒着熊熊的

烈火，一股燒焦的人肉味道撲鼻難聞。這是婆羅門種姓的焚屍場所。臺下亦積有木柴及屍身，係其他品級所用的葬地。燒完以後，連同骨灰及柴炭一律掃進恆河的聖水，這樣，印人相信死者的靈魂便可以得到平安與幸福。在我佇立河旁的片刻間，還看見一條小船載着一個屍身，划往中流，推下水去。嚮導說，這是一個少年，死於天花，不能享受到焚屍的盛典。

在河畔的建築，到處可見天祠，而這位大自在天的象徵，便是放置在一起的兩性生殖器。至於爲什麼用此爲神的象徵，我問過許多印度教人士及印度學生，他們都不能確說其中的道理。也許這卽是所謂穎造的意義吧！

從這裏穿街越巷，又走到尼帕爾廟。這個廟宇亦建築在恆河河岸。廟宇係方形建築，全用木質雕成。當門有二神像，其左面一像據謂係生殖之神，奇形怪狀，無從想象。廟的最奇特部份係在簷下的雕刻。每面四柱，上端雕有神像，下端在十六柱中足有七八幅是刻的紅樓夢上所說的「怪精打架」！不過神廟裏有這種崇拜對象，並不限於印度教，喇嘛教也是有的，我們又何必少見多怪。

在沿恆河的區域中，寺廟林立，遺跡繁多，所見所聞，不能悉記。總之，波羅奈城自古卽爲印度教的神聖中心，佛教雖曾經一度興盛，終歸消滅。可見印度教勢力的雄厚。現在在薩爾納茲的幾個佛教廟宇，有如滄海中的孤島。德玉老法師發願把大乘佛法迎歸印土。不唯這裏一向卽不注重大乘佛教，卽或有之，恐亦無法復興。宗教是一個社會制度，而一切制度均不外在幫助人類調適環境與安排生活。這一點，我們從社會學的研究裏，已充分證明，無須懷疑。佛教的思想與哲學，無論如何，係一根據印度文化背景的靜態社會產物，其能夠流傳中國也正因爲中國一向是農業社會。中國需要現代化，印度也需要現代化。假如這兩個國家都完全現代化了，則所謂大乘佛法不唯不能被返還印度，恐怕連中國的也將完全消滅。然則這兩個印度教的名城與佛教的聖地，終久不免要逐漸失掉其社會的意義而變成遊人的憑弔古與考古學者的發掘與研究場所而已。

枚乘詩辨

——漢詩新辨之二——

張長弓

一　枚乘詩的發現與見疑

枚乘雜詩九首：(1)西北有高樓，(2)東城高且長，(3)行行重行行，(4)相去日已遠，(5)涉江採芙蓉，(6)青青河畔草，(7)蘭若生春陽，(8)迢迢牽牛星，(9)明月何皎皎，皆見玉台新詠卷一。除蘭若生春陽一首，其餘八首在昭明文選卷二九古詩十九首內，作無名氏，自是以後，枚乘有無詩篇便成一個辯論題目，徐陵以前，稱爲枚乘詩的，有劉勰「古詩佳麗或稱枚叔」的記載。(註一)其後李善注文選亦有「或稱枚乘，疑不能明」之語。(註二)蔡條西淸詩話，胡應麟詩藪，王士禎師友詩傳錄(註三)等，皆有相信枚乘作詩的意向。迄朱彝尊更發表文選樓中諸學士故意埋沒枚乘姓名的新論。(註四)陳沆復收之於詩比興箋中，就像枚乘有詩，已成定案；然疑枚乘無詩，定亦大有人在，玆將諸說錄下：

(1)獨諱說　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四辨蘇李詩，以爲李詩用盈字正

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李陵不應作此。迄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三又重申之云：

「孝惠諱盈，而說苑敬慎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內故也。若李陵詩『獨有盈觴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

是以盈字犯諱，推定枚乘不作此詩。然王世貞藝苑巵言曾反駁此說的不可靠。其言云：

「或以……『盈盈樓上女』，爲犯惠帝諱，按臨文不諱，如『總齊羣邦』，故犯高帝諱無妨。」

據此，觸諱說是不能成立的，許學夷詩源辨體，亦申明此說不可信。更引趙凡夫云：「說文止諱東漢『秀莊炟祜』四字，而於西漢『邦盈』以下，皆不諱也。」可見漢人臨文不諱，是無疑的。檢賈誼陳政事疏，鄒陽上吳王書，淮南子道應訓各篇不諱盈字，是以補足王氏許氏的說法。那麼，觸諱說是不能動搖枚乘詩篇的。

(2)中國詩史三說　時賢中國詩史卷二，對於枚乘詩篇問題，曾列舉數說，中有三說如下：(A)徐陵爲蕭統晚輩，果何所據而云然。(B)洛陽伽藍記卷四，載冲覺寺有高樓，可以目極京師，以推測『西北有高樓』詩的晚出。(C)以「胡馬」「越鳥」對仗的工巧，推知爲曹植時代的產品。這三種說法，固有見解，然亦尙有考慮餘地。徐陵誠爲蕭統晚輩，然當時流行社會，未經刊定作品、當然很多。且在文選以前，已有各種選集，就現今所能考知的而言，猶有：(1)摯虞文章流別集四一卷，(2)荀綽五言詩美文五卷，(3)謝靈運詩集五十卷，詩集鈔十卷，詩英九卷，雜詩鈔十卷。（另有本集，故可知當選集。）蕭統又有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等，隋志皆見著錄，則徐陵所選各詩，未必卽無所據。故不能以晚輩之故貿然排斥徐陵。「至西北有高樓」一詩歷機已有擬作，亦無須牽涉洛陽伽藍記所載的高樓。如其第依據對仗，以估定詩篇時代，亦稍有危險性。

二　枚乘詩僞推證

日人鈴木虎雄關於枚乘蘇李詩之不可靠，曾就史傳加以推證，總其意見，約有以下數點：

(1)史記漢書對於文學作品記載甚詳，雖數千言，亦多錄載。枚乘詩有關五言原始問題，何以一首不見，卽不錄其詩，至少創作五言的人應該揷敍一兩筆，然亦一字不及。

(2)漢書枚乘傳，只稱：「復遊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而史記李延年傳，關於延年的「變新聲」「弦次初詩」（初詩卽新造樂章），並詳細記載。

(3)漢書關於文學的記載很多。如關於枚乘孽子枚皐的記載是「可讀者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東方朔的記載，有「八言七言上下」（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是記載亦甚詳細，何以對於五言詩的出現與其作者一字不及？（註五）

鈴木氏意見甚是，枚皐篇章的記載，旣如此詳細，則對於枚乘詩篇，當然不應遺漏。東方朔的八言七言上下篇，還載明本傳，枚乘如有新生發齊的五言詩，當然也會入於傳記。況且枚乘的聲望地位較諸東方朔與其孽子都高得多，其作品之被重視，當與其人品成正比例，漢書何致獨薄於枚乘呢。

中國詩史並以漢志詩賦略，未載枚乘詩，作爲枚乘無詩的證據。茲檢漢志有枚乘賦九篇，正與本傳「善屬辭賦」相合，並不見枚乘詩。所載詩篇共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有：

高祖歌詩二篇。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宇廟歌詩二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其他燕代齊楚

的謳謠，皆一一記載，假此倡優材人三篇五篇。漢志猶不肯割愛，以文名高於一時的枚乘，如有新生豔齊的五言詩九首，能不著錄於此嗎？或云：枚乘詩或含在「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內」。余意所謂雜者，定係雜集一首兩首的詩篇。所謂歌詩，當係大風鴻鵠一類的口唱詩，枚乘詩之與此不合，雖不能斷定枚乘詩必不在其內，然由下文例證推測，其中無枚乘詩，則可以斷言。故傳記漢志皆不言枚乘詩，這是我們用作枚乘無詩的最初根據。

* * * *

枚乘無詩，在齊梁以前，文人筆下，無意的告訴了我們，這是一個很正確的說明，茲備舉其文於下：

「屈平宋玉導清流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宋書，謝靈運傳論。）

是沈約論述風騷以後的作者，未及枚乘。不知枚乘有詩，此其一。

「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南齊書，陸厥傳。）

是陸厥評語，不及枚乘。不知枚乘有詩，此其二。

「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昭明文選序）。

是蕭統論西漢五言作者，反取了李陵，不及枚乘。不知枚乘有詩，此其三。

「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王、馬、曹，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梁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書）。

是梁簡文帝論兩漢詩文，所舉作者，不及枚乘。不知枚乘有詩，此其四。

「建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鍾嶸詩品序）。

是鍾嶸說得更明白，只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枚乘吟詠靡聞。不知枚乘有詩，此其五。

「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裴子野雕蟲論）。

是裴子野論五言，亦只知有蘇、李，不及枚乘，不知枚乘有詩，此其六。

今日見到的齊梁間論詩，及於兩漢作者的已備錄於此，皆不及枚乘。如以一人二人所論爲疏漏，難道五人六人都是疏漏嗎？當然不會。再者陸機擬古十二首的九首，劉鑠擬古四首的三首，皆是擬玉台新詠著錄的枚乘詩，然陸機劉鑠不言爲擬枚乘，而稱爲擬古。是陸機劉鑠不知枚乘有詩（時賢古詩十九首考及漢詩辨證舉此條以駁朱彝尊玉台新詠跋中選樓改題之說）。此其七，此其八，很明白的在玉台新詠以前，一般人都不信枚乘詩篇，所以沒一人知道枚乘有詩。

我們再從辭賦方面看，論及枚乘的倒是很多。楊雄以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並舉（法言吾子）。班固以枚乘、司馬相如、楊雄並舉（漢志詩賦序）。曹植以枚乘、傅毅、張衡、崔駰並舉（七啓序）。劉勰以陸賈、賈誼、枚、馬、王、揚並舉（文心詮賦）。蕭繹以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並舉（金樓子，立言篇）。由此可見，枚乘有賦，人人所知，用以和前節對照，枚乘無詩，復有何疑。

三 駁詩比興箋說

枚乘既然無詩，則朱彝尊選樓改題說與陳沅詩比興箋的誤妄，不辨自明。改題說既被時賢漢詩辨證以陸機劉鑠擬古詩時代在選樓前所駁斥，茲將陳氏箋釋，再作簡單商榷。箋云：「今以詩求之，則西北東城二篇，正上書諫吳王時所賦，行行、涉江、青青三篇，則去吳遊

梁之時；閩若，庭前二篇，則在梁開吳反說吳王詩；迢迢，明月，則吳敗後作也（箋序）。陳氏對於時代先後，言之鑿鑿。這是根據玉台新詠次序，然文選古詩十九首內的次序，並不如此，是昭明意見與此不合。玉台新詠編枚乘雜詩的章節，亦不一致，四部叢刊本玉台集把「行行重行行」自「相去日已遠」以下另作一首（與嚴羽滄浪詩話所見本同），而「蘭若生春陽」與「庭前有奇樹」二詩却合爲一首。是玉台新詠本的編者，意見與此不合。徐陵選錄艷歌，爲的是以廣宮體，並不取什麼君臣大義，是玉台編撰的宗旨與此不合。且雜詩九首中，據詩箋的意思，作者有以杞梁妻，倡家女自比的，有以客人游子自比的，又有不知是男是女，含混相比的，如出自一人手筆，怎能這樣亂雜！最荒謬的是以蕩子婦與織女自比，以蕩子與牛郎去比吳王，如枚乘如此荒謬，恐亦不免啞然失笑。忽然「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忽然「河水淸且淺，相去復幾許。」甚麼「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等等，合之於枚乘，多不可解。詩箋硬要強詩就事。枚乘後八百年人，尙不知枚乘有詩；枚乘後二千年人，竟能作出枚乘詩譜，豈非耐人尋味的事。

沈德潛古詩源注的解釋最好，「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並非某人某時的作品，如強作逐臣所賦，自然不能相合。照陳沆箋注法，這九首詩解釋爲屈原賈誼以及不得志的曹植之流所作或者更爲適宜。故陳沆箋枚乘詩，不足服人。

四　枚乘無詩的論見

總之，吾人如從衆說，不爲徐陵、朱彝尊、陳沆等所惑，則應信以下記載：

(1)蕭統文選以作者佚名，題曰古詩。

(2)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

(3)鍾嶸詩品序：「古詩渺邈，人世難詳。」

又詩品卷上。「古詩……人代冥滅，而淸音獨遠，悲夫！」是梁代諸人皆以古詩作者「人世難詳」，故統名爲古詩。徐陵著錄枚乘詩以前　今可考者，只有劉勰的「古詩佳麗或稱枚叔」一語，提及枚乘。味劉勰文意，正不信枚乘有詩，乃曰「或稱」。上文既云「莫見五言」，是劉勰正說枚乘無詩；下文又云：「孤竹爲傅毅之詞」，是劉勰反說枚乘無詩。若以玉台著錄爲可信，徐陵以前，數百年間，何以無一見到枚乘有詩。

大概徐陵選錄艷歌，爲的是以廣「宮體」，所以有借重古人的必要。於是在傳說中著出了佚去作者數百年的古詩作者。至於古詩製作時期，既被陸機所擬，則爲漢魏間產生，是可以相信的。

附錄　雜詩九首（玉台新詠，四部叢刊本。）

其一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淸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其二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且綠。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古心，蟋蟀傷偪促。
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淸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啣泥巢君屋！

其三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

其四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復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其五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其六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其七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疑感四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歎戀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其八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其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案文選（萬有文庫本）其一：雙鴻鵠作雙鴟鶴。其二：妻且錄作

妻已綠。羅衣裳，作裳衣。巾帶作中帶。其三：斷北風，作依北風。其四：不復返，作不顧返。其八：擢素手作擢素手。其九：羅裳幃作羅床幃。行客作客行。

又其三其四本爲一首。「庭前（中）有奇樹」本另爲一首，玆幷於「蘭若生春陽」下。與通行本玉台新詠異。

（注一）見文心雕龍，明詩。

（注二）見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注三）西清詩話：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載；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之句，爲詞兼東都。然徐陵玉台，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首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

詩藪：古詩十九首並無姓名，獨玉台新詠取「西北有高樓」八首題枚乘，差可據。以諸篇法例之，疑當爲乘作。

師友詩傳錄：十九首中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玉台皆以爲枚乘作……然細其口氣，大都是西漢人口氣。因篇中有「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故論者或以爲似東漢人口氣，斷其非枚乘者。殊不知西京人，亦何必不游戲宛與洛耶？此見眞與兒童鄰矣。

（注四）玉台新詠載：古詩十九首，以玉台新詠繫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載樂府雜曲歌辭。第十五首「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而文選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而文選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剪更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揉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概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於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別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猶有微意焉。

（注五）見對於五言詩發生時期之疑問一文。收支那文學研究中，早年經汪馥泉譯刊語絲五卷三二期。

方望溪文論

劉夢秋

一

清代文章，崇仰桐城。其創源於康熙，衰於民國，蕃衍二百餘年。鼎革後，胡適陳獨秀乃競相攻擊，林紓雖極力迴護，企振頹風，然

夕陽已近黃昏，揮戈無力矣。殆清代政治，與其有相始終之宿契乎！

所謂桐城文者，創自桐城方望溪（苞、靈皐）。後劉海峯（大櫆、才甫）姚鼐（惜抱、姬傳）稟其傳而覃心冥追，遺風遂衍，故有桐城文派之目。姚鼐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曰：

「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為古文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曰：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原纂例略亦曰：

「自惜抱繼方劉為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尚其文，號桐城派。」

吳敏樹與筱岑論文派書亦曰：

「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

方望溪既以籍桐城，而為桐城文派之鼻祖矣。今欲論其文，必於其文章之淵源，略為言之。方文，源出於六經語孟三傳韓歐，尤宗宋儒，推崇程朱甚力，嘗與姜西溟王崑繩論行身祈嚮曰：

「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

其進四書文選表曰：

「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材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復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

其古文約選序例曰：

「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三傳國語國策史記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學者必熟復全書，而後能辨其門徑，入其窔奧。」

曾國藩論文亦曰：

「近惟望溪，不受八家牢籠。……望溪為人嚴氣正性，蓋得力於三禮，而為文根源，出於管荀，故文章整肅嚴峻。」

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曰：

「大抵望溪之文，貫串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經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經。……方之古作者，於先秦則望溪近左氏內外傳，……於先漢則望溪近董江都……於八家則望溪近歐曾，……望溪西漢之遺。……」

方望溪之文章，淵源至遠，根基至深，「凡筆墨所涉，皆有六藝之精華寓焉。」（程崟望溪先生文集序）「為我朝百餘年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姚鼐方望溪集外文序）故天下翕然號為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領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授，徧於東南。（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

二

然清代學宗六藝，文追先秦盛漢唐宋諸家者衆矣，卒皆不傳，此何故歟？蓋方望溪從先代經典中尋出「義法」，極力標揚。故「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領相望。」——是以「義法」者，乃方望溪文章之特色，亦桐城文派之準則也。考其所謂「義法」，源出左傳史記，其古文約選序例曰：

「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

程夔震方先生文集序曰：

「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

古代典籍，早具「義法」，惜無有標而出之者。原「義法」之用，最初為孔子，見於史記。劉熙載文概曰：

「『義法』居文之大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此『義法』之始也。」

然「此類（義法）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方望溪與喬介夫書）惟方望溪標言於衆，以爲天下後世倡。夫所謂「義法」者；其義爲何？曰：「義卽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卽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進四書文選表）。至於由此「義法」所生之理論，今且詳之，以窺全豹焉。其與吳東岩書曰：

「凡吾爲文，必待情與境之自生，而後能措意焉。……文之意義，必緣情與境而生。」

所謂「情」者，卽作者之思想情感也；所謂「境」者，卽外界之物象事態也。失「情」，必緣「境」而生；「境」，必待「情」而顯。此卽所謂「文之意義，必緣情與境而生」也。其序楊千木文稿曰：

「文者生於心，而稱其質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戔戔焉以文爲事，則質衰而文必敝矣。古之聖賢，德修於身，功被於萬物，故史臣記其事，學者傳其言，而奉以爲經，與天地同流。其下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志欲通古今之變，存主之法，故紀事之文傳。荀卿董傅守孤學以待來者，故道古之文傳。管夷吾賈誼達於世務，故論事之文傳。凡此皆言有物者也。」

文之傳，必恃其「質」，亦卽言之「有物」。不然，則失之矣。

凡上所言，皆「義」之道也。其古文約選序例曰：

「古文體氣，必至嚴乃不雜也。」

「古文體氣，所貴清澄無滓。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

其答程夔州書曰：

「凡爲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茲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必沸唾之令人穢矣。豈惟佛說，卽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

其進四書文選表曰：

「……必氣質端重，間架渾成，巧不傷雅，乃無流弊。」

其與程若韓書曰：

「來示欲於誌有所增，此未達於文之『義法』也。……此文乃歐公法，若參以退之介甫法，尙可損三之一，假如用秦人爲之，則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離合，足下當能辨之。……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麤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

凡上所言，用字必省，措詞必雅，「佛說」，「口語」，俱不可闌入句中，然後於文始能「嚴乃不雜」，「清澄無滓」，此卽言之「有序」，「法」之道也。

方望溪旣標明「義法」之道，故「凡用意險仄纖巧，而於大義無所關通，敷辭割裂鹵莽，而與本文不相切比」，「偭棄規矩，以爲新奇，剽剟經子，以爲古奧，雕琢字句，以爲工雅，書卷雖富，辭氣雖豐，而聖經賢傳之本義，轉爲所蔽蝕，則別而去之。」（進四書文選表）其講求「義法」，旣如是之嚴而且苛，故評「子厚文筆古雋，而『義法』多疵，歐蘇曾王，亦間有不合，」（古文約選序例）無怪然也。

三

清代文章，雖推重方望溪，然譏之者亦衆矣。劉開與阮芸台論文書曰：

「望溪……大體雅正，可以模楷後學，……然不可以律非常絕特之才也。」「望溪豐於理，而嗇於辭，謹嚴精細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

吳敏樹與筱岑論文派書曰：

「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

稽方望溪之文，確有此弊，此其「義法」太嚴之故也。錢大昕跋

方望溪文曰：

「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巨來輕之。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即還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值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爲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

李巨來之言，殊屬肯當。夫爲文章，文字固應簡省，但及於地名，省桐城爲桐，則不免爲學者所疵矣。至於錢大昕與友人論文書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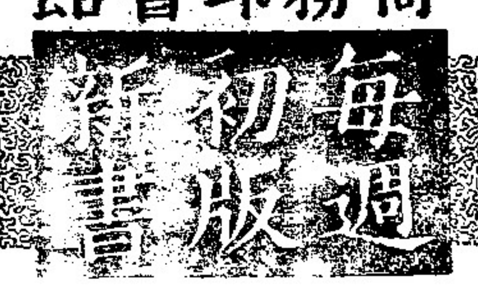
「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義於何有？……若方氏，乃眞不讀書之甚者。」

則不免譽之過激。「義法」雖謹，尚不至於如是之被誚也。

按方望溪所倡之「義法」，論甚平凡。夫所謂「言有物」者，即內容須切合實際，不涉虛浮，以聖經賢傳爲歸，以言仁載道爲旨；所謂「言有序」者，即在求形式之謹嚴，修辭之瓌麗，省刪俗語，使之雅馴。此論也，古之文家，多有重視之者。然其獨爲一代文宗，風靡二百餘年者，此何故與？蓋方望溪授徒講學，以義法相訓，承學之士，以之相歸，以是凡稍與有師承淵源者，俱以桐城派目之；究其「義法」，大有變革矣。如劉大櫆未嘗從望溪受業，其文亦不甚相類，但因其籍出桐城，以布衣走京師時，上其文於望溪，後世乃尊之以繼其傳；其後姚惜抱曾國藩雖學承桐城，而「義法」已非本來面目矣。故桐城文派者，非以其「義法」相承，乃因其師傳之關係耳。

方望溪之文，力崇「義法」，特詳爲申論之矣。今世猶有抱殘守闕，力法望溪者乎？則不免見譏於當代人士矣。

商務印書館



三十五年四月份

收復區內上海供應

第一週新書六種

中華民族新論

咸勃館著 一册 定價二元二角

本書以現代各種思想、及民族哲學、教育哲學爲經，以生物學爲緯，闡揚我中華民族之固有文化，指示今後應循之途徑。著者認爲戰後世界秩序之建立，倘自身不知改造，內心不能洗刷，仍無裨於民族百年之大計。內容側重事例之說明，不徒事理論之檢討，頗多獨到之處。

體育與教育

王學政著 一册 定價一元六角

體育是一種有效的教育方式。新體育之目的在利用身體之活動，以教育青年，使生理、心理、倫理三方面得到平衡發展。著者本其多年研究心得，撰成此書，凡分七章，旨在闡明新體育之意義、目的、和效果，使一般國人及從事教育者，認識體育之重要性，積極注意提倡，庶於教育前途有更大之貢獻。

地學叢書 氣象學（國立編譯館出版）

朱炳海著 一册 定價十元

氣象學不僅有關航空軍事，且爲國計民生所利賴，我國需要大學已設有氣象學系，造就專門人才，惟完善適用之氣象學教本，國內尚不多見。著者於講授時自編教材，對於國內可用之材料，盡量利用，國外最近之進步，兼收並蓄，至原理之引證，編製之體裁，乃以國外善本爲參考，凡成七編二十八章，附精細插圖實用表解甚多，由國立編譯館委託本館印行。胡煥庸先生稱其內容詳備新穎，許爲漢文中空前之巨著。

國立清華大學叢書 鐵路工程（上册）

張澤熙著 一册 定價四元

本書可供大學土木工程教材之用，分上下兩册，茲先出上册，專述軌路、路基、涵洞、隧道、機道、安全設備、車站房屋、附屬建築物，以及土方估計、路線測量等。內容原理與實踐並重，引用各路實例爲證，切合我國需要。每章之末有計算習題數則，以便學生解答。附插圖五十七幅，附表十餘種。

我的父親

顧一樵著 一册 定價二元

本書是著者紀念其先君及愛女之作，集中八篇文字，代表著者二十年間寫作的嘗試。上卷「我的父親」、「祖母的死」、「三老太的一生」、及「默默」四篇，是不可多得的傳記文學，敍述顧氏家世與里居環境，在可貴的回憶中，浮現着人倫的至情，反映出人事的悲傷，情文並茂，至可感動。下卷包括國家、寒梅、孤寂、背影四篇。

復興叢書 蘇聯史地

吳清友著 一册 定價三元七角

蘇聯的潛力和成就在此次大戰中有極好表見，但蘇聯仍爲世人所亟欲瞭解的國家。本書參考許多新的資料和統計，客觀的敍述蘇聯地理環境、氣候物產、民族人口、帝俄之興起和沒落，十月革命後之經濟文化，戰時努力和今後的動向，是一幅蘇聯透視圖，關心蘇聯情況者不可不讀。

上列各書均按定價四百倍發售 外埠另加郵運包紮費

東方雜誌第四十一卷 第二十一號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重慶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上海再版

每冊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主編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新中國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六〇號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九〇七五號